

万卷方法—质性研究个案阅读丛书

泰利的街角

——一项街角黑人的研究

艾略特·列堡 著
李文茂 邹小艳 译
高丙中 校

藉此书，很多人了解到美国都市中经济上被边缘化的黑人的困窘境地。有的人甚至在他们还从未听说过（或听说过但已忘记）作者名或书名时，已听说过此书中讲述的故事。



重庆大学出版社

Tally's Corner

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


ISBN 978-7-5624-4937-9
9 787562 449379 >

责任编辑：邬小梅

封面设计：周娟　林京羽

定价：25.00元

泰利的街角

——一项街角黑人的研究

艾略特·列堡　著
李文茂　邹小艳　译
高丙中　校

重庆大学出版社

版贸渝核字(2007)第7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利的街角——一项街角黑人的研究/(美)列堡(Liebow,E.)著;李文茂,邹小艳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10
(万卷方法. 质性研究个案阅读丛书)
书名原文:Tallys Corner: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
ISBN 978-7-5624-4937-9

Ⅰ.泰… Ⅱ.①列…②李…③邹… Ⅲ.美国黑人—民族文化—研究 Ⅳ.K71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110993号

泰利的街角
——一项街角黑人的研究
艾略特·列堡 著
李文茂 邹小艳 译 高丙中 校
责任编辑:邹小梅 版式设计:雷少波
责任校对:夏 宇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940×1360 1/32 印张:5.875 字数:156千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 000
ISBN 978-7-5624-4937-9 定价:25.00元

作者简介

艾略特·列堡(Elliot Liebow,1925—1994),曾担任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劳动与精神健康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泰利的街角》是作为列堡在美国天主教大学的博士论文而写作的。他还在1993年出版了《告诉他们我是谁》(*Tell Them Who I Am*),这是一项有关美国无家可归妇女的研究。

2003版前言

《泰利的街角》与都市黑人

艾略特·列堡的《泰利的街角》自1967年问世以来，一直广为学者、教师、学生等众多关注城市贫民遭遇的人阅读。社会与人文科学领域的图书，销量超出一百万册的屈指可数，此书即为其中一种。很多美国人(其他国家的也不在少数)，包括某些读大学时此书未被列入阅读书目的人，藉以此书，了解到美国都市中经济上被边缘化的黑人的困窘境地。有的人甚至在他们还从未听说过(或听说过但已忘记)作者名或书名时，已听说过此书中讲述的故事。

《泰利的街角》对几代政策制定者、社会活动家、咖啡馆哲学家们的思想影响深远，却隐而不露，而这些人对公众的教化无处不在，公众的观点由铺天盖地的宣教、报载文章、各种公共演讲、电视脱口秀节目、邻人的抱怨等无数种方式型塑着，虽然这不被承认。无论何时何地人们从暗处走出来，直面美国对待都市黑人的令人困惑之处，《泰利的街角》即在人们的思想深处，作为重要的防线，抵御着有关城市贫困偏执的种族主义谎言传播。

为什么？为什么这样一本小书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如何解释早在全球经济使美国市中心区的贫民摆脱贫困的希望破灭之前，这本有关城市人的书所具有的持久价值？这本书以朴实的语言写成，朴实得令人难以置信。有的人可能认为，这本书即便不算古怪，也至少在社会学上过时了，仅看看副标题就可知道——一项街角黑人的研究(*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那个时代(用大写字母 *B* 表达大写字母 *N* 的意思还不常见),“Negro”这个含有种族自豪感的词还未让位于“Black”(而大写字母 *N* 是杜·博伊斯强力主张公众使用用以代表“Negro”)。然而,这一 2003 年 Rowman & Littlefield 版的读者会感到惊讶——不仅是因为需要转译一些语句和财经数字,或想象把泰利的街角重置于新的大环境之下:就业前景恶化,毒品交易毁掉了城市贫民生活的政治经济状况。某些内容须转译的遗憾,在很大程度上可用从故事中的丰厚所得予以补偿。在第一次讲述之后很多年,书中所述依然读起来引人入胜,阐述机敏清晰。

《泰利的街角》继续以各种方式为读者所飨,并与一个无关的时代保持相关性。首先,此书是一部很优秀的独特的著作,读者可从中规中矩的学术写作的乏味中解放出来。而且,拜艾略特·列堡的写作天赋所赐,《泰利的街角》时至今日,读起来仍为切中要害、说服力强的经验社会科学作品,特别是由于它的原创性,藉此避免了很多民族志研究的拙劣手法。这样,阅读与学习此书,读者不是感到愉悦,而是痛苦地认识到美国的种族问题依旧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根深蒂固。

每位作者都会欣喜于作出哪怕是一项贡献,有些人或许梦想做出很多。在这么多年中已读过和反复读过此书的人,如果感激艾略特·列堡作出如此多的贡献,那么也会对他的在天之灵说一声遗憾,因为没有在他有生之年表达感谢。反复阅读和反复思考这本重要的书,是为了努力填补逝去的时间中的沉默。

伟大的作品通常会激发亲历某地的文学想象。那些地点总是被有力地呈现,它们在读者的意识里生根发芽。说到虚构的地点,人们会想到荷马(Homer)的伊萨卡岛,詹姆士·乔伊斯的都柏林,威廉·福克纳的位于密西西比的约克纳帕塔法郡(Yoknapatatwpha County),还有拉尔夫·埃里森的哈莱姆黑人区。但文学的想象如何制造此奇迹?作者如何创作一个发生在某个地点的故事,使得这个地点在未去过此地的读者的意识和内心深处神秘地生长——或即便他们去过那里,他们所见也不太可能恰如作者之所见?

从体裁上来讲,若指的是小说或史诗,让人想到通过作者的想象和读者的感受之间的某种契合来玩弄技巧。这种契合是难以定义的,能够感召人们。作者对读者首要的最深刻的触动位于感觉层次,而非智力上,因为正是感觉才有力量把一个个读者统一到一种不明确的共同体中。小说的作者从她的私人空间构造出公共的想象空间,众人可以进来并真的进来了。一部小说可能确实很好地讲述真理,但作者并不承担证明给任何人的最终责任,而只是有趣地感召。读者对作者也不予强求,即使是在他读到某个地方,作者描写得足以让他可判断故事中所述事实的真伪时。我们读小说不是为了可证明的事实,而是为了情感,这种感觉的激发可能很好地引向对事实进行新的检视,这些事实是可接触到的现实的某些一般面貌。

然而,从体裁上来讲,若指的是任何一种非小说的形式,玄疑要么完全没有,要么发挥作用的方式有点儿不同。这里涉及社会科学著作的独特职责,社会科学中没有哪一种著作像《泰利的街角》这样的民族志有文学色彩。与小说不一样,民族志(其毕竟意味着对一民族的书写)有赖于故事的事实,即使读者无意于去核实,即便现实中的故事不中听,作者也必须如实写出。宣称社会科学合法性外衣的诸多叙述,使作者的写作处境各不相同。你可以说社会科学是不被认可的文学。社会科学家被认可的方式不同——或更确切地说,他们享受到的写作自由受制于对科学的责任感。同时,作品中的科学性服从于公共的审查,有时由于非作者能控制的事件而可能被置于险境。

艾略特·列堡写作成就的标志之一,是他避免了 1965 年的一篇报告所犯的错误,这篇也以都市黑人为主题的报告引起了众怒。那篇报告就是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黑人家庭:为国家行动而进行的案例分析》。报告中作者天真地认为科学糖衣之内是苦药丸,他称之为“病理学错乱”(tangle of pathology),黑人的家庭失败是表现出的症候。[①] 如果说有什么

---

① 列堡在参考文献中列出了莫伊尼汉报告,是以官方名义作为美国劳动部政策制定和研究办公室的报告列出的,而并没有提到莫伊尼汉的《黑人家庭:为国家行动而进行的案例分析》。

不同的话，列堡书中所述都市黑人男性的贫困更加诚实可信，但他写得优雅，没有惹怒他人，尽管并不顺风顺耳。列堡意在唤醒，而非惹怒。列堡做得非同寻常的好。

或许可以认为列堡在暴风雨中找到了自己的路，因为他以街角泰利等人的话来讲述残酷的事实。这应该相当于在平日谈话中留面子式讲实话的惯用语：“噢，不要误解我，我只是听了某某人如此这般地说了你的事。”很不幸，这种姿态很少奏效。人们受到伤害，总是怪罪传递信息的人。这就是莫伊尼汉的问题。他本意很好，但得到了坏信息，表述不佳。列堡得到同样的信息，几乎如出一辙。

在《泰利的街角》中，列堡负有双重任务，须既要负责研究对象的言论，又要负责那些发生的事情。

> 海猫正换衣服准备外出。我蓦地坐到他的床上，等着他穿好，这时一包避孕套从床垫底下掉出来。我把它放回去，发现一打儿或更多这样的包。我问海猫他是否每次都用。他说，不，有时用，有时不用。

此处几乎没有参与观察的那种完全虚假的熟稔。列堡不是在海猫家进行正式的访谈。如果说信息来自登门拜访（信息是这样得到的），也是来自他们之间随机发生的关系。尽管此处的语言有一点正式，（“prophylactic”而不是“rubbers”），但行动是亲密的。列堡“蓦地坐到”床上。当避孕套掉出来，他为海猫把它们放回去，问他怎么用，没有感到不好意思。

列堡的询问引来非常有趣的回答：“这要看这个女孩儿。如果是好女孩儿，”海猫说，“那种我不介意付出的女孩儿，那么我就不用。但如果不是好女孩儿，我不会冒任何险。”在 1967 年，缩写 HIV/AIDS 还不为人所知。那时的在校生不会像今天一样把避孕套套在香蕉上。避孕套是用来防止性传播疾病的。性行为是为了性而性。至少对于市郊的好女孩儿来说，生育控制是靠避孕药丸。列堡轻松自如地对待海猫的避孕套，问及他的性事，完全不避讳，可见作为街角活动的一份子他一定是做

了某种非凡的努力。在各种情形中，这种努力的成果，对读者来说必定是一种怪诞的回答。海猫似乎推翻了中产阶级的性伦理，认为非婚怀孕是丢人现眼的。好女孩儿就不加防范，"如果是好女孩儿，那种我不介意付出的女孩儿，那么我就不用。"不是好女孩儿，会冒有损健康的风险，于是就用避孕套。这一场景与其说建立了某种盲目的亲密关系，不如说在中产阶级和街角男人明显对立的性伦理观之间保持了一段距离，这段距离通过谈论性问题而被跨越。两者之间，列堡没有作出评判。一个简单的脚注描述了两种性文化之间的差别，没有深度阐释。在此写作风格已收效良好后，书的大半篇幅是这样的故事叙述。

这种熟稔对民族志学者来说一点儿也不特别。而今另外一位写有关黑人①的白人作者米切尔·丹尼尔，能轻车熟路与可被认为是"报道人(informants)"的人快速建立友谊，他以此著称。但是熟稔自身可能是一种陷阱，使民族志受制于个人直觉，这进而迫使作者倒向看起来不那么客观的一端。所以民族志学者使自己与现场保持距离的蹩脚的原因，是为了树立作为权威作者的地位——是他见到了事实，并呈现给读者。作为见到了呈现给读者的事实的人，双面性源于民族志学者杰纳斯般(Janus-like)的地位———方面与研究对象亲密无间，另一方面对于民族志读者又是客观的科学家。过于侧重一面或两面同时用力都会失败。

不仅在田野工作上，而且还在民族志书写过程中，列堡以他所保持的社会距离来掌控与研究对象的熟稔程度。这是一个远比去接近研究对象更微妙的步骤，追随他们的一言一行为的是回到书写中的科学世界。列堡围绕民族志双面性的陷阱书写，在方法论上取得了新进展。他仅仅讲述故事。尽管有时

---

① Mitchell Duneier, *Slim's Table: Race, Respectability, and Masculi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Sidewalk*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 Giroux, 1999)。尽管丹尼尔因让熟稔蒙蔽了他对研究对象的正视而受到批评，但很多人还是钦羡他的谨小慎微，藉此，在《侧道》中，他设法利用自己建立友谊的才能服务于民族志。

读者可能意识到列堡的在场是出于科学研究的动机，如对海猫的避孕套的叙述，但他的写作天赋在于使读者几乎不曾因此而感到苦恼——他的科学研究意在唤醒，而非惹怒。有一件事可以确信，那就是在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中，事实不在讨论之列。另外一件更加可以确信的事是，在列堡的《泰利的街角》中，不管人们想要这个故事发展到什么地步，除非事实为真或至少足以为真，它才会一直发展下去。完全如福克纳的萨德本和克德菲尔德家族衰落的悲剧一样，列堡的故事作为一个*故事*展开，是因为它的叙述使读者相信故事发生地（社会意义上的和地理意义上的）的事实和现实。

要达到文学的效果，故事发生地须足以真实以让故事看起来合理。这样，民族志的真实性，不在于田野工作者作为引导者——以科学事实和范畴作为指路灯——的书写能力，而在于民族志发出的声音是真是假——是真时，所描述的人和地就有说服力。以科学的视角来评判，这是循环推理。但不管收效好坏，*关于人的著作*从不简简单单是科学的。如果是，它们就全无效果。在与研究对象的民族志关系上下过大的工夫，以此为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辩护，这是用不着的。只要故事被诚恳地叙述，真实性自会由故事本身表明，不管是在词句之间还是故事的隐含意义中。它们只是须准予呈现给读者。除此之外，说得越少越好。海猫的性经历令人信服，不是因为它发生在我身上，而是因为它把我的性经历置于了同一情境中。

发生在某地的故事其科学价值在于，它们能唤起读者的一种意念——把故事与可能未亲眼所见的某个世界合理地联系起来。如果仅是阅读，而非作评论，那么读者需要做的全部，是能把自己置身于这个图景之中，只要作为一个对研究对象的行动知之甚少的陌生人就好。我第一次读到对海猫的避孕套的叙述时，停了下来，想起第一次在街上看见用过的避孕套的场景，那时正值萌动的青春期。我正与一个朋友结伴而行，他是班上最野的孩子。我们都假装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如果这个孩子脸红，那么我就知道了有关避孕套所有我需要知道的。列堡对海猫的避孕套看似轻松的笔调是如此轻描淡写，以至于

读者还以为那些污秽的小东西是别的什么。很多民族志学者犯的错误是，在说服人上面用力过多，他们展示他们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是多么亲近，或提供数据和范畴以在科学之光的照耀下开启故事。

《泰利的街角》读起来与其说像这些人真实生活的故事（尽管可以这样认为），不如说是发生在某个特定地点某些人生活的一个瞬间的故事——也就是说，这个故事所呈现的是如此与众不同，以至于读者想要亲临此地，即便去时已不复存在。帕特丽夏·克拉夫曾经说①，或许这部作品更像一部电影。当然，这个故事不是实时叙述的。与其说是期待读者-观众身在那里或去那里，不如说是让他们尊重无意识的欲望——在图像从黑屋子里投射出来时，这种欲望把他们置身于现场。黑屋子所关注的正在展开的故事中的现实，没有发生在此地。既然欲望总是这样，个人在无意识情感的在场与不在场之间摇摆。

这不是说《泰利的街角》完美无缺。没有哪本科学著作在写成约四十年之后能做到——现在更是做不到，因为 20 世纪后半叶是社会科学思想发生诸多变革的年代，叙事的策略即为变革之一。② 不变的是，列堡书中所写如此平淡却优雅，依然令

---

① Patricia Clough, *End(s) of Ethnography: From Realism to Social Criticism*, (New York: Perter Lang, 1998).

② 尽管我出于各种原因赞赏很多民族志作品，但即便是朱迪思·史黛西的《挑战新世界》(New York: Basis Books, 1990)，实验了新的民族志技术，也做不到列堡那样好。同时，有人会说史黛西和其他女性主义民族志学者能做到他们已做的，因为已经存在列堡开创的此类早期作品。卡罗尔·斯塔克的《我们所有的亲属》(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在很大程度上是《泰利的街角》在女性主义上的产物。极少数的人利用了这条影响的路径，从早期的社区研究，经由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到达新的民族志。最卓越的这种作品当属奥德丽·丝普伦格所著的 2000 年威斯康星大学的博士论文"Place Maps The Sociology of the family"，这篇论文很快就会出版。丝普伦格的作品不仅澄清了社区民族志与女性主义理论之间的不确定关系，而且其本身就是一部关于马尼托巴省的一个遥远的工业性森林地区家园故事的民族志作品。丝普伦格对我关于民族志作品、发生地、距离保持的思考的影响超过任何其他人，尽管他不认同我对《泰利的街角》的阐释（主要是在 2003 年 2 月 2 ~ 7 日的 e-mail 沟通，还有其他人参与）。有关我对丝普伦格作品的理解，见：Charles Lemert, *Social Thing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第 11 章。

人称奇。这种两种属性的非凡并存不露痕迹，正如故事构想的方式一样，这使这场戏从开幕到闭幕静悄悄地展开，有条不紊地深入，在读者翻页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记住如果不是都市黑人问题盘旋在心头，没有人会读这本书，尤其是，那些可能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买了这本书的人，也不会想起它。从1965年，莫伊尼汉报告发表的这一年，到60年代剩下的几年，在美国人意识中20世纪60年代自身是进步中的黑人的历史。对于那个时代来讲，《泰利的街角》的开头读起来让人感到，列堡对美国都市中黑人所遭受的贫穷危机的描写相当低调。这种描写在读者是新鲜的。在这里参照了对以女性为家长的家庭的极端强调（一种对莫伊尼汉报告引起的众怒的间接参照）。通俗地说，列堡意在矫正这种强调。“如果成年（黑人）男性不是简单地以“缺位”作为特点，那么他们也是以有点儿朦胧的形象（shadowy figure）出现，游移于其他家庭成员生活内外，行踪不定。”[①]在另外一部分对都市中黑人男性的社会学研究做了导论性述说之后，列堡突然笔锋一转。他描写了街角，在这里新政外卖店是作为活动的中心，除此之外，还介绍了泰利、海猫、理查德和乐华——街角的主要人物。由此，我们知道了这个故事是关于有名有姓的真人的，可以作为真人来描写。

“男人与工作”（第2章）以在当时公众中广为流传的故事开头。一个早上，一辆敞篷小卡车驶过街角。司机提供一份日工。街角的男人们思量这份日工提供的薪酬，没有人接受这份工作。卡车离开后，街道上上下下，到处可看到人们或站或坐，无所事事。这发生在工作时间。有一份工作可做，男人们不加理会。

还能有更好的图像来描绘对都市中黑人男性的这种广泛误解吗？如果是在今天，再次照下这幅图像时，带上黑帮色彩，

---

① 注意“Shadowy”这个词在此处的用法，在列堡的黑人男性的故事展开时，这个词在行文上会负有重要的分量。

那么负面效应会更加强烈。都市黑人男性的大众形象是,他们不愿在工作和家庭的世界中扮演角色。列堡首先做的是确认这种印象。但《泰利的街角》立即开启这个故事本身。利用唐克、理查德、乐华和海猫的叙述,列堡描述了那些人——他们一早来到内城区,招募日间劳作者——提供的这种工作。这种工作通常是建筑工地上能扭断脊背的劳动,整日背砖泥斗。即便是年轻人也会不堪重负,而事实却是并非干这种活儿的人都那么年轻。即便是那些能够承受重体力劳动的人,也意识到这种工作是不规律的,要依季节、天气和雇主的心血来潮寻找非工会劳工而变化。如果工作地点不是在需乘三个来小时或更长时间的公交车才能到的郊区,那么唯一规律的工作,是餐馆、杂货店、宾馆里的粗活以及类似的工作(除铁路行李搬运工之外的黑人男性的传统职业,以及那些今天从内城区永远远远移出的工作)。这些人拒绝工作,是因为他们知道它将把他们引向何处——何处都不是!

于是,《泰利的街角》给出了初步的关键解释,"街角男人并不比身边的更大社会赋予工作更少的价值。"这些人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他们知道,做一个养家糊口的人,把薪水带回家用以急家人之所需,维持家庭,为人父和为人夫,这些意味着什么。简而言之,他们是现代的和强烈的美国意义上的男人——男子汉是作为负有责任的人。"做一个乐天安命的人,不为他所生活的世界忽视,这是在街角的每一个人想要的。"似乎是为了减少语言的正式性,列堡的田野笔记中的较长一段,提供了或许可以称之为"泰利的悲情(Tally's Lament)"的东西:

"你认识昨晚来的那个男孩儿吧?那个叫布莱克·穆兹莱姆(Black Moozlem)的?那是我该做的,应该像他那样。"

"你什么意思?"

"穿着得体去上[夜]学,找到一份好工作。"

"他并不比你阔绰,泰利。你比他赚得多。"

> “这不是钱的问题。[停了一下]这是地位的问题，我想……人们尊敬他。”

列堡提到的较高薪酬是指泰利做的一份作为水泥工的季节性工作。列堡通过美化水泥工作，尽力说服泰利使他对生活感觉好一些：

> 没有人知道所有的事。有的人是医生，所以他谈论外科手术。有的人是教师，所以他谈论图书。但是医生和教师都对混凝土一无所知。你是一个水泥工，这就是你的专长。

泰利依此得出他的悲情：“也许是这样，但你什么时候看到有人站在那儿谈论混凝土?”

你不得不钦佩这两个人——泰利，坦诚地理解自己的处境并描述出来；列堡，在那种情形之下，作为一个自由的社会改良家，坦诚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尽力去说服一个真实的人摆脱他已注定的命运。如果换成另一位不如列堡自信的社会科学家，在此种情形下他最终或许会在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力量和威力之下不知所措。而列堡仅仅在几个脚注中提及结构的社会学。他更喜欢让“男人与工作”的故事自行展开——准确地说，这个故事是对社会分化的都市中黑人男性命运的叙述。

这一章设定了故事的线索，下面四章依此展开，相比较而言，这四章都比第 2 章“男人与工作”短小。短小的原因或许是，“男人与工作”已设定好下面几章所述故事的线索和节奏。叙述的线索把这些人生活的不同领域串起来——作为父亲，作为丈夫，作为情人，作为朋友。在每个领域，他们都是失败者，这令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希望落空。依照叙述线索，这些人被挫败的节奏有条不紊地清晰地展示出来，并继之以冷静的解释。故事线索本身不是列堡的发明。都市中黑人男性的失败过去和现在都是流传于大众观点之中。整个社会在问：*为什么这些人与众不同？他们为什么会失败*？通过列堡之口，他们回答，

有很好的理由！尽管在列堡笔下，他们彻头彻尾地被挫败，但他们的回应虽沮丧但带有敏感的反抗。*我们没有不一样*。

“别居的父亲”（第3章）讲述男人与他们的孩子的关系，他们对所扮演角色的自我认识，以及在特定情况下，他们与孩子的亲昵接触。但这里的形象与公众认为的相反，这种表面上的不相一致可以被解释。与孩子分开住的男人对孩子的慈爱表现得更加强烈，而不是相反。而那些与孩子同在一个屋檐下的男人常常对孩子表现得冷酷和漠不关心。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如果他们住在家里，他们对孩子的付出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简而言之，他们的养家糊口的角色是可见的。为了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虽非完全不能，但很可能不能达到对养家糊口者的要求。这样，与孩子生活在一起意味着把此人的失败公开展示。因此，他们把自己与孩子分开，或者用列堡的话来说，“也就是说，实际上‘我连父亲都不想给你做，那么现在就不会因不能完成我不想做的而受到谴责。’”*没有工作的男人即是没有孩子的父亲*。在美国，正是如此。

“丈夫与妻子”（第4章）和“情人与剥夺者”（第5章）表面上看似做出了错误的区分。但如前两章，这种表象是中产阶级的人们眼中的形象。在都市黑人的现实生活中，这种紧张关系很尖锐。*没有工作的男人即是没有孩子的父亲，因为他们不能做孩子母亲的丈夫*。结果是，他们与孩子的母亲和生活中其他女人的关系不牢固，因为在上层文化的要求——一个真正的男人应该是一个好的养家者——面前，他们承受失败的巨大压力。在这两章中，随着故事变得原始，故事的节奏加快——不管是关于性的，还是关于男人们解释作为父亲和丈夫的失败的徒劳努力。这里列堡介绍了性对象不专一是男人的缺陷的理论，提供了他的最具活力的理论：都市中黑人男性的男性气质具有明显缺陷（apparently flawed manhood of the black man of the city）。与泰利作为水泥工，由于对工作缺乏感情所表现出的悲伤论调相反，我们这里听到了海猫的吹嘘：

男人就是狗！我们不能称自己为人，我们就是狗，狗，

狗！他们喊我狗，因为我就是，但每个人都是——从一个女人那儿蹿到另一女人那儿，就像一条狗。

列堡又说，听到海猫吹嘘的其他街角男人点头同意。在这里，从卑微的自尊中发出了不同的声音，部分是防御性的，部分是可获得尊严的实现。他们不是真正的男人。他们一定是狗。这至少是一种理论，是一种解释他们处境的方式。至少他们是些什么。

没有工作的男人即是没有孩子的父亲，因为他们不能做孩子母亲的丈夫，因为他们是发情的狗。叙述的逻辑逐渐明朗。就是在这里（“情人与剥夺者”），列堡讲述了海猫的避孕套和性习惯的故事，这个故事似乎推翻了中产阶级的规范。海猫留有避孕套不是为了好女孩儿而是为了不好的女孩儿。这个逻辑与他们做父亲的论理正相呼应。他们对分开住的孩子留有慈爱，而否定同住的孩子。两种情况下，整篇故事中，都市中这些黑人男性的逻辑慢慢浮现，他们利用这种逻辑，尽全力抵御经济系统的袭击，经济系统使他们的生活各方面必败无疑。他们使用避孕套——来保护自己免于疾病，疾病会使这条狗安静下来。他们关爱自己的孩子——在他们可以不承认作为男人的失败时。

故事远不是令人开心的。如果换成一个不如列堡的人，他或许会加以改造，或在某些方面添加上喜庆的色彩。但《泰利的街角》不含有一句屈尊纡贵的话。实际上，读者藉此可意识到，民族志学者的视野超越了当事人的行为——这种行为是为更大社会所谴责的。列堡因他们所做的工作而敬重他们，尽管事实是他们并不可敬。列堡没有戳穿。他与这些人所保持的距离是对他们表达祝愿的社会空间。

在本书结尾几章，他回到开头。在“朋友与关系网”（第6章）中，他重新把关注点安放在不安定的街角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所拥有的全部是彼此的关系。然而，即便为现在所拥有的，也不会长久。即便是男人间最亲近的关系，在男性缺陷综合症面前也是脆弱的。泰利与理查德的故事令人痛

心。这两个人的交往曾密如至亲，亲如手足。但很快理查德感觉到泰利已成为他妻子雪莉的情人。没有什么能劝阻理查德这么想。当男性缺陷理论应用到某个人身上时，糟糕的后果是，那些认为自己是发情的狗的人不能不把他人也想象成发情的狗，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泰利不曾与理查德的妻子有过任何亲密的接触。男性缺陷使理查德对泰利的恐惧渐强，这恐惧当然是对自己的恐惧。当他一无所有，仅剩最起码的自尊感的时候，他不能实现与他人维持友谊这种生活上的基本需求。

最后（第 7 章），列堡陈述了他自己的关于都市黑人的理论。

> 有时，他坐下来，为所有的耻辱而哭泣。有时，他把拳头挥向妻子和孩子们，这也许是作为家中男人的无声控诉，这是他可使用的方式，也许只是为了让这个女人遭受痛苦，是她见证了他作为丈夫、父亲，进而作为一个男人的失败。渐渐地，他开始转向街角，在这儿有一套公共虚造出的影子价值系统，这个价值系统容得下像他这样的人，使他们再次成为男人，如果他们不去深究彼此底细的话。

如果我们放开眼量，读到此处时也许会发现所有这些都太熟悉了。但有必要记住，对以往都市黑人男性故事的熟悉，准确地说，归功于这之后几十年中黑人成为美国社会意识的中心。在 1967 年，没有希荷普派（hip-pop），除非你算上阿里（Muhammand Ali）的韵律，有人这么做。① 在 1967 年，存在城市帮派，并已存在很多年，但帮派匪徒没有成为街道生活的传奇人物。这样，没有有关街道的言谈符码（以里亚 · 安德森如是说）②，所以没有对黑人男性的修正言论：他们真的比多数人认为

---

① Charles Lemert, *Muhammad Ali: Trickster in the Culture of Irony*(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03)

② Elijah Anderson, *The Code of the Street: Decency, Violence, and the Moral Life of the Inner City*(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的那样值得尊敬(米切尔·丹尼尔如是说)①。那时关于黑人男性的城市民族志,甚至也不像今天这样是社会科学争论的中心。②

1967 年,列堡的书写独树一帜。尽管他没有提到杜·博伊斯现今著名的美国黑人的双重意识概念,我们还是不禁相信杜·博伊斯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列堡的看法。影子价值系统(shadow system of values)与杜·博伊斯使用的令人难以忘怀的句子相通:"美国黑人的历史即是这种斗争的历史——渴望获得自觉的男子汉气概,把双面的自我合并为一个更好的真实的自我。"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艾略特·列堡很好地选择了术语,特别是从做文章的角度来说。④ 论及影子价值系统意味着论及弥漫于更大社会的强加给下层社会的意识和行为。这类似于杜·博伊斯的美国种族界限面纱的令人闹心的形象。二者之中,种族主义的功效通过集体生活的

① Duneier, *Slim's Table.* 丹尼尔后续的书《侧道》继续沿用此书很多主题。

② 丹尼尔和安德森的观点遭受了在学术期刊中已出版的一定是最长、最卓尔不群的评论文章的非议:Loic Wacquant, "Scrutinizing the Street: Poverty, Morality, and the Pitfalls of Urban Ethnograph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7:6(May 2002): 1468-1432。在华康德攻击安德森都市黑人男性的符码理论的观点中,认为其过于鲜明地把黑人男性二分为高雅的和街闲的两种符码。另一方面,出于上面的和其他原因,华康德严厉批评丹尼尔幼稚地浪漫化地对待他所研究的黑人男性。奇怪的是,在他们对华康德的回应中(在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中的同一期),不管是安德森还是丹尼尔都没有特别的说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管是他们两个还是华康德都没有把列堡的解释当回事——这些男人既是高雅的也是街闲的,同样渴望成为可尊敬的人但不能实现。有人认为,华康德会宣称杜·博伊斯仅是另外一名美国社会学家。如果使用杜·博伊斯的方案,丹尼尔会对他的批评者更具说服力,至少华康德的这个判断肯定是对的。确实,安德森可能是由于采用符号学中的符码作为他的组织手段招致了华康德的批评。但华康德在最大程度上忽略了安德森的符码转换思想,这种思想有指向这种方式的效果——实践被塑造了在结构上组成和正在组成的倾向。

③ W. E. B. Du Bois, *Soul of Black Folk* (1903; reprint, New York: Bentam Books, 1989),第一章。而且,在 1967 年很少有人读到杜·博伊斯,当然他也就不会像今天这样被广泛讨论,虽然这难以置信。这就使下面的事情那么地不同寻常:他的思想没有在华康德和丹尼尔的思想中出现,却显然存在于安德森符码理论的背后。

④ 他指的是海曼·罗德曼的"价值延展"(value stretch)理论,作为影子价值思想的一个来源,尽管很难说延展(stretching)是恰当的措辞。见:Hyman Rodman, "The Lower-class Value Stretch", *Social Forces* 42: 2(December 1963): 205-215。

无意识，而非公开的选择间接地在个人身上体现。[1] 泰利很自觉，他能以很多令人注意的方式哀叹水泥工社会等级的下滑。但列堡想让我们知道，这些人是不同寻常的，他们遭遇了偷偷潜入他们的头脑的复杂系统的影响。

今天有的人会抱怨影子价值系统解释是对都市黑人男性的较弱的心理学解释。但是，如罗伊克·瓦克昆特所说，[2]这样的看法是受美国特色社会学的恶劣影响所致，认为所有的行动要么以心理学的主观意识作解释，要么以社会学的客观结构作解释。或许没人为艾略特·列堡在社会结构理论领域去争得作为开拓者的一席之地（至少是在美国，直到《泰利的街角》出版后十年，结构的社会理论才正式成为争论的主题），但有人可能会坚持认为，列堡的理论直觉是卓越的。实际上，《泰利的街角》是一个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讲述的有关都市黑人男性的故事。这些人的影子价值是他们的处境的结果，而非原因；在影子价值成为任何别的什么东西之前，在一辆寻找日间劳作者的敞篷小卡车驶来街角的时候，街角男人面对的正是这种处境。他们对做那样的日间工作路在何方了如指掌，他们不去就范。真实的人类尊严无法实现，这代价太大了。

这是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在为此版《泰利的街角》所写的导论中，对艾略特·列堡充满敬意的原因之一。几乎很难再找到一名社会学家像威尔逊这样，以其充满活力的对都市黑人男性的社会经济的和结构的分析而著称。那些大的结构性力量在这些人——他们是受到城市政治经济压制的主体——内心施以作用，而威尔逊没有在对其效果的艰难的细致考察面前却步。这种城市政治经济，除了内在的种族主义之外，没有

---

① 相反地，安德森符码隐喻的变通性是，当他尽力解释街闲的（street）和高雅的符码化的男人和女人的双重意识时，他必定提及符码转换——一种相对理性的决策。而且，应该说罗伯特·K. 默顿 1938 年的经典文章"社会结构和失范"，很明显是列堡思想的基础。但实际上，列堡在默顿方案的关键点上有所改进，这又把对结构困境的调整让给更加理性的适应性过程来解决。

② Wacquant, "Scrutinizing the Street," 1520-1527.

为都市中已处于贫困的黑人男性提供体面的职业。[①]

需说明的是，必须相信列堡已经意识到在此种情形之下，用文明的凝视方式——这属于板起面孔的分析类型——研究这些人，是做不到的。是的，在田野工作中，列堡无疑亲眼见到了在这些人身上正在发生什么以及他们如何理解自己。但眼见只是好的民族志的开始。实际上，最好的对人的书写，与其说来自对其奥秘的洞察，不如说来自对其言外之意的敏锐听闻。过于相信自己视觉敏锐力的作者会妄下断言。列堡不这样。他的书写多来自耳闻，他信任自己的亲耳所闻，然后写时没有拙劣的不懂装懂，而这常常减损社会学书写的可信性。他没有选择严谨的独特的分析概念来解释这些人，而是用了挥之不去的影子——正是这种影子，使这些都市黑人男性的生活不见天日，在谈到自我价值时萦绕在他们心头的是绝望。

列堡所拥有的这种写作的灵敏性，其巨大价值是，它允许读者进入故事，与研究对象建立联系，从自身处境观看他们的不同之处。当然，《泰利的街角》不是泰利或其他哪个人写的，也不是为他们而写。在写成之时，它是为百万读者而写，这些读者来读此书时冒着牵连到他们自己的危险。都市中黑人男性的故事最终是现代城市自身的故事，进而是后现代全球经济的故事。在接近尾章时，故事没有着落。

艾略特·列堡的书中最美好的东西是，他邀我们跨越最遥远的社会距离，来到这些人当中——这些人已不再像从前那样生活在街角，那个街角已无处可寻。在故事中，如果我们如列堡一样视野开阔，就能在无情的结构系统中找到我们自身的位置，正是这无情的结构系统剥夺了像泰利这样的男人的希望。

查尔斯·莱默特

① 威尔逊自己已写了有关可称之为聚居区相关的行为的社会心理学著作，见：*When Works Disappear: The World of New Urban Poor*(New York: Alfred Knopf, 1996)，第3章。也见小奥尔福德·杨(他在芝加哥研究中与威尔逊共事)的优秀著作：*The Minds of Black Men: Making Sense of Mobilit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1967版前言

艾略特·列堡的这本著作敏锐、适时,泰利的街角位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华盛顿内城区一个破败的部分,无所事事的黑人男子来来去去,多多少少有点规律地聚集在这儿。他们复杂而有限的生活,就围绕着位于泰利的街角的外卖店这个固定的地点启动和展开。

外卖店、自助洗衣店、音像店最近在黑人聚居区数量猛增。他们出入小酒馆、桌球房、酒水店、街角杂货店、出租房、二手商店、信贷公司(credit house)、当铺、工业保险公司、临街的(Storefront)教堂,这些作为独特的都市设置复合体的组成部分,为了适应内城区居民的有效需求、有限选择和不同品味,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内城区的外卖店除了提供备好的食物外,还发挥着很多功能。其中,它们可能会作为非正式的交流中心、讨论的场所、展示和评估才能的地方,以及各种行为上演的舞台,不管是合法的、非法的抑或是法律之外的。尽管这些设置存在于城市的中心地区,但它们像是位于边区——外来人口聚集于此。

在我们的城市中,围绕着黑人聚居区的危机正在恶化,这表明,对于当前我们所有人来说,关键问题是如纳森·凯菲茨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如何“同时跨越这些一致的界限”①:收入、种族、教育、居住。这些界限把贫困人口与中产阶级隔离开来,尤其是在我们的城市中。

本书大部分是有关这些穷人和处于贫穷边缘的都市黑人男子的行动的,也是关于经典的脱轨行为(acting-out behavior)的,以及不同层次上的反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泰利的街角》在关注点上与拉尔夫·艾利森的经典小说《隐形人》类同,正如其之于威

① Nathan Keyfitz, "Privilege and Poverty: Two Worlds on One Planet,"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ces*, (March 1966)

廉·富特·怀特的社会学经典《街角社会》;与尤金·奥尼尔的《送冰人来了》类同,正如其之于肯尼思·克拉克的《黑暗的黑人区》或李·雷恩沃特的《认同的考验:黑人下层家庭》。

列堡博士对这些街角黑人男子适应习性和活动场所当前的中肯描写,与他在为国家都会地区健康福利委员会的儿童抚养研究所做的田野工作早期自己的某些发现不无关系。他敏锐地意识到了在黑人与白人、受过教育的和没受过教育的、穷人和非穷人之间的关系与角色和行动混合在一起的方式。

在对泰利的街角及周边的男人女人做了为期一年的研究之后,列堡博士写道:"[位于我们之间的]链锁连接的樊篱,尽管存在这个障碍,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对方,各自沿着自己的一侧边走边谈,偶尔会有手指接触。"出于尊敬和谦逊,他又说:"我过去常常思索,或许我不是我所认为的那样是完全的局外人。后来发生的某些事,以及对田野资料的阅读,使我从这种特定的轻微自负中醒悟。"

认识到这种障碍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艾略特·列堡认识到,作为一名白人男性,自己与活动在泰利的街角的黑人男性之间摇摆不定的界限,不仅仅也绝不是简单地与种族差异有关。也关涉到收入、受教育程度、居住和气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与这些因素相关的立场与应答交织在一起,作为令人困惑的方法论上的和个人的问题同样发生在威廉·沃森身上,他是一位黑人田野工作者,同时被派到同一个地区几个月,与同一批男人和女人打交道。

列堡博士对街角男人世界进行的深入分析,有效地解释了在面对组织瓦解、不安全因素、反社团力量时——这些在当代都市贫民窟当中汇集和运行——这些人所做出的生存和反抗的努力,但付出巨大。像经受无情压力和灾难性打击的其他人一样,这些人退而求助于初级群体;他们利用友谊和亲密无间的伙伴系统在必要时作为支撑和缓冲物,用来保护尊严,使失败合理化和不为人知。

街角男人的适应过程有一种临时回归和虚构的特点。首先,列堡发现街角世界的整个社会结构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初级的、面对面的个人关系网络之上"。列堡所强调的一点是,这种关系几

乎完全建立在当下："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来说，两人之间的友谊表现为一种彼此没有交心的关系。"街角男人的强烈吊诡之处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位于认可的和不认可的友谊构成的复杂网络中，尽管有必要拥有或使用友谊。

对这些没有着落的男人来说，如对所有男人那样，友谊是安全和自尊的来源。街角男人稳定感差，选择余地不大，这就使他们产生了这种动机："对友谊心存幻想，使友谊更上一层，把别人认为的点头之交提升为友谊，把友谊提升为亲密的友谊……好像友谊是凭意愿人为制造出来的，一种心所想的友谊，两个人之间的一种私下的协议，行动上表现得像好朋友，而不是两个人的关系真的如此。"

第二，因为街角为这些有点不知所措的男人提供了有意义的他人进行对话，这就帮助某些人得以承受失败的经历或即将到来的失败，至少是暂时的。在街角，"失败被合理化为虚幻的成功，弱点被神奇地转变为优点"。街角男人在很多方面是骗子和伪装者。他们的很多行为是"努力实现更大社会的诸多目标和价值，没有做到而对他人和自己又竭力掩饰其失败的方式"。

这里列堡所描绘的街角男人是典型的失败者；他们是没有任何前途的人，而且他们知道这一点。因为有严重的缺陷，以及缺少教育和技能、收入不足，他们举步维艰，他们徘徊在一种前所未有的边缘地带———种介于相对稳定的向上移动的中下阶层工人和被遗弃的人、游民之间的社会环境。

这项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大大有助于把街角黑人男子从其他城市黑人类型——不管是下层社会的还是中产阶级的——中分离出来。大大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像街角男人这样的"失败者"产生的过程，以及某些人调整的方式：回归原始。它没有给我们讲述——也没有试图这样做——那些以某种标准衡量算作"成功者"或至少不算作如街角男人般的"失败者"的黑人男性。它也没有直接给我们讲述沃茨（Watts）、芝加哥、罗彻斯特、克利夫兰和其他城市中心 区的那些街角黑人，他们回归原始的行为不那么特别显著。

尽管列堡博士不可超出泰利的街角这个地区，但他在描述、解释这些男人和女人时所用到的方法论，所具有的洞察力、真诚和同情，帮助我们理解所有这样的男人：面对是"输家"或很可能是的事

实，没有完全放弃对尊严的诉求，在这方面他们没有输掉。

列堡博士给了泰利的街角的男人和女人们尊严，指出他们是复杂的，并不简单，肯定他们在这个社会里是最好的，即使有时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

黑伦·刘易斯
霍华德大学
1967年1月

导言 2003版

一本经典图书的真正标志是看它是否能经受时间的考验。艾略特·列堡的《泰利的街角》写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而他关于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一个黑人聚居区的街角黑人的工作经历和家庭生活的论点在今天依旧令人信服。实际上，列堡或许是第一个学者，对下面的事实予以了恰当的强调：在劳动力市场上持续的不成功会降低一个人的自信，并使他萌生退意，这常常导致他暂时地甚至是长期地放弃找工作。"最重要的事实是，有能力且愿意工作的人不能挣到足够的钱，用以养活他自己、他的妻子和一个或更多的孩子，"列堡表示。"只有有人心甘情愿让赚到的钱低于生活所需的花费时，才可能长久地工作下去，有时即便是这样也难做到。"

列堡的研究中，地位低下的黑人男子所从事的工作，往往单调乏味，可扭断脊背，而通常薪酬很低。在这种工作中得不到尊重和地位，而且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提升的机会。因此，街角男人像社会中其他人一样瞧不起这样的工作，就不足为奇了。"从一项他人没有赋予某种社会价值的工作中得到此种社会价值，他们做不到。"可以理解，街角男人有着飘忽不定的工作经历。干粗活的职位很容易获得，劳动者从一个不称心的工作漂到另外一个。

然而，如果说列堡在20世纪60年代实施他的田野研究时，低技术黑人的职场预期黯淡，那么今天情形甚至更糟。在刚过去的三十年中，低技术的非洲裔美国男性在找工作上遇到了更大的困难，甚至是在干粗活儿的工作上。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进入2000年的经济繁荣期，所有低技术工人的就业率和工资提高了，但在写作此篇时，国家的失业率有所反

弹，正在经受经济停滞。失业率正在回升之中，尤其是在内城区。街角男人这类人的数量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后膨胀，其中那些有劳动能力而日常从事和忍受着低工资工作的成年男性的比例在不断增长中(Wilson,1996)。

自列堡著述《泰利的街角》以来，是什么导致了低技术黑人在职业预期中的恶化？尽管黑人在劳动力市场上仍然遭遇种族障碍，但众多内城区非洲裔美国工人成了对低技术劳动力的相对需求降低的牺牲品。计算机革命(即新技术的传播)正在摒弃低技术工人，而宠爱那些受到更高级的培训的人；经济活动的日益国际化，包括贸易自由化政策，逐渐把美国的低技术工人推向与全世界的低技术工人直接对立的境地。这些变化使受过高等教育或高级训练的工人受益，而较低技术工人所面临的削减工资和撤岗的威胁逐渐增强(Katz, 1996; Schwartzman,1997)。

在美国，历史性的种族主义的遗患之一是，非技术的非洲裔美国工人在数量上的不宜比例。相应地，由于对低技术劳动力的相对需求的降低，相对于白人，黑人所受到的不利影响更大。虽然有技术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数量(包括经理人、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在过去几年中有了显著的增长，但那些无技术的所占比例仍然较大。为什么呢？因为由于受到连续而渐强的种族限制的阻挠，黑人人口绝大多数直到20世纪中期仍是无技术的(Schwartzman,1997)。

经济学家哈利·霍哲最近的一项对都市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显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基于对亚特兰大、波士顿、底特律、洛杉矶的3 000名在职者的调查，霍哲报告说，在中心城区面向非大学毕业生的职位中，仅有5% ~10%需要很少的认知技能和工作资历。只要工人有基本的读写和进行数学计算的技能，或者懂得如何操作计算机，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奖金。而且，在霍哲的研究中，大多数雇主要求有高中学历、工作背景，以及某种特定的工作经验。假如非技术工人相对于低技术职位供应过量，那么很少经过培训的和受到较少教育的个人，即便是在当地经济处于强势时，也会难以落实工作(Holtzer,

1996;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1996)。对于男人尤其如此。

今天,受教育不多和工作经验缺乏的工人所能找到的新职位大多在服务部门,较多的妇女受雇于这个行业。较低技术男人向经济的新增部分移动的速度较慢。例如,"男人移向所谓的粉领工作如经验护理(practical nursing)或文书工作(clerical work)的数量仍然是微不足道的。"(Nasar,1994)实际上,在最近的职位增长中显著的性别差异,可部分归因于大量妇女在扩张中的社会服务部门内的集中。不像受教育程度低的男性一样,受教育程度低的妇女就业数量较前几年有了增长,而不是减少。受教育程度低的妇女的职业类型,像那些受过高级训练和高等教育的人一样,反映了社会服务业的增长(Lerman and Rein,即将出版)。

对于内城区黑人男性劳动者来说,对劳动力相对需求减少所导致的问题,由于雇主的负面态度而更加严重。我的研究小组在20世纪80年代对芝加哥地区一个雇主的代表样本所作的访谈显示,绝大多数雇主认为内城区的黑人男性无知、不易合作、没长性或不诚实(Wilson,1996)。例如,一位市郊药店经理如此评价:

> 但很不幸,在我的生意中,我想人们往往认为黑人都不诚实。我想那样太糟糕了,但那就是他们的形象……人们认为他们懒惰。他们是这样[大笑]。但我讨厌说这些,但是,毕竟这就是他们的形象。是不是真的这样,我不知道,但它是一个被感知的形象。(访员:我明白。你认为这形象会怎么发展?)被访者:去监狱看看吧[大笑]。

一家市郊电力服务公司的雇主,对偷盗行为顾虑重重,对不雇用内城区黑人男性做出了与众不同的解释:

> 如果你是在白人区……你有一家制造公司,聚居区的人去那里应聘,什么样的肤色无关紧要……如果你知道他

是哪里来的，你就知道了一些事情。其一是如果你在那儿给他提供一份工作，他会难以置信地被迫把消息传给他在聚居区的同类群体……有关安全系统的消息，在那儿进出的有价值的东西有被盗的危险。他不是一个盗贼，他也不想加入，但他生活在那样一个地区：如果不向他周围的人提供信息，他可能受到身体上的伤害甚至有生命危险。作为一名经理人，我知道这个。我不会去雇用他，原因就在于此。我不是因为他是黑人就排斥他，排斥他是因为他会给我带来问题。现在，他是黑人，恰巧他周围的人也是黑人，这个事实只是巧合。在华沙，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有同样的问题。

一家内城区制造公司的老板，对从某个聚居区雇用黑人男性，表达了另外一种疑虑：

如果某人给了我他的地址，嗯，卡夫里尼·格林，我可能不可避免地有些顾虑。

访员：什么顾虑？

被访者：那个可怜的家伙不能胜任工作也许会是常有的事，还有……和别人相比，也许我会更加小心地盯着他，即便这是不公平的。①

这样的态度是经济学家所谓的统计性歧视的典型例子：雇主对内城区黑人男性劳动者作出一般的假设，并依照此假设作出决定，而不是系统地评价个体应聘者的资质。实际结果是，很多内城区黑人男性应聘者从未在个人层面上得到证明自己

① 由于这种态度的普遍存在，对于黑人男性来说，缺少进入非正式职位网的渠道是突出的问题，这在下面这位雇主向我们的访员作的一番评价中可以看出："除非他已经入行，否则他们不会出乎意料地瞅一下这个家伙。上次我雇用这个黑人孩子的原因是，我的邻居对我说：'是的，我用了他几天，他不错'。我说：'你知道，我想碰碰运气。'但这是有人推荐。而如果不是那样，我得到的是不是一个叛逃者都很难说。我总是在想，一个人面对一个黑人，他会有点犹豫。我不知道。"

资质的机会。尽管因为劳动条件和低工资的缘故，确实有些人有意逃避初级(entry-level)工作，正如《泰利的街角》中的某些人，但还是有很多人打算接受这些职位。尽管统计性歧视代表着对贫困的内城区劳动者的阶级偏见的元素，但它很明显是一种种族歧视。与应聘同样职位的拉美人或白人男性相比，内城区黑人男性被十分有效地筛除在外。

不幸的是，雇主对内城区黑人男性成见的负面效果混合了经济结构的重组。向服务业的转型，导致了对那些能有效地服务顾客、与顾客打交道的人的更大需求。最近在低工资的服务部门，妇女和迁入民的从业规模扩大了，而很多雇主感到内城区的黑人男性缺少这种素质，在劳动力市场中对他们的拒绝渐次增加。

这样，由于对低技术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减少，内城区的黑人男性被迫转向低工资的服务部门谋职，在这里他们与增长中的女性和迁入民劳动者竞争，往往不成功。愈加抱怨或表达他们对工作的不满，似乎愈不为雇主所青睐。因此，在谋职时他们遭遇了更大的歧视，并且在被雇期间屡次与监工发生冲撞(Wilson，1996)。既然很多内城区的黑人男性对他们的工作和工作预期的感受的表达，反映了他们在经济转型中急遽下降的地位(Wilson，1996)，那么把态度和其他文化特性与机遇结构联系起来是重要的。这些文化特性之中，父亲职责的履行是其一。

实际上，街角男人中对父亲职责履行的缺失，是一种出自机遇和束缚有限的文化问题。在列堡写作《泰利的街角》时是如此，在21世纪初甚至更是如此。尤其要指出的是，今天很多内城区做父亲的，甚至那些非典型的街角男人，在履行父亲职责时，都没有发挥足够的自我功效(self-efficacy)，不管他们愿不愿承认。在父亲职责的规范中，包括为家庭提供充足的和持续的物质支持的责任。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连续不成功，减弱了很多内城区男人充分供养孩子的能力，进而降低了他们作为养家者的自信，产生了与孩子母亲的敌对关系。一种为处于限制性的经济环境中的男人所共享和加强的便利理性化

(convenient rationalization)显现,他们拒斥婚姻设置,以这种方式提高而不是削弱自尊。后果是,在履行父亲职责上他们未能达到社会规范的要求,这种失败甚至比列堡在《泰利的街角》中所报道的更加广泛。

聚焦在与父亲职责有关的文化问题上的计划,如果没有应对有限经济机遇中的更广泛的和更基础性的问题,获得成功的机会不大。我认为,在内城区最有效的父亲职责计划,是那些专注于态度、规范、行为,结合本地和国家的努力,以提高对工作的预期的计划。只有那时,父亲才会有现实的机会去充分照顾他们的孩子,自己也会看到美好生活的曙光。如果在《泰利的街角》中对父亲职责的敏锐分析成立,那么如果艾略特·列堡今天还活着,我确信他会同意。

威廉·米利叶斯·威尔逊

参考文献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1996. "The Administration's $ 3 billion Jobs Proposal," Washington, D. C.

Holzer, Harry. 1996. *What Employers Want: Job Prospects for Less-Educated Workers*. New York: Russell Sage.

Katz, Lawrence. 1996. "Wage Subsidies for the Disadvantaged." Working paper 567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ss.

Lerman, Robert I., and Martin Rein. Forthcoming. *Social Service Employ-ment: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New York: Russell Sage.

Nasar, Sylvia. 1994. "The Men in Prime of Life Spend Less Time Working."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

Schwartzman, David. 1997. *Black Unemployment: Part of Unskilled Unemployment*.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Wilson, William Julius. 1996. *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致谢

本书原作系为美国天主教大学(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人类学的博士论文而写。现在这个版本与原论文没有实质差异。

作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低收入家庭中的儿童抚养习惯”这一研究项目的田野工作者,我在1962年1月至1963年7月收集了有关街角男人的大部分数据。儿童抚养研究由美国国家都会地区健康福利委员会在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授权(OM-278)下予以实施。黑仑·刘易斯(Hylan Lewis)博士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把街角男人作为直接调查的对象是他的主意和决定。他在儿童抚养研究期间为我提供这个工作机会,并且我从他那里获得了很多有关低收入人口的洞见,对此我充满感激之情。

我也感激美国天主教大学人类学系的成员们:我的指导教授戈特弗里德·朗(Gottfried Lang)博士,他付出了时间,给予了忠告、指导和鼓励;里贾纳·弗兰纳里·赫茨菲尔德(Regina Flannery Herzfeld)、迈克尔·肯尼(Michael Kenny)和贾斯珀·英格索尔(Jasper Ingersoll)教授,他们给了我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富有建设性的建议,还对各类初稿进行了批判性的阅读。

罗伯特·雪罗(Robert Shellow)博士,精神健康研究中心青少部的主任,不吝赐予我他的时间和学识。他的鼓励和批评让我对他感激有加。我也感激美国人类学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的斯蒂芬·T·博格斯(Stephen T. Boggs)博士,在我进行分析和写作的初期,他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还有很多其他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提供了帮助。特别要

感谢琼·斯奈德(Joan Snyder)博士,哈罗德·戈德史密斯(Harold Goldsmith)博士,德里克·罗默(Derek Roemer)先生,威廉·沃森(William Watson)先生,米尔顿·萧尔(Milton Shore)博士,托马斯·格拉德温(Thomas Gladwin)博士,以及詹姆士·奥斯伯格(James Osberg)博士。

当然,我主要感激的是街角男人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女人和孩子。不幸的是,全文不得不使用笔名来隐匿他们的真实姓名,但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是谁。我感谢他们。

这项研究中的任何言论皆不代表任何机构和个人的解释、判断或策略,而仅是我个人的。

爱略特·列堡
马里兰州阿特尔斐
1966年4月

目录

第1章 导论

一般而言，低收入城市人口，特别是低收入城市黑人，面临的和造成的问题已成为国家大事之一。我们已经向贫穷宣战，并动员了公共和私有的资源，来齐心协力从国家生活中消除青少年犯罪(delinquency)和对救济的依赖(dependency)。

贫穷人口问题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个多世纪以来，私人慈善机构，有时是州政府机构尝试向我们在社会和经济上蒙受意外灾害的人提供帮助和支持。20 世纪 30 年代，受大萧条冲击，遭受灾害的人的数量激增，显然，既存的慈善机构在应对这样的问题上无能为力；社会公正和个人权利被重新定义，特定的贫困人群——尤其是老年人、残障人士、寡妇和儿童——获得救济是作为一项权利而不再是施舍。

受人口快速增长、技术进步和向城市移民的共同刺激，贫穷人口数量及其带来的问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持续增长。1963 年，贫穷人口占到总人口的 1/4。大约 30% 的贫穷人口是黑人。①

① 数据是基于对贫穷的一种较保守的定义：要摆脱贫穷，普通的四口之家需每人每天约 70 美分的伙食费，每人每天 1.40 美元的其他费用(1963 年物价水平)，或者家庭总收入为每周 60 美元。默利·奥珊斯基的文章《计算贫穷人口数量：对贫穷的档案的重新审视》(Orshansky, 1965)提供了绝佳的有关贫穷的统计和定义的讨论。(原出版者注：2003 年有关消费价格指数和通货膨胀率的最新数据，参见 http://woodrow.mpls.frb.fed.us/research/data/us/calc/.)

公众对贫穷的兴趣往往集中在黑人身上，这有很好的理由。较大比例的贫穷人口是黑人，更重要的是，更大比例的黑人是贫穷人口。更有甚者，贫穷黑人与白人相比往往会变得更穷，往往几代人都处于贫穷之中，所以贫穷，像肤色一样，表现为遗传的特征。贫穷也作为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状况而存在。贫穷的生活方式代代相传，这顺乎情理地使人注意到黑人家庭生活作为情境的存在，贫穷生活的传递就在这样的家庭生活情境中发生。在更大程度上而言，黑人家庭已经成为依附的、下层的城市家庭恰当的典型，成为反贫困斗争的政策制定和方案制定的主要对象。

然而，对妇女和儿童的强调，以及相应地对成年男性的忽视，使我们对贫穷黑人家庭的认识有失偏颇。对下层社会男性的忽视，是在家庭中男性特有的“缺位”(absence)的直接反映。他们留下的是以“女性为基础”或以“女性为中心”的家庭，通常由一代或两代女性和未成年人组成。缺位的结果之一，低收入城市群体的家庭研究，往往是针对以“女性为中心”的家庭，以至于给人留下低收入城市区主要由妇女和儿童居住的印象。如果成年(黑人)男性不是简单地以“缺位”作为特点，那么他们也是以有点儿朦胧的形象出现，游移于其他家庭成员生活内外，行踪不定。

中产阶级对青少年犯罪和依赖性的关注，使成年男性更加被忽视，他们没有成为下层人群生活研究的主题，因为青少年犯罪和依赖性作为贫穷的表现，直接关涉到中产阶级的生活。青少年犯罪威胁到财产安全、邻里和谐和整个社会的良好秩序；依赖性导致钱被花光。但是对青少年犯罪和依赖性的研究，通常只是偶然涉及成年男性。青少年犯罪(delinquency)所指的青少年行为是词中应有之意，因此，从定义上说，其排除了成年男性。类似地，依赖性通常留作为妇女和儿童的形象。这想当然排除了强壮的成年男性，认为他们不需要或不配得到社会的支持。

社会赋予儿童很高的期望，并越来越确信童年时期正是

尝试破除“贫穷循环”的时期，这强烈支持了青少年作为关注点，进而促使社会去研究青少年犯罪和依赖性。一般认为，去改变成年人的价值观、生活目标、生活方式为时已晚，但也许改变孩子还有时间，他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还没有在传统模式中定型，这种模式是由他们的父母或下层社会的生活环境塑造的。

从纯实际的层面来看，下层黑人男性没有进入研究视角，只是因为他们相比妇女、青年和儿童更难接触到。研究人员在家中很难见到他们，对于案例调查员和人口普查人员也是如此。① 或许除了要接触警察外，他们与妇女儿童相比，不太可能受到官方关注。青少年得到教育部门、社会工作者、卫生工作者、缓刑犯监督官(probation officer)和监护代理人(custodial agents)的关注；妇女，代表她自己和她的孩子，可以得到福利部门和其他机构的审查，因为只有透露自己的底细后，她才能合法地享有提供的物品和服务。

不管受到官方关注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的相关数字是多少，事实是，我们对下层人群生活的主要了解来源于官方统计。这对研究和公众行为都产生重要影响。公众对青少年犯罪和依赖性的关注或许本已过分，由此更是得到加强，而且往往关注青少年犯罪和依赖性的当事人，而青少年犯罪和依赖性发生的情境却相对被忽视了。

此外，专门或主要研究那些非常容易见到和接触到的人，产生了方法论和分析上的重要问题，更不用说报道人和被访者的代表性问题了：当逃学者、重刑犯、被遗弃的孩子，或申请贫苦儿童援助的妇女得到官方关注，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的时候，从某种真实的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在可控的外来的环境中被俘获的报道人。

---

① 关于该问题的讨论可以参见本书第9页的注释②。

这样，显然有必要把研究的范围扩展到下层人群的生活。[①]但是还存在其他问题。例如，研究者对已收集到的大量数据的效度感到越来越不安，尤其是那些通过访谈和问卷收集到的数据。对详细数据的迫切需求伴随着广泛的疑虑，与中上层人群相比，难以通过访谈和问卷技术获得下层人群的数据。所以科恩和霍奇斯[②]在对下下层人群特点作出的结论进行评定后，告诫说："当访谈和问卷技术是应用于下下层被访者而不是其他阶层的被访者时，很可能绘出这样一种'漫画'：图画中的中间色和影线被涂抹掉，而它们是存在于主题之中的。"

此研究试图在下层平民熟悉的范围内和条件下，记录和阐释他们的生活。公布和分析的数据，作为我的一项研究的一部分，由我直接收集。这项较大的为期五年的研究，叫做"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低收入家庭中的儿童抚养习惯"，由美国国家都会地区健康福利委员会在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授权下予以实施。黑仑·刘易斯博士，这项研究的项目负责人，为收集材料而制定的规则并不严格和周密，但研究大纲清晰，重点突出。收集数据的方法是参与观察，而不是问卷和结构性访谈。收集数据的目的是为了描绘出一个清晰的一手的下层黑人男性特别是那些街角黑人的图像，而不是检验特定的假设。调查

① 例如，穆扎费尔和卡罗琳·谢里夫在《不同情境下群体中的青年》这篇文章中指出，"我们有关于'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的丰富理论，但除了那些进入官方统计数字网络的人以外，这些理论与当事人几乎没什么关联，也不关注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Sherif, Muzafer, and Carolgn, 1963:38-39)S. M. 米勒讨论了给"下层社会"定义时达到恰当标准的困难，他说："我们缺少关于穷人与经济上和家庭不稳定的人群的基本数据。"

② 见 Cohen and Hodges, 1963:333；约翰·劳雷尔和孟若·爱德蒙森表达了对他们的访谈相似的疑虑："我们也注意到，但更无力应对，把下层社会人群引入中产阶级参与网络的困难，而中产阶级参与网络是我们的访谈所必然包括的"(Rohrer and Edmonson, 1960:309)。S. M. 米勒和弗兰克·雷斯曼指出，认定下层社会和中产阶级的访谈对象作出的特定的回应有同样的意义是危险的(Miller and Reissman, 1961:92)。在这一点上，也见 Lewis,1961:27。黑仑·刘易斯肯定了访谈的价值，但又说，"(在低收入家庭研究中，)一次性的结构式访谈不能提供给我们急需的某种信息……当前……迫切需要意识到——并且尽力去记录和阐释——低收入家庭和组织中的复杂性、变迁和变数"(Lewis, 1962:4)。

的中心是父亲、丈夫或其他家庭成员，但有意没有设定什么相关的和不相关的假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详细的研究设计，目的是很具探索性的。

数据源于1962年为期12个月的集中参与观察和1963年头六个月的断断续续的参与观察。[①] 数据跨越一年四季和昼夜24小时。

大量的材料来自24个黑人男子，他们在华盛顿的第二辖区共用一个街角，作为活动基地。这些人是没有技能的建筑工人、临时壮工、零售业或服务业中干粗活的，或者失业者。他们中年龄小的刚满20，年长的45岁左右。有的单身，有的已婚；已婚的，有的和妻子及孩子住在一起，有的没有。

这些人经常光顾街角、小巷、走廊、桌球房、小酒馆、近邻的私人住所，数据的主体部分就包括他们每天的例行生活的记录。然而，发生在街角的人员交往时常把我的视野引导出这个地区，转到法庭、监狱、医院、舞厅、长凳，以及华盛顿、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各个地方的私人住所。

既然没有在数据中构筑"意义(sense)"——也就是说数据的收集既不是出于检验特定假设的目的，也没有提前设定假定——那么现有的分析是对数据事后(after the fact)给出意义的尝试。[②] 我把街角男人作为数据呈现和分析的框架，他们以养家糊口的人、父亲、丈夫、情人和朋友的角色出现。这个框架

---

① 我参与儿童抚养研究的时期。虽然后来我与这项研究已经没有关系，但在访谈地建立的个人关系并没有完全结束。与几个人建立的关系在写作时还维持着。我自由地使用这些仍然存在的关系作为特定的例子，并且用它们获得一个长期的观察。

② 在这种程序中，观察唾手可得，阐释也随即应用于数据，罗伯特·K.默顿称其为"事后(*post factum*)社会学阐释"。这种解释，他说，"保持在貌似有理(低证据价值)的水平，而不是通向'令人信服的证据'(高程度的证实)"，而且，"这些记录证据仅仅是阐明理论而不是证实理论"(Merton, 1957:93-95)。需要指出，我相信，假设阐述的时机选择是无关紧要的，不管假设是在事前还是在事后产生，它们的有效性的检验都有赖于将来的回应；而且对假设或解释产生唯一恰当的限制是它们适用于数据。即便认为默顿的看法是正确的——毕竟是一个貌似合理的观点——我自己的感觉是，在目前的技术状态下，我们几乎不能期待人们行为的"仅为貌似合理"的解释。赫伯特·J.甘斯的《都市中的村民》(Gans, 1962:347-348)和霍华德·S.贝克尔的《参与观察中的推理和验证问题》(Becker, 1958)中有对这个问题的绝佳的讨论。

的简约性是它的主要优点之一。另外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优点是,材料很容易、几乎是顺乎自然地落入这个框架。这种自然而然的契合来自这样的事实:我们把他们看作父亲、丈夫、情人、养家糊口的人,等等,与他们看待他们自己的方式一样。不管在这里是否涉及文化普遍性,在行为的这些分类中,这些角色是被社会共同认可的,在下层人群和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中都是如此。无可否认,某个角色所实施行为的种类可能会依阶级的不同而不同,或在同一阶级内也不同,但角色标签——就是行为被分类的方式——本质上一样的。①

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者围绕父子、夫妻、朋友和情人关系组织材料,人们也会以这样的方式组织自己的生活。站在被观察者内部角度,更易避免以远离材料本身的方式组织材料。

还有,另外一个优点来自这种研究框架。围绕角色和关系组织材料,在社会上其他地方被广泛认可,其分析结果可与来自中产阶级行为或其他下层人群的类似模型进行直接对比。

在这里,无意于去描述任何我没有直接接触到的黑人男子。描述和阐释的材料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华盛顿或其他城市的其他任何地方的街角黑人男子,或者在这个或另一个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下层社会男性,是进一步和后续的研究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里研究的是独特的甚或与众不同的人和关系。实际上,大部分证据指向另外的方向。人和社区样本的选择,确实都不是来自随机抽样或者其他成熟的选择技术。事实上,他们压根儿就不是有意识选的;对这几个在特定的地点出现的特定的人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②。但要记住,这种偶然没有发生在月球上、菲律宾或北达科他州某个小农庄,而是发生在美国大城市的中心,发生在黑人贫民窟区的核心地带,发生在街角,在这里,可以看到人们整个白天和夜晚的很长时间都在游荡,这很重要。

---

① S. F. 纳德利强调了角色标签或角色名称(“父亲”“情人”)的重要性:“……常常是社会中不同阶级或类型的人的现有名称,首先提示给我们各种角色的存在”(Nadel, 1957:33)。

② 见附录:“田野经历回顾”。

在观察者眼里，这些人和这个街角没有什么不同凡响。在任何方向上一两个街区之外，城市的其他区域，或更大的北都市区，看起来都没什么两样。这个特定的地区与那些被报道的国家的其他地区，在城市贫民——尤其是城市黑人贫民——日常生活的总体结构和文化特征上，拥有很强的相似性。以“女性为基础”的家庭是很普遍的。“接力赛式的一夫一妻制”(serial monogamy)是婚姻的重要形式。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把大量时间都消耗在街上、街角，他们坐在窗前，或斜靠在窗户上。妇女们时常烫了卷发，穿着露脚趾的凉鞋或卧室穿的拖鞋，出现在公共场所。自动唱机、留声机、收音机放出的音乐声随处都能听到。调情、觅偶、赌博、酗酒是成年人生活的主要内容。烦恼、刺激、宿命、没落(fall)(害怕在社会等级中再次下降)成为生活的“主旋律或主旨……在这些领域和问题上，予以了持久的情感上的重大投入。”①

那么，当前的尝试，其目的不是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特定的一些下层社会的人中，直接得出关于下层人群生活的一般化结论，而是检视这个微小群体，试图了解所见所闻的意义，并为他人做出解释。寄希望于后人会从某个观点中发现价值(也许没有哪种观点是新颖的，但这些观点都由此特定研究而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所有观点都是原创的)，并系统地检验它们的效度和适用范围。除了概括性陈述之外，结尾一章还包括对黑人与白人关系的一般化陈述和推测，这可能看起来在掩饰上述的意图。

---

① 这些特征选自：Miller, 1957。米勒把“女性为基础”的家庭这样定义，“在其中承担父亲角色的男性，要么在家庭事务中缺位，只是零星地出现，要么即便出现，也只是最小程度上或并不一贯地卷入养育孩子的事务。这样的家庭通常由一个或几个女性组成，她们处在抚养孩子的年龄，往往有血缘或姻缘关系；而且经常包括两代或几代妇女，如除了主要负责抚养孩子的女性外，还有她的母亲和/或伯母。”他把“接力赛式的一夫一妻”的婚姻类型定义为，“处在抚养孩子年龄的妇女，在其生育年龄期间，前后相继有二至六个或更多的配偶，他们只是维持短暂的关系”，见第13页注释。也见：Miller, 1959。

新政外卖店(The New Deal Carry-out Shop)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商业区的一个角落。[①] 如果愿意的话,从这里可以步行到达白宫、史密森学会和国家首都的其他主要公共建筑,但没有人这样做。外卖店的街对面是一家酒水店。十字路口的另两个角分别是一家干洗修鞋店和批发管道设施的展室和货栈。

从外卖店向北走三个或更多街区,会依次经过一个居住单元相当统一区域(通常为陈旧的三层红砖房,大部分很早以前就成了出租房)、临时公寓房和小商业区,如酒水店、杂货店、理发店、洗衣店、自动洗衣店、美容店、弹子房、外卖店、小酒馆、当铺等。住宅单元集中在街区的中央,当靠近街角时逐渐减少,被商铺代替。

十字街周边紧邻的地区几乎全被住满了。这里也是三层红砖房和临时公寓房,但街角杂货店、尖顶的教堂或临街的(storefront)教堂、停车场、丧葬店或一些小的经营场所也到处可见。外卖店南面一个街区外有一条宽阔的大街,把外卖店地区与市中商业购物区大致分开。

外卖店地区的住户几乎全是黑人。受人口普查报告和其他公共信息来源的影响,一个随意的观察者会很容易证实他的印象,这是一个居住拥挤、贫穷、犯罪、孩子放任不管、依赖救济的发生率很高的地区。例如,这个特定地区在健康福利委员会的"1960 年哥伦比亚特区社会经济匮乏指数"中排行第一;接受公共补助的人口比例最高;非法的活婴出生率最高;没有接受产前护理的出生率最高;有资格获得食物补助的人口比例排行第二;有资格申请获取医疗补助的人口比例排行第三。

---

① 华盛顿特区在很长时间里已成为黑人的主要驻留地之一,这些黑人从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迁往东海岸。1963 年,华盛顿是本国唯一居住黑人数量多于白人的大城市。1962 年的人口是 791 900 人,其中 452 200 人为非白人。这些数字适用于常住人口。在工作日的早上,华盛顿与周围的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郊区进行人口交换。城市向郊区放出黑人妇女,她们在那里当佣人和招待,而白人白领男性从郊区进入城市工作。工作日结束,城市和郊区恢复原状。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贫穷、依赖救济和有不良行为,①也不是这个地区所有的人总是游荡在街角、小酒馆、弹子房或走廊。有些人也住在外卖店前的这条街上,为了养家糊口做两三份工作,他们会把醒着的时间分成两部分,分别用在家里和工作上。这样的人在外卖店和这个地区的其他公共场所见不到。②

外卖店一周七天都营业。两个女服务生分两班倒,她们主要精力用在为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倒咖啡,开碳酸饮料瓶,和上汉堡、薯条、热狗、"半熏香肠"(half-smokes)③和"潜艇堡"。④顾客会把这些食品带走或站在这里吃,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坐。但这里有一块10英尺×12英尺的地方供顾客使用,客人们可以倚在墙上和其他设施上;这为他们提供了处理外卖店地区事

① 很多人是这样,但也有很多人不是这样。例如,生活水平参差不齐:在一端,是一个十一口之家,包括七个孩子,还都尿床,他们生活在同一间房里,睡在同一张床上,挤在狭窄的儿童床上,或睡在地上。另一端,是一个能自给的四口之家,拥有干净的三居室住宅,窗上挂着炫目的花窗帘,客厅里一只金丝雀与高保真的留声机竞相歌唱。差距是巨大的,但拥挤不堪、家徒四壁的这一端比例更大。

② 因此,这项对外卖店地区男性的研究存有偏见,因为忽视了那些在街角的明处见不到的人。很难说这样的人有多少,但我知道是有一些的,因为我碰到过几个。我认为这样的人比通常假想的要多,但比人口普查报告中统计的要少。在人口普查报告中,有稳定工作的和有家室的男性的比例往往被高估,因为相对应的失业的、不大稳定的街角人口经常不被计算在内。所以一份劳动部的关于黑人家庭的报告(莫伊尼汉报告,the Moynihan Report)坦言,很多(低收入)黑人男性"当普查人员来的时候恰好不在场"。这份报告指出,"唐纳德·博格(Donald Bogue)和他的同事已经研究了联邦政府对黑人男性的统计,他们认为在28岁的错误率高达19.8%。"(《黑人家庭:为国家行动而进行的案例分析》,第43页)。

③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及周边地区的一种香肠——译者注。

④ 平日外卖店从早上八点一直开到午夜;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开到凌晨四点。星期天直到下午二点才开。除了汉堡、热狗外,还供应热汤(罐装),还有炸鱼三明治和各种冷肉切片。在周末(星期五是大家都发工资的日子)和刚得到ADC(对贫困补助计划——译者注)和社会保险金(Social Security Checks)之后的日子,吃汉堡和"half-smokes"的人有时也会改吃猪排或牛排三明治。晚上,偶然会有电话要一盒海鲜或炸鸡。还可以要冰淇淋、糖果、腌猪脚、油炸玉米饼、猪皮、口香糖、嚼烟、斯坦巴克头疼粉(Stanback Headache Powders)。不远处的安路超市(Safeway)晚上九点关门(星期天也不开),没赶上的人可以来这里买到面包、牛奶、某些常见的罐头制品、厕纸、卫生巾、洗衣皂、淀粉和其他各种物品。有人偶尔会买普通熨烫淀粉,除经常用来熨烫衣服外,也被用来食用。据我所知,只有妇女才吃淀粉。一个怀孕的妇女可以在一天内吃掉多达四五盒亚尔古光亮(Argo Gloss)淀粉。

务的便利,发挥了社会功能。例如,在香烟机的顶部或在自动唱片机上,巴姆杜多(Bumdoodle)作为常驻在外卖店地区的"数字人"(numbers men)与白人"数字赌客"进行商业上的交易,白人"数字赌客"每天白天与他和周围其他"数字人"结账。

对于出入外卖店地区的人来说,这里提供了听觉、视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上的各种体验,五官受到各种刺激甚至是骚扰。咖啡壶、烧烤架和积存了厚厚油腻的油炸篓散发的味道使空气富有温暖的气息。自动唱片机播出各式各样的狂热和慵懒的节奏。弹球游戏机伫立在那里,挑战着人们的操作技能或把球击至某个洞里的能力。闪烁的灯光、铃音、嗡嗡声告知进级或宣告失败。五彩的招牌劝导着顾客喝点皇冠可乐(Royal Crown Cola)和吃些邦德面包(Bond Bread)。一位金发碧眼的女郎身着吊带衫和短裤,有着修长的腿,斜倚在墙上,手拿着电话听筒,笑容可掬,湿润的嘴唇上衔着切斯特菲尔德牌(Chesterfield)香烟,带着难以言表的喜悦,她的娇容没有因为小胡须和轻浮的淫荡而有所损伤。后面的背景是,一艘豪华的航船在平坦的蓝色大海上不知驶向何方。

在这种环境下,居住在这里的20个男人,经常聚集在外卖店前面的宽敞的街角,进行"轻松的交际活动"(effortless sociability)①。严格来说,他们不是一个群体。在任何一个时间,聚集的人不会多于8个或10个,通常更少。没有任何活动可参加,没有义务,没有人会说你属于或不属于这里。他们当中有些人之间除了随便打个招呼外,从未说过话。某些人之间是亲密朋友,某些人不喜欢另外某些人,甚至另外的这些人认为自己是他人的敌人。但每个人都会来这里,主要是因为他知道其他人也会来。他们来这里吃喝,闲聊,了解事态进展,鬼混,欣赏女人和拿她们取乐,看有什么新鲜事发生,消磨时光。

泰 利

泰利是个棕色皮肤的男人,31岁。他有6英尺高,重近

① 这个美丽的描述词引自Klein,1965:142。

200 磅。他的身材和举止让人确信他曾是一个重量级的拳击手。当有人让他确认这是否是真的时，泰利会咧嘴一笑，做出一个拳击手的经典姿势，并邀请问话的人，“来试试”。没有人去试。

泰利生于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他 60 岁的母亲现在还生活在那里。泰利的父亲在泰利出生后没几个月就离开了家。泰利从未上过学。在他 11 岁的时候，就开始经常做工赚钱，如清扫过一次诊所和在餐馆涮碗碟。泰利的少年时代主要在亚特兰大度过。然后，他应征入伍了，尽管他不能读书写字。

泰利在 1954 年来到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他在这里的第一份工作，是做一家医院的厨师，但后来找了一份建筑工人的活儿。自 1959 年以来，他已是一名半技术建筑工人，平均每星期能带回家的工资大约是 100 美元；他一年中工作六七个月，这期间他按时上下班。

泰利在 1961 年的冬天搬进外卖店地区的一处住所。在华盛顿的八年间，他的住所在这座城市的东北、东南、西北不同位置变换。在这期间，他结婚又离婚，是八个孩子的父亲，其中三个是和他妻子生的，其他五个是与不同的女人生的。

海 猫

海猫 27 岁。他在外卖店地区出生和长大，除了服兵役那段时间，他一直呆在这个地区。海猫上学上到 10 年级就退学了。他 20 岁结婚，但长期与妻子和孩子分开住。① 海猫身高和体重都是中等。他的大白牙与他的黑皮肤、稠密拉直的长头发形成鲜明的对比。海猫身上有股冲劲。他的动作有运动员般的轻松优美，无论是在向四周掷球或石头，辅以丰富手势的讲话，还是玩儿了如指掌的弹子游戏，他的手都是那样有把握和敏捷。海猫是讲故事的高手，他能把故事的内容与自己的表演融为一体，牢牢抓住听众的注意力。如果讲到“一个老人走在街上”，他的身体会突然因年迈而松弛下来，手颤抖着，膝盖几

---

① 海猫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在研究进行期间死亡。见本书第 82 页。

乎弯曲,此时他就像真的变成了一个老人走在街上。如果他讲到某人喊什么,他真的会喊什么。

海猫瞧不起普通的事物,他时常在普通人和事中挑出特别的品质、才能或性质来。他就像漫画家或表现主义的画家一样看待这个世界。运用夸张和想象,通过对他人感知的现实予以扭曲——这种扭曲被谨慎地控制——他搜寻着周围男人、女人和事件的独特性。

理查德

理查德 24 岁,5 英尺 10 英寸高,瘦而结实。理查德在卡罗莱纳州的一个小城市中出生和长大。他高中毕业,与住在街对面的一个女孩结婚。这个女孩从小就住在那里。1960 年的一个深夜,理查德不得不突然离开家乡,因为他袭击了当地的白人警察(据他自己和家人说,是被激怒了才这样干的)。他怀孕的妻子和小儿子在几天后来到华盛顿与他会合。

理查德先是做楼房管理员的工作,但也偶尔做其他类型的工作。在来外卖店地区的最初几个月里,理查德被公认为工作努力,为了家不辞辛苦,是一个完全的好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变化。理查德打了几次架,其中一次,他杀了人。[①] 人们变得害怕理查德,开始躲避他。理查德认为杀了人之后才有的麻烦,但实际上,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乐 华

乐华 23 岁,高瘦,甚至比理查德还瘦,他的肤色比这里大部分人的都浅一些。

乐华还只不过是个孩子。他在南方出生,但出生后没多久就来到芝加哥,由外祖母抚养。他在离高中毕业还有一年时参加了海军。他显然是这里所有人当中最会应对书面语的人。

乐华在 1961 年的秋天从海军退役后即来到外卖店地区。在这之前,他已经在这里度过了几个周末假期,他的一个海军

---

① 见本书第 88 页。

战友的家离外卖店不远。乐华从未打算在华盛顿定居,但不知怎么的,在花完所有的退伍金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家的意思,尽管他总是说要回家,甚至是在结了婚和有了两个孩子之后。

乐华的大部分工作与宾馆和停车场有关。大部分的男人和女人还算喜欢乐华,但通常认为他弱小、不成熟,是一个说大话的小男孩,当与别的男人或女人为谋求一份工作而竞争时,他可能会在对抗面前退缩或在对抗中败下阵来。

其他十六个人

姓 名	年 龄	主要职业
亚瑟	28	壮工
波利	21	楼房管理员
布德	45	壮工
克拉伦斯	30	壮工
厄尔	22	壮工
约翰	29	柜台服务生
隆尼	26	存货管理运送人员
普雷斯顿	38	壮工
罗伯特	27	楼房管理员
斯坦顿	44	卡车司机
斯杜皮	27	餐馆工—洗碗工
斯威特	26	餐馆工—洗碗工
唐克	23	泊车服务员
威·汤姆	37	壮工
韦斯利	21	零售送货员
威廉	31	卡车司机

第2章　男人与工作

一辆敞篷小卡车在街上缓慢行驶。当开到一个坐在生铁铸就的门廊台阶上的人旁边时，停了下来，白人卡车司机大声问，有一份日工要不要做。这个人摇了摇头，卡车继续沿街前行。只要碰到有闲人，司机喊话能听见，卡车就会再次停下来。在外卖店街角，五个人对这个事争论了一下后，对卡车司机摇头拒绝。卡车在街角处拐弯，在另一条街上重复刚才的一幕。远处，可以看到一个人接着又一个人，爬上车斗，坐下来。卡车走走停停，最后消失了。

我们刚才在这里目睹了什么？劳动力猎头遭到了快到嘴的猎物的回绝？懒惰、逃避责任的男人，拒绝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日工，能赚到实实在在的日薪？或者是一种更加复杂的现象，显示着经济力量、社会价值和个人身心状态的交织？

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卡车司机。他从接触到的每二十至五十人当中只能招到两三个。他很清楚，其他人真的不会选择去工作。不管是独处的还是成群的，饿着肚子的还是吃得饱饱的，沉闷的还是活泼的，喝醉的还是清醒的，这些人都证实了卡车司机所读、所闻和由亲历而知的形象：即便把一份工作拱手

相送，他们这些人也不会接受。[1]

暂且不谈卡车司机在街上见到的某些人是否真的这样，但很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如果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他们起初就不会来这里；或者来了，也会走开，让空卡车白跑一趟。也不能说大部分人是这样，因为这个工作日的早上，卡车司机在街上看到的大部分人实际上是有工作的。但他们离开家，逗留在街上，与那些没有工作或不想工作的人没什么分别，这是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既不工作也不睡觉，或者因为厌恶生活在压抑的房间或公寓房里，或者因为没有什么事可以做，[2]或者是为了摆脱妻子或住在那儿的其他任何人。有的人，如波利——郊外房产开发的垃圾收集人员，在星期六工作，平日不工作。有的人，如斯威特，是为中产阶级清理垃圾、尘土和残羹剩饭，为白天搞脏了的办公楼、宾馆、饭店、卫生间和其他公共场所拖地板，这些工作是晚上干。有的人为零售店工作，如酒水店，这些店铺 10 点钟才开始营业。某些壮工，如泰利，已经从工地上回来，因为地面太湿，不能掘铲，或者因为天气太冷，不能倒混凝土。其他有工作的人今天没有工作是出于个人原因：克拉伦斯要在上午 11 点参加一个葬礼，海猫作为一个犯罪行为的目击者被传审。

还有，在街上无意间给卡车司机留下坏印象的某些人，不工作是因为腿脚不灵便。坐在门廊台阶上的人，用患有关节炎的粗糙的一只手拍打着另一只手说，他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有资格获得社会救济金的那一天。他停了停，语气平淡地说："大多数时候，我并不在意我是不是在做事情。"斯杜皮因为患小儿麻痹症左腿萎缩。雷蒙德看起来壮得能把一个消火栓撕碎，但实际上他只要弯腰或突然行动，就会咳血。那个闲呆在萨拉托加

---

① 有的社会科学家，或许也通过不同的方法把这个问题的症结归因于这些人自身，他们没有工作的意愿或缺少欲望：为了提高这些底层工人的表现，必须帮助他们学会渴求(*want*)……更高的社会目标，为他们自己也是为了他们的孩子……改变(下层社会)人们的工作习惯和动机的问题，是一个改变底层工人目标、志向、文化和职业的期望水平的问题(这是原文的重点)。见：Davis，1946：90。

② 把独自坐在家里比作坐牢是很常见的。

(Saratoga)公寓前的文静的男人,在左胳膊肘上缚着钢钩。要是卡车司机观察一下戴绿色帽子的人深红而混浊的眼睛,他会意识到,这个人甚至不能理解他正在送来一份日工。

那些原来有工作,现在被解雇了的人,能领到失业救济金(每周多达44 美元①)。他们接受这份工作什么也得不到,因为这份工作提供的薪酬并不比救济金多,通常更少。

另外像巴姆杜多这样的数字人,通过非法的手段拼命赚钱。还有在街上玩骗术的人,他们会不择手段地赚取每一美元:拉皮条,贩卖酒、毒品、脏物,以及干任何其他能赚钱的勾当。

只剩下少数几个人还没有解释不工作的原因。唐克不能离开街角去工作,是因为据某人提供的消息,他怀疑妻子一有机会就会做出不忠的事来。还有就是斯坦顿,据说自从伯妮斯不见了以后,他已经有四天不工作了。他买了一把新刀,等着她回来。斯坦顿说,她之前已经不见过两次,但时间不算长,也不是没有前兆,他原谅了她。但这一次,“休想让我再饶了她”。他日夜在外卖店和街角徘徊,希望能捉住她,这时候每个人都能看到他面露愠色和耻辱。

最后,像亚瑟这样的人,身体强壮,却见不到他们如何谋生,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他们没有工作,也不想要工作。有的人,如卡车司机,认为亚瑟代表了所有那些他们所见到的工作时间在街上闲逛的人。他们不能代表,但也不能因为他们数量很少就不加理会。据卡车司机的定义,一个应担负责任且身体强壮的男人拒绝工作,是懒惰和不负责任的缘故。他们懒惰或逃避责任,或两者都是,这样的解释是不够的。这样的答案回避了问题。它是对事实的描述,并没有作出解释。

此外,尽管这样的人数量少,但不工作和不想工作的少数人特别值得关注,因为某些价值观念和态度最强烈和最清晰地在他们身上得以表达。这些价值观念和态度,不同程度上与在

---

① 美国政府统计数字显示,1967 年(《泰利的街角》第 1 版在这一年出版)1 美元大约相当于2003 年的5.50 美元。2003 年哥伦比亚特区的房租至少是1967 年的10 倍。

整个街角世界见到的人如何谋生有关。这些人与其他人的区别体现在程度上,而不是类型上。主要区别在于,这些人践行他们的价值观的意涵和经验结论,预见到结局是注定的,无法避免。而其他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则必定依照自己的意愿和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约束而行事。

现在先抛开这些人怎么说、感觉怎样不管,看看他们确实做了什么,做出了怎样的选择。谋得一份工作,一直干下去,并好好干,这很明显不是被优先选择的。亚瑟完全不工作。乐华应该在下午 4:00 工作,但都 4:10 了,他还在玩儿外卖店地区弹球游戏机上的免费游戏,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唐克在星期三开始做一份建筑工作,星期四和星期五也工作,之后就不去了。海猫找了份类似的工作,第二周就辞职了。斯威特在一家饭店打了三个月的工,没打招呼就离职了,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这样做。一位房地产公司的负责人说,他对把工作干好更有兴趣,而不仅仅是节省成本。他让理查德对房子内部的修整粉刷做一个价格评估,但理查德粗略看了看这份活儿之后,不知怎么的从没有给出一个评估。在这期间,唐克因为妻子可能真的做出不忠的事来,没有离开街角去工作;斯坦顿因为他的女人曾经不忠,不肯去工作。

这样,人与工作的关系是松散的。在任何既定的时刻,工作在街角的现实价值观念等级中都可能占有相对较低的位置。获得一份工作可能次于与女人的关系,或其他非工作的考虑;已经从事某个工作的人常常没有全身心投入,而只是暂时干着。

原因有很多。有的原因是客观的,主要在于工作;有的是主观的,主要在于个人。然而,它们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一个人拒绝一份工作或做出辞职的决定,不是简单地出于一时冲动或价值观念的选择,而是出于两方面的复杂结合:一方面是对客观现实的衡量;另一方面是价值观、态度和信仰,它们来自不同层次的个人经验。

拒绝接受一份工作,客观的经济考虑常常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工作的薪酬多少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但很少被问及。他们知道薪酬是多少。仓库管理员、送货员,连酒水店、药店和其他

零售店的柜台服务生，都是每小时一美元的薪酬。餐馆杂工、洗车、楼房管理和其他工作不难找，薪酬大都也是如此。有的工作，如洗碗工，薪酬可低至每小时80美分；有的工作，如电梯操作员或在垃圾场的工作，可能提供1.15～1.25美元的薪酬。从事这些工作，带回家的薪酬每周35～50美元；但带回家的薪酬每周超过45美元的属例外，通常达不到。

这类工作的主要优点之一是，活儿相当稳定。大多数这样的工作涉及必不可少的服务，因此较少受到商业环境的影响，不像某些高薪的、体面的工作那样。这类工作大多也是在室内，不依赖于天气，不像建筑工作和其他高薪的野外工作那样。

另外一个似乎重要的优点是，在宾馆、饭店、办公室、公寓建筑和零售店里工作，常常有机会利用工作之便偷东西。但偷盗会是一把双刃剑。对一般公众来说，商品或服务的成本增加了。除此之外，一个不大明显的结果是，雇员的工资水平通常会被调低。小零售店的主人和其他雇主常常根据预计到的雇员偷盗数量，调整工资水平。唐克每周工作55～60小时，唐克的雇主解释为什么只付给唐克每周35美元。他说，这些人都会偷。尽管他紧盯着唐克，但估计唐克还是每周偷走35～40美元的东西。[①] 他偷的，加上正常的薪酬，带回家的收入每周70～75美元。雇主说他不介意，因为唐克对生意的贡献值这个价钱。但如果付给唐克劳动力的全部价值，他依然会每周偷35～40美元的东西，他说，这是生意所完全不能承受的。

对这种工资安排，加上内部偷盗，双方都接受，各自表示满意。然而，这样一个工资-偷盗系统，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平衡和公平。既然工资水平是建立在雇员会偷回未付的劳动力价值的假设之上，那么没有利用工作之便偷盗的人却是得到了处罚。进一步讲，即便他没有偷，没有人会相信他；雇主和其他人相信他偷了，因为这个系统这么认为。

如果如料想的那样，某人实施偷盗，他也并不会如自己想

---

① 与唐克自己的估计完全一样。然而，根据我对唐克偷盗惯常行为的个人了解，我怀疑真实的数字会小得多。

象的那样可以逍遥法外。雇主可能偶尔会对雇员的偷盗行为视而不见,但不是经常这样,也不会总是这样。他毕竟是个商人,不能总是看着有人在他眼皮底下偷他的东西,即便这个人是在偷自己的工资。而且,只有老是紧盯着雇员,雇主才能控制偷盗的数量,才能保证雇员所偷盗的不会超过未付的劳动力价值。那么从这个视角上来说,雇主并没有在工资-偷盗系统中与雇员达成最终的一致。例如在唐克这个个案里,雇主没有积极地怂恿偷盗。他估算唐克偷的数量,是基于尽他最大努力去阻止偷任何一点儿东西后,想象的唐克能偷什么。一旦他捉住唐克正在偷东西,他当然能解雇他,也可能会叫警察。这样,不从法律而从实际的意义上来说,诱捉的所有因素都存在。雇主故意提供诱使(强迫)雇员偷盗未付的劳动力价值的环境,却在同时一旦看到其实施偷盗,就予以惩处。

工资-偷盗系统的其他后果对雇员来说甚至更具破坏性。为说明其缘由,让我们假设唐克没有被捉住的危险;也就是说,雇主对偷盗行为故意假装没看见,唐克站在自己的角度非常愿意挣一点,偷一点。也让我们假设他的薪酬是每星期 35 美元,允许偷 35 美元。他的收入——用可买到的商品和服务来衡量——当然是 70 美元。但他的全部收入并不能为他达成所有目标。他不能利用偷来的东西构筑自尊或衡量自我价值。正是这个原因,他唯一可资利用的收入数量,是雇主公开和自愿支付劳动力价值的数量。他的“尊严”和“自我价值”的收入只有 35 美元——仅是那些收入也是 70 美元但全部以工资方式支付的人的一半。他所赚的钱,以公开的方式衡量了他的劳动力对于雇主的价值;他所赚的钱,对于他人和自己在衡量作为一个人的价值时是重要的。[1]

不管是偷还是不偷,也暂时完全不考虑一个人——此人拒绝接受一份工作或随便地没有明显理由地辞职——的心理过程,客观的事实是,在零售业或服务业中的粗活完全不足以支付养活个人和家庭的费用。这不是说少支付了工人工资,这可

① 有时公众会更加相信他作为贼是聪明的,却没有增加对他的敬重。

能是也可能不是真的。不管是不是少支付了,明显的事实是,干这份工作,他难以为继。而且对于这些工作能不能提供更常规的和更稳定的活儿,他不太心安。如果不能赚到一个星期45~50美元的基本花费,那么他工作时间越长,越是难以为继。①

建筑工作,甚至对于非技术工人,通常付的薪水会较高,每小时1.50~2.60美元。② 另外重要的,好的情况证明、好的驾驶记录、至少10年级的教育、先前的经验、免受警察骚扰的能力,对于建筑工人来说,一般不是必需的,而这些通常对于零售业或服务业的一些工作来说,常常是必需的。

然而,建筑工作有自身的客观缺陷。首先,它是一种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季节性的工作,从早春开工,冬季来临后逐渐停工。③ 而且即便在劳动季节,工作也常常不规律。劳动季节的

---

① 如霍华德·S.贝克尔建议的那样,这个特定地区的总收入和租房成本与赫伯特·甘斯公布的波士顿西区(west end)的低收入工人阶级的总收入和租房成本进行比较,可能是有益的。1958年,甘斯公布的西区收入中位数还不足每周70美元,比5年后的外卖店地区人们的收入中位数高得多。甘斯自己在波士顿西区租住了一处6个房间的公寓,租金是每月46美元,比长期租住户的多10美元。在外卖店地区,能够容下一个儿童床和一个小型衣柜还有余地的房间——也就是说,适合家庭居住的房间——租金在每周12~22美元。忽略真的不可忽略的差异——多房间的公寓私密性好,厨房和卫生设备齐全,而房间分租的公寓被分割,由不同的人居住,厕所公用,而且总是不在居住的房间所在的楼层(更不用说还可能不能用)——且假定房屋新旧程度可比较,在波士顿西区每间房需付每月6~7美元,而在外卖店地区至少需付每月50美元,通常更多。把租房成本看成是收入的一个百分比——仍然是忽略掉不可忽略的:"居住(housing)"这个名词在两个地区所指完全不同——波士顿西区的收入中位值的大约12%能租到6个房间的公寓,而1963年的外卖店地区,周收入60美元(选择收入范围较上端的数字),经常是其中的20%~33%用来支付房租(见:Gans, 1962:20-33)。(原出版者注:2003年有关消费价格指数的最新数据,参见 http://woodrow.mpls.frb.fed.us/research/data/us/calc/.)

② 更高的薪资水平是1962年工会商定的建筑工人的最低工资。根据《重体力建筑工人的工资协议条款》(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及其周边地区),有效期从1963年5月1日到1966年4月30日,重体力建筑工人的最低工资要从每小时2.75美元(1963年5月)开始,每年都提高,1965年11月1日提高至2.92美元。

③ 在露天工作中,如建造天桥、高速公路等,工人和建筑材料直接暴露于自然环境,这些工作一般3月份开始,感恩节前后结束。作为重要的雇主,市政府和公共事业公司进行的大量的街道整修工作,铺设污水管道、电线、天然气管道和电话线的工作,也是如此。感恩节到3月份之间,只有骨干人员留下来,他们是挑选出来的最好最可靠的人。

早期或晚期，工人们常因为下雪和对于混凝土来说温度过低而回家。在晚春或夏季，星期二或星期三的暴雨造成地面积水，泥泞不堪，对于铲掘工和其他非技术工人来说，这意味着两三个工作日都要休息。①

自然环境不是唯一的危险。随着工程从一个阶段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工人们通常在没被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就被辞退，有时是永久的，有时是几周。较幸运的或较好的工人定期被告知“歇息两三天”。

相对于零售业和服务业的粗活来说，得到一份建筑工作和接触到这样的工作更难。工作竞争总是激烈的。市内大的建筑工程都由工会组织统一承揽。要想有资格在这项工程中工作，必须有加入这个工会的现金；而且要想获得资格，必须找到门路。如果不“认识某个人”，也就是说认识工头或工人，让他们知道哪天早上将要雇用新人，那么这样的寻觅会是困难重重和令人沮丧的。

在华盛顿周围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郊区提供很多非工会的工作。报纸上的广告登着：“准备好到弗吉尼亚（或马里兰州）的本斯顿（Bunston），在 11 号路和老桥路交叉路口参加拖车运输的工作。”但从外卖店地区到工作地点可能有 10、15 甚至 25 英里。如果公交车能到那个地区的话，要花两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要是没有小轿车或不安排拼车，读这样的广告是徒劳的。所以人们不去读。此类工作信息通常是通过口头传递的，源自认识某个人的人或自己工作在那里并正在寻找支付路费的人。此外，地处偏僻的非工会工作，往往由相对短期的较小工程提供，薪酬比大工程少一点。

① 最近一年，华盛顿的犯罪率在 8 月份比上个月激增了 18%。一位资深的警官向大卫·L. 贝兹伦——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上诉法院的主法官，这样解释犯罪率的上升：“这很简单……你看，8 月是个非常潮湿的月份……这些人在街角等待每早 6:00 或 6:30 前后的卡车把他们接走，接到建筑工地。如果下雨，卡车来不了，人们将会在那天无所事事。如果坏天气延续三天……我们知道我们的麻烦来了——而且确信无疑，抢钱包、入户抢劫等各种案件会接踵而来……你知道，这些人也像我们一样要吃饭。”（Bazelon，1963：3）

还有，另外一个客观的因素在于工作本身。对于一些人来说，不管是掘土、和灰浆、推独轮车、卸料、为加固混凝土搬放钢筋，还是构筑和铺就混凝土结构的活儿，都简直太难了。像泰利和威·汤姆这样的男人，做这样的工作像孩子玩耍一样；一些年长的肯卖力的男人，如布德和斯坦顿，也能做，尽管一天下来表现出明显的疲惫和力不从心。但是那些不如泰利健壮，不像布德那样坚持不懈的人，必定会要么放弃这样的工作，要么为干下去付出巨大代价。乐华，20 出头，近 6 英尺高但体重还不足 140 磅，整天手推满载的独轮车或卸下、堆放 96 磅重的袋装水泥，干这些活儿会像跛脚的斯杜皮一样困难。

这种过去通常与普通工作队和水泥工工作队相联系的劳动，工作繁重、极度辛苦，这已不再是体力劳动工作的典型特征，尤其是在规模较大、设备良好的建筑公司中。有时人力仍然是必需的，如在用重型机械不合算的较小的工程中，或规模小、资金不足的承包方无力使用重型机械时。然而，在很多工程中，传送带已经取代了独轮车，佐治亚小车、机械铲车已经摆脱了繁重的手工举升，各种挖掘机器已经取代了手工挖铲。结果是非技术工人的工作岗位变少了，而且很多情况下，对那些在职的人来说，工作的速度提高了。过去由人干的活儿，现在由机器承担。过去一名工人推着一独轮车搅拌好的水泥到特定的地点，倒了，返回再推一车。另外一名工人，穿着长靴，用铁锹或铲把水泥搅和几下，送到技术工人能够得着的高度，以备使用。他铲相对少量的水泥就可应对推独轮车的人，只须赶上他就行了。现在推独轮车的工作已经没有了，搅拌好的水泥从斜道上倾泻到穿长靴的人脚下，他必须“快速分出去否则会被淹没”。

那些操作电梯、洗刷餐具、清理垃圾的人，不易转到这样的体力劳动中工作。他们缺乏“非技术”建筑劳动的基本技能，不熟悉工具、材料和这个行当的窍门，没有这些，原本艰难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原来未加使用和训练的肌肉，以疼痛反抗着对它的从未有过的持续不断的苛求，这严重威胁到这个人的表现，考验着他是否能坚持到底。

一个健康、强壮、有活力和智力良好的人，从一无所知到完全能胜任建筑工作，需要二至四周的时间。① 即便他愿意在头几个月全力以赴，工头或他所服务的工匠（为其提供材料和一般的协助）还是不愿等他那么长时间进入状态，不愿等他学会一眼就能分辨毛坯的 2 英寸 ×8 英寸和完工的 2 英寸 ×10 英寸之间的尺寸差别。工头和工匠自身也在严密监视之下（under the gun），当其他已有此类工作经验、懂得工具和材料的人正排队等候这份工作时，他们不能留下这个人。

海猫健康、强壮、有活力和智力良好。当法官判定他在六个星期内还清妻子 200 元的儿童抚养欠款时，他为了做一份有较高薪水的壮工工作，离开了杂货店的工作。这份工作是一位工头朋友给他安排的。第一个星期的天气不好，他只在星期三和星期五工作，他喋喋不休地咒骂着恶劣天气，因为赚不到原本可以赚到的钱。第二个星期，天气良好，但他干完第四天就辞职了，他坦白地说，这份工作对他太难了。他又回到了杂货店工作，并找了一份兼职：晚上在一个餐馆洗刷餐具。② 做这两份工一点也不比作一个壮工赚得多。在付清债务之前，他坚持做这两份工。

唐克像海猫一样，没做多长时间。当他在停车场谋得一份工作时，没人去预测他能干多久，但当听说他要开始做一份修公路的工作时，街角的人们作出了估计，认为他少则一周多则三周就会辞职。星期三是他工作的第一天。傍晚和夜晚他在家中度过。星期四也是这样。星期五工作，星期五傍晚和星期六的部分时间他懒散地倚在街角的邮箱上。星期天下午，唐克决定第二天早晨将不再宣称去工作。他解释说，工作了三天，对这份工作了解得够多的了，对于他来说太难了。他明白自己不能坚持下去，即便现在不辞职，以后也会很快被解雇。

洛根高个子，200 磅重，不到 30 岁。他说，他的背过去只是

---

① 这是弗朗西斯·格林菲尔德先生的估计，他时任国际小工、建筑与非熟练工联盟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及其邻近地区的地区委员会主席。

② 这不是闲差事，即便按照街角地区的标准。

在工作时常常疼痛，而现在他不能很长时间地直腰。他说，他把原因归于笨拙的行走姿势，满载的独轮车把他拉成了驼背，他只能用这个姿势。他说，一找到另外一份工作，他就辞职。如果不能很快找到，他想他无论如何还是要辞职。为了推车总是弯着腰走路，为掌握平衡左右摇摆，这样做是不值得的。

有时，紧张程度和精力耗费之大是人们不愿承认的，甚至对于干工作的人自己。1963 年的初夏，理查德住在南希家。他的妻子和孩子住在乡下（他祖母卡罗莱纳州的家），盼望着他攒够了钱，把他们接到华盛顿。他们在费城的尝试损失惨重，希望在华盛顿重新开始城市中的生活。理查德已经在弗吉尼亚州的一家围栏公司（fence company）找到了工作。薪酬是每小时 1.60 美元。最初几个晚上，下班回家时，他由于疲惫和炎热看起来病快快的。斯坦顿说，理查德必定会辞职，“干那种工作，他显得太单薄了。”理查德说，他工作得很好，会一直做下去。

理查德已经工作大约两周了，这天晚上在南希家，南希和其他三四个人正坐着聊天，喝酒，听音乐。有人问南希，理查德什么时候把他的妻子和孩子从乡下接来。南希说，她不知道，但可能要看理查德多久才能攒够钱。她说，她认为理查德不会在围栏公司再干下去。她说，今天早晨，和理查德拼车去上班的人敲门，理查德没有回应。南希向屋里望去，理查德还在睡觉。南希试图摇醒他，“不要再挖了！”理查德喊道，“不要再挖了！我不能再他妈的挖了！”南希最终设法把他弄醒，他匆匆穿上衣服去工作了。

理查德又干了两个星期，然后突然辞职了，表面上是因为他的付薪支票上的数额比他预想的少了三美元。

那么综合以上对工作的客观描述，最重要的事实是，有能力且愿意工作的人不能挣到足够的钱，用以养活他自己、他的妻子和一个或更多的孩子。只有有人心甘情愿让赚到的钱低于生活所需的花费时，才可能长久地工作下去，有时即便是这样也难做到。某些工作的工资较高，但这只是虚高而已，工资越高，获得工作的难度越大，安全越没有保障。高薪的建筑工

作往往是季节性的，在劳动季节，可干的活儿的数量对商业环境、天气情况、个人规划要求的变化高度敏感。[①] 而且，高薪的建筑工作往往是非一般人的体力所能负担得了的；某些低薪的工作薪酬被调得甚至更低，这与雇员会偷取应得工资的一部分的假设是一致的。[②]

伯纳德喝着咖啡，沮丧地揣摩着客观的工作状态，时而用汤匙搅一下咖啡，时而盯着咖啡发愣，好像这杯咖啡是一个水晶球，知晓明天的秘密。他 27 岁，和他现在同居的女人生有一幼子。这个女人还有一个孩子，是和另外一个男人生的。伯纳德以打零工为生——主要是粉刷房子——但现在是一月底，没有这样的活儿。他的上一个工作是在圣诞节邮递高峰的时候做邮差。他说，他愿意把邮差的工作稳定下来。做邮差薪酬还不错（大约每小时两美元），但在邮局两次的考核中他都未通过（他毕业于华盛顿的一所高中）。于是他认为一直干下去是不切实际的，放弃了这种想法。今晚他本应去见个人，谈一项工作，是一处大型公寓房的停车场的泊车服务员的工作。这个人已告诉他要带着出生证明和驾照去，但由于他有积压的交通罚款没有交，他的驾照已经被吊销了。一个朋友允诺今晚借些钱给他。有了这些钱，他明早会去交清罚款，取回驾照。他希望和提供工作的这个人等到明晚再谈。

他说，一份有保障的工作是他真正想要的。他想攒钱买一辆出租车。（但是因为经历了两次邮局考核的失败，而且驾驶

---

① 总的结果是，从长期来看，黑人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实质上并不比那些餐馆杂工、楼房管理员、仓库管理员的高，甚至还可能更少。举例来说，赫尔曼·P. 米勒在报告中指出，1960 年，所有工作岗位的 40% 被黑人占据，从事体力劳动或就职于服务业。非农业中的非白人体力劳动者年均工资是 2 400 美元。服务业中的非白人工人的年均收入是 2 500 美元（Miller, 1964:90）。弗朗西斯·格林菲尔德估计在华盛顿周边地区，作为工会成员的体力劳动者，1965 年的收入大约会是 3 200 美元，他们只要有工作可做就去做。甚至街角地区的工会成员的收入也不低。在重体力的建筑工作中，工会成员是体力劳动者中的佼佼者。建筑业内的小公司或其他产业内的公司，提供给临时劳动和工作者的薪水相当少。

② 见罗伯特·K. 默顿的《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第 11 章“自我实现预言”，其中有对作为社会力量的自我实现假说（或预言）的精彩讨论（Merton, 1957）。

记录也不好,他很担忧不能达到要求或通过笔试。)那样的生活是美好的。在餐馆找个工作或在药店做个职员都不难,但薪水不够高,他说。他需要每周带回家至少 50 ~ 55 美元。他想如果到某地开卡车,这是能实现的……有时他臆想着还呆在军队里……有保障的工作,这是他最想要的,一份真正的有保障的工作……

当我们着眼于人们以怎样的状态来工作,而不是工作为他们提供了什么时,记住以下事实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观察对象不是初来乍到,也许刚从学校出来,刚刚准备好自谋生路,或者从原先的工作跳槽而来,辞掉的那份工作足以维持生计,新工作也会一样。每个来工作的人都已工作过很久,都无力养活自己和家人。每个人都对此心知肚明,这是经验告诉他们的。工作对他们来说已没有新鲜感,都如出一辙,这使他们感到厌倦,自认为难以胜任工作,害怕承担责任,害怕又一次在考核中不合格。还没有或刚刚结婚的那些年轻人或许是例外。他们对所有这些持怀疑态度,而它们必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不断的个人经验那里得到证实。但那些已结婚的或结过婚的人清楚得很。这是个人的经验也是群体的经验;是父辈的经验也可能是子辈的经验。他们自认为无能,因此他们不仅不去找那些薪酬高一点的工作,来验证他们的能量,而且还尽量去逃避那样的工作,全都甘愿做粗糙、单调的工作。这些工作对自己已经减损的形象没有挑战,因此也不构成威胁。

因此理查德没有把房产商提供的工作进行到底。他害怕由他自己来做——细致的墙壁粉刷,替换破旧的窗户,其他细小的修复和粉刷——准确地说,这些活儿他过去几个月的时间一直在做,是在别人手下按件付薪的工作(这样的工作为他成本的估算提供可靠的基础)。理查德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帮助我们理解有人提供工作时他头脑中划过的想法。那一次他正在找工作,我们在外卖店地区谈话。谈到提供给他的工作时,他这样说道:

我高中毕业(巴尔的摩),但我一无所知。我沉默寡

言。甚至我一般不说我高中毕业，因为那样如果有人问我个问题，我答不上来，他们会认为我说自己高中毕业是在撒慌……他们让我毕业，但我一无所知。我的分数很糟糕，但我猜他们是想要摆脱我。

一天晚上，我在玛格丽特家，她的小妹妹让我帮她做作业。她拿一些题给我看，我立刻意识到我不会做。我感到惭愧，所以我告诉她我必须去洗澡了。

所以对于房产商提供的工作，必然也是同样的情形。自认为"我沉默寡言……我一无所知，"他"立刻意识到"他不会做，尽管实事是他过去一直在做的就是这种工作。

这样，由于自卑，对考核心存恐惧，不敢接受一份需担负责任的工作，或者在工作过程中，如果委以重任，即便工资也相应增高，也不敢干下去。理查德拒绝了这样一份工作，乐华辞掉了这样一份工作，另一个人被委以更大的责任、薪酬更高，但他知道自己不能胜任，并一直会如此。他对自己的判断被证明自始至终是正确的。在工作中充斥着这样的自我实现预言。走廊里的斯坦顿、唐克、波利也有同样的故事。斯坦顿回想起服役的日子。在得到下士的头衔之前，一切安好。这之后，他担心自己做的每一件事，做得对不对？做得好不好？什么时候他们会发现差错，从而把他的肩章（和加薪）拿走？他最终失掉了肩章时，一切又安好如初。

雇主经常所抱怨的雇员对工作消极懈怠，毫无兴趣，不怎么投入，街角人士都有体现。这些人一般不谈论工作或向其他人询问工作的事。① 大多数人知道某人在某个确定的时间是不是在工作，但他们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某个人做什么具体工作。与某人打交道时，他们对工作细节没什么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工作的细节并不特别地相关。知道一个人在

① 这与工作稳定的工人闲暇时间谈论的话题形成鲜明的对比。例如，对于（英格兰的阿什顿）煤炭工人来说，"工作作为[谈论]话题的频率，超过其他——白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一项特定任务如何完成，等等。"（Klein，1965：88）。

工作，意味着近似地知道他能挣多少，也差不多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某人需要和想要知道的也不过如此。毕竟，一个人是在公寓房、餐馆、办公楼里拖地、清理垃圾，还是送杂货、药品、酒水，或者如果他是壮工，推独轮车、搅拌水泥或挖坑，知道或不知道这些有什么区别呢？这些工作相差无几，可选择的空间不大。广而言之，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一些毫无特点的杂务，可选择面狭窄，它们要的是无特点、无差别、无技术的劳动。“工作就是工作。”

导致街角男人不愿投身于工作的关键因素，是他们赋予工作的总体价值。*街角男人并不比身边的更大社会赋予工作更少的价值*。他们从雇主愿支付给他们劳动的薪酬的数量那里知道此项工作的社会价值。具体来说，在每个领薪水的日子，他们用得到的金钱来衡量整个社会赋予这项工作的价值。他不打算辞职跳槽，雇主通常也一样不打算解雇他而另雇他人。街角男人干工作，这是社会要求他们这样做的，而不管是街角男人，还是这个社会，都不认为这些工作值得一做并值得做好。雇主和雇员都瞧不起这样的工作。雇员对工作的轻视表现为不愿接受工作和干下去；雇主的轻视表现为支付低于养家之所需的薪酬。① 而且工资低的工作不能提供良好声誉、尊重、有趣味的活儿、学习或进步的机会，以及其他的补偿。街角男人所做的工作，几乎没有例外，从工资水平到声望各方面，都位于职业等级的底端。这些工作的典型特点是：艰苦、脏、无趣和薪酬过低。社会中的其他人（不管赋予劳动尊严的理想价值是什么）即便没有直白地表达轻视，对洗碗工、楼房管理员或无技能壮工的工作也是不予尊重的。② 街角男人也是如此。他们别无

① 重要的是，要记住雇主不是完全自由的行动者。由于受到更大的社会的限制，他的行为代表自己的同时，也代表更大的社会。儿童劳动法、安全卫生条例、某些就业地区的最低工资水平，以及其他限制，已经有章可循。其他控制机制，如年薪保障制（guaranteed annual wage），将投票实施。

② 见：U. S. Bureau of Census, 1963。不仅仅是美国赋予做这些工作的人最低的社会经济地位水平。“擦皮鞋的男孩或清理垃圾的人……经济社会地位低下，所有[工业]国家似乎都不例外。”（Inkeles, 1960:8）。

选择。从一项他人没有赋予某种社会价值的工作中得到此种社会价值,他们做不到。①

只是偶尔自发的谈话才会直接涉及这样的话题。谈论工作通常仅限于对意图的陈述,如"我想我会从事另一份绞车的工作,""天气变好时我要找一份建筑工作,"或者"我要辞职。我受够了。"对于工作的评价,往往是含糊地耸耸肩,"还好"或"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很少谈及某人工作的原因之一是,工作经验雷同不堪重复,这在前文已指出。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工作经验自身无意义。他们把中产阶级的职业看作声誉、自豪和自尊的主要来源;这些是他们的工作所不能提供的。提及自己的工作,意味着如他人看待他们一样看待自己,并提醒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② 因为依社会标准他们所处位置与他们对自身所认为的一般是一致的,所以谈论工作会使他们由于与某人几乎是任何人换位思考,而感到羞愧脸红和深深的几乎是肉体的疼痛。③做一个乐天安命的人,不为他所生活的世界忽视,这是在街角的每一个人想要的。不管他们是否清晰地表达了这种愿望(下面泰利做了这种表达),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把他们自身置于能引起同伴注意的位置,很像植物为了获得阳光而弯身伸展。④

泰利和我在外卖店地区。时值夏季,是泰利作为一名水泥工赚钱最多的季节。水泥工是一份半技术的工作,比非技术的

---

① 街角的人们贬低体力劳动,这并不奇怪。默顿指出,"美国对体力劳动的污名化……*在所有社会阶级中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斜体部分为原文特别强调;Merton, 1957:145)。不能从工作中得到满足也并不奇怪:"在职业的整体地位与满足感之间有明确的正相关的关系。"(Inkeles, 1960:12)。

② [在我们的社会里]工作是评价一个人的事物之一,当然更是评价自己的重要事物之一……工作是一个人的社会认同和自我的较重要部分;实际上,工作是一个人所度过的一生中命运的较重要部分(Haghes, 1958:42-43)。

③ 李·雷恩沃特注意到下层社会的人总是被证明他们与他人的地位不相干的情形,他还讲出另外一种穷人之贫穷的方式:"下层社会的人的认同问题,使中产阶级的青少年和成人的自我反省似乎很像一种精神富足的炫耀消费。"

④ 海猫在小腿处把裤腿剪掉,并在破边儿上挂上穗子。唐克把太阳镜打碎,仍然戴没有镜片的角质镶边镜框。理查德练就了一种独特的讲话方式。隆尼给自己举办了一次生日派对。诸如此类。

壮工赚得多一点。这几个星期他带回家的薪水超过 100 美元——这意味着“很多面包”。但对于泰利来说，他已经无家可养，仅有面包是不够的。

“你认识昨晚来的那个男孩儿吧？那个叫布莱克·穆兹莱姆的？那是我该做的，应该像他那样。”

“你什么意思？”

“穿着得体去[晚上]上学，找到一份好工作。”

“他并不比你阔绰，泰利。你比他赚得多。”

“这不是钱的问题。[停了一下]这是地位的问题，我想。他有地位。他完成学业后会成为一名监理人员。人们尊敬他……想想有地位和受过教育的人现在给我一种感觉[把手放到胸口]。”

“你也接受了教育。你有技能，有职业。你是一名水泥工。你能建楼房，修人行道。”

“那不一样。你看，别人能做你正在做的吗？别人能一上来就做你的工作吗？喔，在一个星期内我能教会你抹水泥。你不如我做得好，因为你没有经验，但你会成为一名水泥工。这是我的意思。任何人都能做我做的，这就是我的感觉。[长时间停顿]假如我喜欢一个女孩，我去了她家并见到了他父亲。他开始谈论他今天做了什么。他谈到给某人做手术，缝好伤口，谈论外科手术的事。从他说话的方式我知道他是一名医生。接下来这个女孩谈论她做了什么。也许她是一位老板或监理。也许她是一名律师。她的父亲对我说：“那么杰克逊先生，您是做什么的？”[停顿]你还记得上次在法院吗？隆尼的案子。你和律师在大厅里谈话？你记得吗？我只是站在那里听。我一言不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在谈论什么。这样的事常发生在我身上。”

“见鬼，你一点也不特别。这样的事发生在每个人身上。没有人知道所有的事。有的人是医生，所以他谈论外科手术。有的人是教师，所以他谈论图书。但是医生和教

师都对混凝土一无所知。你是一个水泥工，这就是你的专长。”

“也许是这样，但你什么时候看到有人站在那儿谈论混凝土？”

街角男人想要做一个乐天安命、不为人忽视、被当回事儿(to be taken of)的人，但在这方面，还有在赚足钱方面，工作没有成就他。工作与人互不相欠。工作没有成就人，人也没成就工作。

而且，人们对工作向好的方向发展不抱有任何合理的期望，无论这工作有多差。粗活一般来说不是通向更好的工作的起点，这些更好的工作，由那些有能力做且乐意去做的人来做。餐馆里的杂工和洗碗工，即便是通过巧妙的商谈，也不会成为餐馆的厨师或管理者。如果杂工或洗碗工作勤奋，仅仅会成为一名工作勤奋的杂工或洗碗工。吃苦耐劳不可能使一名楼房管理员坐到他所打扫的办公楼里去工作。学徒才会成为熟练的电工、管道工、锅炉装配工、瓦匠，而不是普通的无技术黑人劳动者。

因此，工作不是通向更好的石阶。它已是尽头，它不保证明天、下个月、明年会比今天好。

所赐无几，无以承诺，所以工作绝不是大事情。人们看起来是以轻蔑的方式对待工作，不管是不是在工作都受到这种态度的驱使，好像一切都是为了直接满足当下的欲念，屈从于当下的情绪和心血来潮的放任，对成本、结果、未来不加考虑。对中产阶级来说，这种行为反映了一种“当下取向(present-time orientation)”——一种“对延迟满足的无能”。就是这种“当下取向”——与中产阶级的“未来取向(future orientation)”相对——向外界解释了为什么乐华选择把时间都花在外卖店地区而不是去工作；为什么理查德星期五领工资，星期六和星期天大醉，到了星期一就身无分文；为什么斯威特因为昨天老板看他“滑稽可笑”今天就辞职。

但从当事人自身角度出发，对外部观察者呈现出的“当下

取向”,无异于中产阶级人群的“未来取向”。[①] 与其说两类人的差异在于时间取向上的不同,不如说在着眼于未来时刻尤其自身前途上,他们并无差异。[②]

中产阶级的未来取向假定,除了别的投资外,余存的资源会用于未来的投资,并相信未来会一如既往地保证投资(如银行存款、在工作上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在婚姻家庭中的投入等)的合法有效,也会许可他自己选择时间、地点和方式来消耗投资,以得到更大的满足。但街角男人的需求填不满。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心理上,他们通常没有余存的资源。对饥饿和简单的生物性欲望的满足不能长时间延迟。两者都不能支撑起逐渐衰退的自尊。街角男人用以维持生活的经济和心理的资源,处在不稳定的边缘,他们被迫把所有的资源用于眼下的生计,走一步看一步。[③]

对于未来,年轻的街角男人有一个相当清晰的图景。从理查德、海猫或亚瑟身上他可以看到25岁左右的自己;从泰利身上看到30岁的自己;从威·汤姆身上看到35岁左右的自己;从布德和斯坦顿身上看到40多岁的自己。这样的未来,除了希望的最终破灭和恐惧的最终实现外,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他能做的最合理的期待是这些不要来得太快。所以理查德两天的时间花完了一周的薪水,不是因为他是“当下取向”的,像动

---

① S.M.米勒和弗兰克·利斯曼持略有不同的观点,他们提出,“延迟满足(deferred gratification)的整个概念可能对于理解工人生活的本质是不宜的”(Miller and Riessman, 1961:87)。

② 这个句子是对马文·席琳的陈述的改写。1965年,在位于国家精神健康学会的精神健康研究中心举行的研讨会上,马文·席琳作了此陈述。

③ 而且,如果有时他有多余的钱可用或更多的食物吃不了,他被迫无论如何还是要把钱花掉,把食物吃掉,因为他的朋友、邻居、亲属或熟人会向他讨或借,不管他有多少余存。如果讨不来借不到,他们可能会偷。在一个极端的案例中,那个人承认,在一位妇女解释有四个孩子要吃饭,一点吃的都不会给她留下后,拿了她剩下的最后一点食物。预计到非耐用消费品不会被自己而会被他人消费,可能的结果是,轻便的耐用消费品如手表、收音机、电视机、留声机有时被当作储蓄的形式。在雪莉享受福利救济期间,一领到每月的救济金,她一般把电视机赎回来。他解释说,临近月底钱快花完的时候,为了留条后路,电视机看得不多。对她以及其他人来说,电视机或留声机是他们的储蓄,当铺是他们的储蓄银行,当票是银行存折。

物或孩子一样没有意识到未来或对未来漠不关心。他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意识到了未来且认为未来全无希望。

有时这种反应像是一种有意识的明确的选择。理查德和妻子大吵了一顿,他说他要抛弃她和孩子,这样一切都够了,不用再赚更多。他把妻子赶出了房子。他斜倚在地下公寓过道的墙上,胸口鼓鼓的,气还没消。

> "我已经打拼了五年,"他说。"从早到晚。我的孩子还是什么也没有,我的妻子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没有。"
>
> "那里,"他说,指向厅里的床、沙发、一对椅子和一台电视机,都是破破烂烂的,有些已经坏了。"那是我的全部家当,我已经难以再维持了。"
>
> 乐华走进来,大概是为理查德的妻子说情。理查德的妻子坐在门外台阶上,不敢进来。乐华开口说话但被理查德打断。
>
> "看,乐华,少来。你和我是完全不同的人。或许我像个孩子,或许我有时耍孩子脾气,但我有男人的心智。你和我从生活中想得到的不同。或许有些是相同的,但你不在乎要等多长时间,而我此刻就要。"①

因此,表面上是当下的大手大脚和放任自流——物质上的和情感上的——反映的却是未来取向。"我此刻就要"是最后

① 这决不是简单地为不负责任找理由。理查德确实为了家庭能够维持下去"打拼了5年"。这一幕刚刚过后,理查德作为一位工作努力的人而为街上的人知晓并受到尊敬。仅仅几个月前,理查德曾说过:"我想你该走出去,去努力争取。在能得到任何东西之前你该去努力争取。"他的妻子雪莉证实了他一直在努力争取。"如果情形变糟,我会变得万分焦虑。但理查德焦虑了,他不想让我看到他的焦虑……他愿走出去。他铲雪,捡豆子,什么事都做……他不会因为出去给我们弄吃的而感到惭愧。"在以上那一幕传开的时候,乐华刚刚结婚,开始养家糊口。并不像理查德说的那样,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人。乐华只是个人经验不足,还未学到理查德所学到的。但两年内,乐华的家庭破裂,言谈举止也一如理查德。"他只是随它去吧,"街上的一个人说。

绝望的呼喊,是对可预见的未来的直接反应。①

在很多情况下,这恰是街角男人对未来的定位——只是定位于充满苦恼的未来——这不仅导致对当下事务的更加强调("我此刻就要"),而且很大程度上造成他们在职业、家庭和友谊上的无能,以及光阴易逝。

让我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有一天,泰利领了薪水,他给了我四张20美元的钞票,让我替他保管。三天后他把钱要回。我还给他,问他为什么不把钱存银行。他说银行在两点钟关门。我说,在他工作的时候,在两个街区范围内有四个以上的银行,可以很容易在午饭时间去任何一家。"不,伙计,"他说,"你不懂。他们在两点钟关门,星期六和星期天不开门。设想我有了麻烦,必须离开(make it)。我要离开这个地方,而我在这个世上的全部家当存在银行里?不好!不好!"

另外一个例子,乐华和他的女朋友正在谈论"麻烦"。乐华正下决心如何很好地着手弄到一大笔钱(long green),它的女朋友提醒他会遇到"麻烦"。乐华不屑一顾,说他生活中的"麻烦"够多的了,再多来一点也不怕。"不管怎么说,"他说,"我以要离开城市而著称。"②

因此,总是心怀充满"麻烦"的未来,导致总想着要离开,离开这个地方,没有勇气在所生活的世界扎根。③ 正如他没有勇气把钱存在银行一样,这也使他没有勇气担当工作的任务,特

---

① 在"当下取向"和下层人们之间没有隐蔽的内在关联。任何阶级的人只要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心生怀疑或彻底不报希望,"我此刻就要"就成为一种典型的反应,尽管通常用更精致的术语表达:例如,奥马尔·海亚姆的"取走现金,让信用随它去吧"或贺瑞斯的"及时行乐(carpe diem)"。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所有的阶级在性行为和其他行为上往往抛弃传统的限制(也就是说不太能或不太愿意延迟满足欲望)。当通货膨胀即将来临时,未来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人们之前对手中资源节俭使用,精打细算,而今几乎是争先恐后地把钱花掉。相似地,当人们处于病痛或困难时期时,未来取向往往崩溃而转变为当下取向。这里要强调的是,这种标签虽然被误认为是当下取向的,却表现为依情境而变化,而不是作为一种判断有认知力的下层社会的人的标准心理工具。

② 以后"麻烦"再至,也只是继续那样做。在这个案例中,麻烦指一项大陪审团的指控,一堆债务,以及与妻子孩子分道扬镳。

③ 关于"麻烦"作为下层社会文化的焦点的讨论,见:Miller, 1958:7-8。

别对于那些被承诺工资后付而非当下的人来说。同样，这也使他没有勇气与家人、朋友或其他任何人、地点和事务等保持深的和持久的关系，因为那样会使他自己不能抽身，限制活动的自由，进而损害他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就位于自由之中。

对卡车司机的回应背后，是态度和看法的复杂结合体。工作经历和对工作的恐惧不断地伤害着街角男人。一个人的工作经历和恐惧为另一个人所接受。他所能得到的这种工作——常常是只有努力争取才能得到——不断地证实他的恐惧，压制他的自信和自尊。直到最后，即使工作机会送上门来都感到害怕，此时他被自身的经历击败了，他对自我价值的信仰遭到破坏，他的恐惧是被证实了的事实。

第3章 别居的父亲

春天，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理查德四岁的儿子躺在儿童医院的 E 号病房里，病情严重。他和同病房的其他 12 个孩子几乎都是来自低收入的黑人家庭。此时正有 25 名亲戚和朋友来看望他们。在这些看望的人当中，没有一个男人。

男人们自有理由。有的已经和妻子、孩子分开住，所以不知道孩子病了。有的知道孩子病了，但不能去或不愿去。理查德本打算去，但有事没去成，可能明天会去。他反正从不喜欢呆在医院里，即便是去看病人。

但不论父亲是否与孩子住在一起，结果是一样的：没有男人看望 E 号病房的孩子们。父亲不在其位是父亲/孩子关系的主要特征之一。

然而，就街角地区所有做父亲的而言，父亲/孩子关系不尽相同，而且某种既成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有的父亲并非总是不在其位，有的比另外某些人"缺位"得少一些。而且，同一个父亲同时对待不同的孩子，关系的亲密程度可能也不一样。父亲/孩子关系处在一个大幅度的连续谱上，从对孩子的存在的完全漠视，到持续不断、日复一日地交往。这种关系情感内容的变动范围，从一端（可能表现在父亲对孩子些许冷漠无情或更糟，这是局外人能观察到的）一直延至另一端（是无以言表的私密关系），其亲密程度只能靠猜测。

暂不考虑情感内容，父亲/孩子关系大致可以在一个连续谱上排序和定位，这是以以下几个方面为依据的：承认父亲身

份的意愿，承认应付责任和提供经济资助的意愿，以及交往的频次和持续时间。在连续谱低端的关系中，孩子的出生是出于随意的、短期的，甚至是偶遇的结合；在连续谱的高端是合法的婚生孩子，所有家庭成员都住在一起。既然街角地区的多数男人没有与他们的孩子住在一起，那么这意味着多数父亲/孩子关系位于连续谱的低段或中低段。靠近另一端时人数迅速下降。

在连续谱的低端，可能根本就没有父亲/孩子关系。有的情况是，男人可能不知道他是孩子的父亲；还有的情况是，连做母亲的也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在连续谱的低端，有的男人承认可能的或真实的父亲身份，但却并不因此与母亲或孩子发生接触。那些连自己还不过是十几岁的人，似乎很多是这种情况，他们有自己的幼子，有"秘密的家"（"back home"）。理查德回忆，在和雪莉结婚之前，一个女孩儿告诉他，他是她孩子的父亲。他对此没有反应，这个女孩儿也没有，"因为她什么也不能做"。[①] 后来在探望"秘密的家"期间，理查德在街上看到了这母子俩，但没有和他们说话。他腼腆的笑容似乎混合了男性的自豪和罪恶感的尴尬，他承认孩子看起来和他惊人的相似。

沿着这个连续谱离开低端远一点，是韦斯利和厄尔与他们的孩子的关系。他们在卡罗莱纳州都有自己的孩子，自己"秘密的家"，且都承认他们的父亲身份。孩子出生后，韦斯利回老家时，曾看望了孩子的母亲一两次。韦斯利和孩子的母亲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韦斯利什么也没给她，而且她什么也没要。厄尔的孩子也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厄尔和孩子的母亲保持着彼此的好感。厄尔一年回家两三次，这时厄尔会定期去看望她，有时也看望孩子。如果有闲钱，他会留给她和孩子。

在连续谱的中段，是那些曾结过婚的男人与孩子的关系，

① 他解释了"秘密的家"，一个处在这种困境中的（黑人）妇女，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如果她提起诉讼，要求父亲尽到义务，法官会问她被指控的男子是否强迫了她。如果她承认他没有强迫她，法官就会取消立案。

这些人尽管与妻子、孩子分开住，但仍然保持来往。这些人承认对孩子负有经济上的责任，提供紧急的有时是例行的经济资助，而且或多或少了解孩子大致的福利状况。这些人与已分开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几乎总是肇始于母亲，通常是为了孩子们的抚养费。海猫的妻子给海猫打他租住房的电话，告诉他什么时候要来。她有时带来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都带来，有时一个人来。斯杜皮的妻子一般不打电话。她星期六早上带着两个孩子过来，呆上一两个小时。

连续谱中段的关系绝不限于合法的父亲/孩子关系。泰利是贝丝18个月大儿子的父亲。至少有一段时间，与海猫和斯杜皮与各自妻子、孩子的关系相比，泰利与贝丝的关系没什么两样。在泰利发薪水的日子，贝丝有时会给外卖店打电话，告知泰利她晚上会去那儿。泰利会和她在街角见面，为她付出租车费，然后给她五到十美元用来看医生、买鞋，或作为孩子的其他额外费用。

少数情况下，孩子由祖母或父系的其他亲属照顾，这时与孩子由母亲或母系的亲属照顾相比，父亲/孩子的关系似乎更亲密。这种情况下，孩子一般跟父亲这边的姓氏。父亲提供至少部分的经济资助。他经常了解孩子的特定需求和一般的福利情况，而且即便他们相隔很远，也会在一年中见上一次或几次。例如，斯韦特有一个"秘密的家"。孩子由斯韦特的母亲抚养。一年当中偶有书信来往，而且斯韦特会给孩子寄生日贺卡和礼物。一年内，斯韦特设法在一两个周末去看望孩子。在夏天，他的母亲和孩子会来华盛顿和他共度一两个星期。唐克七岁的孩子也生长在"秘密的家"中，由唐克的母亲抚养，他们的关系甚至更亲密。他们有书信和礼物的来往，而且学期末，女儿会过来与他共度整个夏天。斯坦顿的女儿住在他"妹妹"[1]家，与斯坦顿住的地方仅隔着两个街区。斯坦顿始终担负着女儿经济上的责任，而且视情况和需要，女儿也偶尔搬到斯坦顿

---

① 斯坦顿和这个(没有关系的)妇女以"兄妹"相称。见本书90页。

这里住上一小段时间。

在连续谱高端的父亲/孩子关系中，父亲与孩子是同一个家庭的固定成员。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双亲没有正式结婚，孩子跟父亲的姓也是毫无疑问的。不管妻子是不是有工作，这些做父亲的，在他自己及周围其他人眼里，都应负责妻子、孩子的日常开支，这与那些与孩子分开住的男人不一样。同属一个家庭的父亲与孩子，他们的交往或多或少是连续的。

从整体来看这个连续谱，街角地区典型的父亲/孩子关系似乎是这样：父亲与孩子分开住，承认父亲身份，承认经济上的责任，但不能按时提供经济上的资助，或者干脆在有需求和要求时才提供。与孩子的交往是不经常的、不定时的，持续时间短（几分钟到几个小时）。

当我们把视线从这些父亲/孩子关系的较形式化的方面移开，转到这种关系的质量和特征上时，一种悖论似乎突显出来。与那些和孩子住在一起的人相比，不和孩子住在一起的人似乎对孩子表达了更多的慈爱，更加体贴地对待孩子。而且，相对于自己的孩子，人们常常向别人家的孩子表达更多的慈爱。

例如，与孩子同住的父亲，似乎并未享受到天伦之乐，也很少在孩子身上花时间和精力。在平日的聊天中，他们很少提到自己的孩子中，也从未见到过他们在台阶上或街上坐在一起或一块儿玩耍。他们在街角或外卖店地区闲逛时，见不到身后跟着孩子，也不像邻近地区的其他父亲那样，在复活节的周日也许是任何一个周日或假日带着孩子散步。当他们回到家里时，孩子连抬头看都不看一眼，依然做着手头的事，父亲也同样对孩子未加关注。如果眼光恰巧碰在了一起，父子二人就装作没有看到对方，然后把眼光移向别的地方。

对孩子来说，父亲一个不经意的姿态会突然加深父亲与孩子的关系，无论时间有多短，这或许是平日温情和慈爱缺失的缘故。约翰对待六个孩子的行为偶然有所改变。他的妻子罗蕾娜这样描述所发生的事情：

他给了巴迪他们一角钱。好像耶稣在孩子们身上施加了魔法,他们跑遍了附近地区,炫耀爸爸给了他们一角钱。我整天给他们五分和一角的硬币,他们对此什么都不想。但约翰,给了他们一角钱,他们就到处炫耀,像给了他们整个世界似的。

既然父亲和孩子很少一起在外面露面,在家里,做父亲的很可能做出一些随意的姿态,传递着父亲的温情和体贴。乐华和两个朋友正在自己家里消磨时光。乐华坐在床上,心不在焉地敲打着躺在旁边的小儿子的头。在理查德的家里,理查德漫不经心地在地上和四岁的儿子玩着滚球或弹球的游戏,同时喝着酒,聊着天;有时偶然间把孩子招呼过来,夹在两膝之间,一只手搂着孩子的腰,另一只手把着一听啤酒,继续聊着。

父亲用这种轻松的方式表达着亲密,这表明这种亲密之前出现过。但孩子却不会随随便便对待这种亲密。这种亲密动作使他兴奋不已,他脸上洋溢的兴高采烈表明,他赋予这种亲密特别的内容,这绝不是平日能见到的。实际上,父子间的身体接触,一般来说是不寻常的。当这种身体接触发生时,哪怕仅仅是轻轻拍打也很可能被当作爱抚。

与和孩子同住的父亲相比,和孩子分开住而又保持联系的父亲,更多地谈及他们的孩子,父子会面时,表现出更多的温情。对他们来说,与孩子短暂的间断的接触,是公开展示父亲体贴和慈爱的场合。当贝丝为了收抚养费携幼子来到外卖店地区时,她有时会和泰利停在街角谈话,此时泰利把孩子搂在怀里,轻声低语地哄着或用鼻子逗弄着孩子。星期六的早上,斯杜皮的妻子刚来看过他,斯杜皮站在街角,还有其他三个人,望着妻子带着他们两个学龄的孩子,一边一个,消失在街的尽头。“我的心肝儿走了”,斯杜皮说,“那两个小孩儿,他们是我的心肝儿。”其他人点头表示理解。如果他们处在斯杜皮的位置,会有相同的感受,说同样的话。

上述孩子,由孩子的母亲抚养。如果孩子由祖母或父系亲

属抚养,父亲对待孩子甚至会更加亲昵。对他来说,孩子同样是"我的心肝""我的生命",或"我的掌上明珠"。和孩子在一起时,父亲的自豪和慈爱在公众的见证下表现得更加强烈。当唐克的女儿来与父亲共度暑假时,唐克领着她的手四处走动,几乎是游行,时不时停下来让路人确认,唐克有这样一位漂亮的女儿,这样一位聪明的女儿。斯威特明天下午不会出现在外卖店,他要带着女儿去逛商场买衣服。当孩子母亲刚刚领着女儿走来时,他没有认出来,他发誓说这是真的。没见面连一年还不到,他几乎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如果不是女儿喊"爸爸",他还是认不出,她都长这么大了。女儿充满自豪,她要把在这儿的全部时间花在陪伴父亲上,父亲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

但是短暂的相聚结束后,每个人都回到原本属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世界中,另外一方影响很小,可能在时间的绵延中被淡忘。在分离的父亲/孩子关系中,说"眼不见,心不想"(至少对于父亲来说)并不为过。

有很多方式解释这种悖论:在与孩子面对面的交往中,与孩子同住的父亲,比分开住的父亲表现出更多的温情、体贴和慈爱。[①] 最显而易见的解释或许是,分开住的父亲对孩子不担负日常照看的义务,不管平日的培养、规训和抚育,就像尽人皆知的溺爱的祖父或宠爱的叔叔一样,所以能在见面时表现出关心备至,情感外溢。相隔遥远,会面不易,父亲来见孩子时感觉是新鲜的,神情是专注的;会面的短暂,能使自己放松,感到安全,因为他知道他会很快回到没有孩子的日常生活中。

毫无疑问,上述的因素在这里是起作用的,部分解释了与孩子同住与不同住的父亲之间的区别。但在街角男人与孩子的关系上,最令人瞩目的是,最亲近的关系发生在这样的父亲身上:与孩子确实住在一起,接受日常照看孩子的义务,但他们

---

① 既然这里试图为街角地区的各种父亲/孩子关系排序,而不是评判这种关系,那么尽管父亲与孩子共同生活并养活他们的意愿,可能比面对面的交往中对孩子的语言表达能更好地量度作为父亲的男人,也与此处无关。

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这么做的。也就是说,孩子不是他们亲生的。

作为继父或养父的街角男人们,并非都能与同住的孩子建立起温暖的个人关系,甚至没有试图去这样做,但一些人建立和维持的这种关系,比亲生父亲还要好。例如,罗伯特与西赛瑞恩和她的四个孩子已经共同生活了一年半,在这期间,他已成为孩子们获得帮助和支持的主要来源。当跌倒、被打或别人夺走了他们的好东西时,如果罗伯特在那儿,他们会跑过去求助。罗伯特安慰他们,和他们一起笑,裁决他们的争端。他为他们画画儿,用剪成块儿的胶合板做七个小矮人,带故事书回家。

在与沙琳有自己的孩子前后,乐华照看着沙琳的小妹妹和小弟弟,十分周到,以至于他们的母亲和孩子们开始依赖他。乐华与卡尔文一起为孩子们洗澡,为女孩儿编辫子,在邦迪克斯(Bendix)自助洗衣店为他们洗衣服,与他们一起玩耍,在他们生日的时候去商店为他们盗窃礼物。卡尔文身体虚弱,病怏怏的,40岁,嗜酒,是同性恋,他照看孩子是为了有个地方住。当母亲正在对孩子实施惩罚时,如果卡尔文能鼓起勇气,他经常站在孩子们这一边去调停。卡尔文很少有事情不是为了孩子们。当孩子们身康体健的时候,他白天陪他们玩耍;当孩子们病了的时候,他晚上守候在旁边。有一段时间,他下决心不再搞同性恋(他已经结婚,当了父亲),只是在家里没吃没花的,长此以往、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才再次"卖淫",为孩子们弄些食物。当这样也行不通的时候,他会打劫安路超市,尽管对再次坐牢心存恐惧。他为自己在孩子们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感到自豪,他扮演得很好,孩子们把他的爱与资助认为是想当然的。

那么,父亲/孩子关系的不同之处,似乎不大在于与孩子的交往是持续的,还是间断的或偶尔的,而在于此人是自愿承担父亲的角色,还是不得已而为之。

与妻子和孩子同住的人,作为妻子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受到来自法律和社会的压力,有责任养活他们。然而,他恰恰

无力养活他们。在基本职责上不能胜任,这有损他作为父亲的表现,也有损他其他方面的表现。对孩子越是表露情感和接受,在公众场合和私下承担父亲的责任和义务越多;承担越多,作为供养者和家长,他的失败会越大,越迅速。为减缓失败,减少公众中尊严和自尊的破坏,他把孩子推开,也就是说,实际上"我连父亲都不想给你做,那么现在就不会因不能完成我不想做的而受到谴责"。

对于与孩子分开住的人来说,不再负有提供主要资助的社会责任。作为父亲的表现不再是一个问题。他的失败是一个既成事实。但现在,既然相比较而言免除了做父亲的义务,在与孩子间断的交往中,他能通过支付抚养费,通过表露出的惦念和慈爱,来获得些许作为父亲成功的喜悦;而作为全职父亲,他注定是个失败者。

如果与男人同住的女人,带来和别的男人生的孩子,这甚至更加显而易见。与那些与亲生孩子同住的男人比,这些男人对孩子负有较少的义务。与亲生孩子同住的人,对孩子的偶尔接触或其他温情的姿态,由于没有履行父亲的义务而变得不值一提。不管做多少,都是不够的。但如果与自己同住的不是亲生孩子,每一个温情动作、关切的表示和慈爱都有助于提高他的公众信用和私人信用;做的每件事都是有回报的。对他来说,与孩子住在一起,不会有挫败感和罪恶感,不像亲生父亲那样。由于自己和别人对他作为父亲的期望值很小,他能自由地与孩子建立亲密的关系,不必害怕会失败,不为罪恶感所累。与亲生孩子住在一起,好像就是与失败为伍,但与别人的孩子住在一起,在有关孩子的问题上,会处在一种免于失败的情境中:你赢得的也许多也许少,但不管你的付出多小或表现多不积极,你几乎绝不会失败。①

至此,除了上述非常粗糙的影响父亲与孩子关系的因素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影响父亲与孩子的关系,其中任何一个

① 当然,除非不顾平日的基本的行为准则,失去理智地去虐待孩子。

都可能把父亲与孩子的关系拉得更近或推得更远。[①] 例如,仅看与孩子分开住的父亲——他们占街角男人的大多数——他们与孩子的关系似乎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父亲与抚养孩子的大人的关系。因此,如前文所述,如果孩子与祖母或其他父系亲属同住(如唐克和斯威特的孩子),而不是与母亲或母系亲属同住(如海猫、斯杜皮的孩子),那么父亲与孩子的关系似乎更亲近。当孩子与母亲同住(大多数情况是这样),父亲与孩子交往的频率显然更取决于父亲与母亲的关系,而非与孩子自己的关系。如果男人与孩子的母亲互不来往,那么几乎也就与孩子没有直接联系。不管是不是住在不同的州或同一个城市的不同地区,这些孩子从不被送到父亲那儿与父亲共度一个周末、一个星期天,甚至几个小时。如果父亲真的去探望孩子的家,如厄尔,也主要是看孩子的母亲,而不是孩子。一般情况下,如果孩子的出生是由于父母一时的热度,那么他们只在父母保持或重建个人关系时才会见父亲。

父亲与孩子的关系取决于父母的关系,这在下面泰利与贝丝母子的关系上可以得到明显的体现。我们在此处也可以描绘出一幅父亲与孩子的关系依时间而改变的图景。

自从贝丝与泰利的孩子出生后,也是她与泰利不再一起外出后,贝丝只是在泰利发工资的那天(星期三)才来到街角,有时带着孩子,有时不带。但当贝丝和泰利重新彼此产生好感

---

① 例如,孩子的性别、年龄、肤色;是否婚育;兄弟姐妹的数量、性别、肤色;父亲的年龄和家庭地位;父亲、孩子或其他有关成人的识字能力(书信交流的能力);可接近程度,或物理距离、人格变量,等等。这些数据一般很不充分,不足以用来进行相关比对,但有证据表明,这些因素没有一项在父亲/孩子关系中的作用是支配性的或决定性的。然而,这些因素中,肤色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肤色浅的比肤色深的得到较多宠爱。合法的孩子也明显得到较多宠爱,但非法绝不是亲密的父亲/孩子关系的障碍。孩子的性别对男人来说是重要的,但有人喜欢男孩儿,有人喜欢女孩儿。我所观察到的最亲密的父亲/孩子关系大多数是父女关系,但总数太少,而且其他变量太多,连试探性的概括都不能确保做到。有关亲子关系中肤色的讨论,见:Drake and Gayton, 1945:498-503。莫里斯·罗斯伯对纽约州立学校的孩子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下层社会的父亲往往与女儿的关系比儿子亲密(Rosenberg, 1965:42ff)。

时，贝丝就经常带着孩子在星期五或星期六的傍晚过来，并且和孩子睡在泰利的房间，直到星期天的晚上或星期一的早上才离开。这几个周末，泰利有时把儿子带到外卖店，要上一瓶汽水，还有一次，泰利驮着孩子沿街行进，自豪地宣告，贝丝给他送来了一个能赚钱养家的男人。但几个星期后，泰利与贝丝吵了一架。贝丝不再过来，泰利与儿子的交往——取决于他和贝丝的关系——戛然而止。

父亲/孩子关系这种附带的、派生的特点，并不是只在孩子出生以后和父母分手以后才出现。这根植于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断然而明确地认定，男女关系重于可能的父亲/孩子关系。这种价值观的存在甚至先于怀孕，孩子出生后，在真实的父亲/孩子关系中继续起作用。

尽管父亲/孩子关系次于男女关系，街角男人确实也想要孩子，更不用说对建立家庭和作家长的一般化愿望。有的男人没孩子，可能想要个孩子证明他的男性气概；有的想让女朋友或妻子怀孕，可能是为了减少她偷情或出轨的机会；有的人想让某个女人为他生孩子，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这会保证与这个女人的关系长久。

做父亲的或不做父亲的都把孩子看成债务。最主要的债务是经济上的。一方面，人们都认为男人养活孩子是应尽之责；另一方面，钱财长期短缺。对于男人来讲，包括那些并没有实际为孩子提供资助的人，孩子是真实的、想象的或假定的经济债务。必须为孩子买食物、鞋、衣服、药品，或必须提供抚养费，这些都被当作借钱或拒绝借钱给他人的很好的理由和借口。无论人们如何盘算，共识是“孩子们，他们会从桌子上抢走很多点心[孩子们是昂贵的]”。如此说来，还要生个孩子？“孩子们，他们会从桌子上抢走很多点心。”如此说来，还要与带三个小孩儿的女人同居？“孩子们，他们会从桌子上抢走很多点心。”……

孩子越多，当然债务越多。斯威特说他遇到了一位自己倾心的女孩儿，正考虑搬过去与她同居，“尽管她带着两个小孩儿”。伯纳德不想让他的女朋友再生孩子，因为：“现在我的孩

子够多得了，已让我难以[在经济上]负担得起”。

孩子们，不管是亲生的还是别人的，在男女关系重于一切的世界中，都被看作债务。吃饭、睡觉、照看孩子、做爱常常被限定在一间房里，孩子们使私密活动变成了稀缺品。他们不仅对隐私(这对秘密关系的维持至关重要)构成威胁，而且也可能在其他方面严重限制了男人的行动自由。

例如，唐克毫不掩饰这样的事实，与七岁的女儿共度暑假并非完全是一件幸事。唐克和妻子珀尔没有孩子。珀尔想让唐克的女儿留下来常住，但唐克坚持在秋天把她送回到奶奶那里。唐克抱怨说，珀尔不在家的时候(她晚上工作)，他必须照顾女儿，如果一年到头都这么做，会严重危及他的自由。

唐克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几天后，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珀尔正在工作，唐克和威廉与两个女人开车兜风，带着女儿。第二天，大麻烦来了，小女孩儿指着一个女人对珀尔说，“就是她躺在爸爸的怀里。”

孩子不仅使非法的关系有曝光的危险，而且还会积极地干涉。真的，当唐克与依伦在车里接吻时，唐克的女儿使劲把他们拉开，向依伦喊道，“你不是我妈妈！你不是我妈妈！”①

在这方面，大一点儿的孩子是更大的麻烦事。克拉伦斯与妻子和孩子住在一起，但花大量的时间去会南希。他们的关系是激情澎湃的。有一次，在南希与克拉伦斯正在吵架时，南希12岁大的儿子用棒球拍打了克拉伦斯。街上的男人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对克拉伦斯也不抱什么同情。对发生这样的闹剧，大多数人只是耸耸肩。毕竟都知道，与有半大孩子的女人有染是一件危险的事。克拉伦斯明知道如此，还是陷了进去。

男人视孩子为债务，有孩子的女人与男人很难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关系，这是女人心知肚明的，并对此感到痛心。理查德和雪莉正在吵架，他告诉雪莉，她可以带着孩子离开。雪莉

① 当然，珀尔也不是她的妈妈。我猜这个孩子这里用“妈妈”这个词，指的是他父亲的妻子，也就是她的继母。我做的记录没说这个孩子是不是喊珀尔“妈妈”。我猜她不会这样喊，因为他们只在夏天才在一起。

哭得厉害：

> 我能去哪儿？去我母亲的坟墓？去哥伦比亚特区太平间？他们上个月才把我姐姐的尸体火化。我孤孤单单，能去哪儿？没有人愿意收留带着三个婴儿的女人。①

罗蕾娜对男人作为父亲所作的轻蔑的评价，道出了女人们的心声。在厨房里，罗蕾娜与雪莉、沙琳展开讨论，不认同男人所宣扬的对孩子的爱和关心，因为他们言行不一，没有在行动中做到。她总结道，事实上，男人认为孩子是债务。

> 他们[男人们]说自己爱孩子。狗屎。如果他们爱孩子，能让孩子饿肚子吗？穿破破烂烂的衣服吗？他们不爱孩子。孩子只是男人的一条绳索。

男人把孩子当工具使用，也就是说，在男女关系中把孩子用作惩罚和控制的工具，这尤为女人所憎恨。② 一般认为，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比父亲与孩子的要牢靠得多，这使母亲在此策略面前尤显脆弱。有的女人不敢与丈夫吵架，是为了避免孩子会因此而经受痛苦。她知道，男人也知道，男人能通过虐待孩子降伏女人。有的女人已和丈夫分居，只是偶尔得到经济上的资助，但她不敢把他告上法庭，因为她害怕，作为报复，男人会坐监狱，而不是为孩子支付抚养费。乐华经常把他的小儿子唐纳德作为达摩克利斯（Damocles）之剑，来控制沙琳。有时，在吵架期间，他否认唐纳德是他的儿子，并且明知道沙琳无处可去，还把她和孩子撵出公寓房，扔出他们的家当。如果是沙琳采取主动，轮到她威胁要离开，乐华则拒绝让她把孩子带走，以此迫使她留下来。有时，他直截了当威胁要带唐纳德回老家，交给

---

① 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有孩子也降低了工人阶级或中产阶级寡妇或离婚妇女的市场价值。

② 这往往支持了男女关系重于父亲/孩子关系的观点。

祖母抚养。

普遍认为孩子对母亲的依恋强于父亲，这自然也为父亲（理论上是）承担主要训教者的角色提供了正当理由。施以体罚的责任，理论上落在了父亲头上，因为舔犊之爱使母亲下不了手。

“男人在养育孩子上起更大的作用，”一个男人说，因为父亲能用巴掌和拳头来防止孩子做坏事。女人做不到。“女人——喔，孩子是她生的，不管男人怎么做，她不能自己伤害自己的骨肉。”

男人常常认为妻子对孩子太放纵（too easy）。“她太放纵了，总是亲孩子，把他抱起来。她不管孩子在地板上拉屎和尿尿。”虽然已经和妻子孩子分开住，泰利还是在抱怨妻子从不打孩子。“她总是搂着孩子，和他们说话，但有时[如果不严惩]他们不会有长进。”

有时女人站出来反对，做母亲的一个人能做到正确抚养孩子，但他们同意，相同条件下，如果有个男人实施或威胁要实施惩罚，孩子处境会更好。“我一个人抚养三个孩子，但有个男人会好些。孩子们害怕男人但不怕母亲。我的儿子一点儿也不怕我。”

男人视体罚为抚养孩子必要的和正当的一部分。“一个孩子，很需要体罚，否则不会有长进”，“打孩子能有效地帮助他们分辨是非”，这是所有男人都赞同的观点。但所有的人也同意，惩罚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实施。“如果很早以前做了坏事，此时才打，不能遏止他们继续做坏事。你必须在他们做完之后就打，这样他们会知道为什么挨打。”人们认为，社会认可用特定的方式施以体罚。“用棍子打会伤到孩子，也不能打眼睛或头部。这是为什么这样做会触犯法律的原因。你应该打他的大腿或其他禁打的地方。”

如果把此人视为儿子而非父亲，则父子关系表现得更疏远。部分原因可能是，父亲/孩子关系随时间推移而恶化，以及父子都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对他们关系持不同看法。孩子还小时，父亲可能还与家人住在一起，或者不管怎么样，会用某种方

式力图出把力。但父亲离开后（他通常会这样做），时光流逝，相距遥远，父亲与家人连维持表面的家庭关系都日益变得困难，这种家庭关系一方面是男人与妻子的，另一方面是男人与孩子的。正如泰利、斯杜皮，或其他任何人，亲生父亲向朋友提及他们时，就会激动起来，承认自己该为孩子们多做些什么，但又相信，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已尽力了。但按照孩子的观点——甚至是从成人成熟的立场上来看——父亲抛弃了他们的母亲、兄弟姐妹和自己；或许该送他上法庭，判他支付养活妻子和儿女的费用；即使是在家里，他留下的印象也是手拿鞭子或皮带。

男人自然很少提及他们的父亲。一群人花上几个小时回忆他们的父亲，却什么也说不出。很多人像是从不认识他们的父亲："我不记得他"；"他在我出生之前就离开了（或死了）"，或直截了当，"狗屎"。

海猫，在这里出生和长大，他的母亲一直住在这儿，压根儿就没提到过他的父亲。乐华被祖父母养大。他的父母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但乐华只和母亲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只是在要修复关系或作出这种样子时，他才会提到父亲。

理查德的父亲在理查德还是个小孩儿时离开了家人。他的父亲在卡罗莱纳州经营一家小酒馆。在他路过这里时，理查德才有机会见到他。他父亲从未见过理查德的妻子和孩子。理查德和父亲关系从没好过。"我们几乎从不对视。"

泰利的父亲也在泰利是个小孩儿的时候离开了他和他的母亲。"他是个骗子、赌徒。一辈子没工作过一天。"泰利大概是九岁或十岁的时候，被送到伯明翰的父亲和继母那儿。他不记得为什么被送过去，也不记得呆了多长时间。他记忆的全部是父亲曾对他暴打一顿。

有时，邂逅相遇，短暂的谈话，可能对父亲/孩子关系的双方作出解释。从下面一幕，我们可对作为儿子、丈夫、父亲的男

人窥视一斑。母子关系与父子关系对照鲜明，特点迥异。[1] 普雷斯顿三十五岁左右。穿着老式的卡其布军服，双手插在口袋里，斜靠在路灯柱或店铺前，他是闹市区小餐馆前的常客。小餐馆有时忙不过来，就叫他进去帮忙。下面是我在这家店坐下来时发生的。普雷斯顿给我拿了杯啤酒，开始聊起来。

"你知道，自从上次见你之后，我遇到很多麻烦。"

"什么样的麻烦？"

"我母亲死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过。"

"是，他三个星期之前死的。从那以后，我喝酒快喝死了。上星期，在我领到工资之前，我已把这些钱喝得一分钱不剩。我不知道做什么。我曾考虑自杀。"

"你只是需要多一点儿的时间。像这样的事，三个星期不算长，你会挺过去。"

"可能会，可能不会。我母亲是我的全部。我曾想要去宠物店买只猫。"

"你父亲怎么样？"

"去他妈的。我连想都不愿想他。"

"你有孩子吗？"

"有孩子有什么好？他们在德国和日本。我曾想过要结婚。但如果没找到理解你的女孩儿，结婚绝不是什么好事。"

他在柜台下面取出一个盒子，让我打开。里面是一件轻薄的睡袍，有鲜亮的花儿作装饰。他眼里含着泪水，解释说，这是在母亲住院期间为她买的衣服，但没来得及给她。在买衣服的当天晚上，他接到华盛顿总医院的电话，让他立即过去。他一路跑去，但母亲已经过世。普雷斯顿记不太清接下来发生的

① 即便是在某些最贫穷的家庭中，母亲的感情生活也可能是以儿子或女儿为中心的……她与男人的态度经常呈现出显著的对照(Frazier,1939:468)。

事。他说当晚他喝了很多酒，也是同一个晚上或第二天早上，他必须去哥伦比亚特区太平间辨认母亲的遗体。当太平间工作人员掀开床单，露出他母亲的脸时，普雷斯顿重拳打向工作人员的嘴。他举起结了痂的右拳的指关节作为证据。

“你为什么打他？”

“因为他给我看我死去的母亲。”

第4章 丈夫与妻子

为数不多的几个街角男人认为终是要结婚的。有几个已经结了，而大多数通过尝试，发现不宜结婚。

打算结婚的人追求的是正式的、法律意义上的婚姻，有一份婚姻证书，“有文件的形式”。由婚姻确定的权利和义务是明确而没有争议的，它们在婚礼誓言中和法官证婚人的证词中来阐述。人们可能没有享受到权利，或忽略了他们的义务，但是他们不会否认这些权利和义务的存在。

男人和女人都能仔细区别出婚姻和事实婚姻(common law)、同居关系(shacking up)、共同生活(living with)等其他两愿结合(consensual unions)的不同。当然，这些关系中大多都存在着重叠部分。两愿结合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往往以婚姻所产生的权利义务为参照。实际上，说清两愿结合与婚姻之间的区别是件困难的事。主要有两点不同。首先，两愿结合的权利和义务背后一般说来很少有公众压力。结果是，在婚姻形式和两愿结合的形式下，同样是违反约定的行为，在前者的情形下会招致更严厉的制裁。其次，在两愿结合形式里权利和义务缺少明确的界定，尤其当关系边缘化时。结果是，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每个人都一致认可某种行为违背了婚姻关系时，却对这种行为是否违背两愿结合的关系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例如，对配偶性独占(exclusive sexual access)作为适用于婚姻的一项权利已广为认可。但是在两愿结合中，对性权利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有些街角男人认为在两愿结合中一方有权

要求性独占,有些人则否认这点。也许大多数人认为每个人都有权期望性独占,但却无法要求之。实际上,这可能就是婚姻和两愿结合权利的主要区别。在婚姻中,一方有法律权利要求某行为,另一方则有法律义务去履行这些行为。但在两愿结合中,这种关系被削弱了,一方可能期望对方有某些行为,但另一方却没有法定义务去履行它。①

婚姻中要求权与两愿结合中特权的不同,以及两愿结合中权利明确界定的缺失,均可以从斯坦顿与伯妮斯之间的冲突中看出来。他们住在一起不久,斯坦顿就被捕并入狱三十天。释放后,他回到他们的住处,发现伯妮斯正和别的男人在一起。于是,接下来几个星期,斯坦顿拒绝找工作。很明显,他要伯妮斯为她的行为"付出代价",迫使她"付房租并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假如斯坦顿和伯妮斯结了婚的话,可能有人会质疑斯坦顿对伯妮斯这种做法是否明智、有效甚至公平,但没有人会质疑他是否有权利这样做。但斯坦顿和伯妮斯没有结婚,所以既有男人也有女人说斯坦顿所做的是件"可怕"的事,伯妮斯也许没做"对"事,但她有权利做她所做的,因为他俩并没有结婚,她所做的也并没有"伤害"斯坦顿,即使是伤害了,他也没有权利让她为这件事"付出代价"。

在两愿结合中,一方可以明确指出他们自身关系与婚姻关系的区别所在,既为了质疑另一方的权利,又能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因此,当男人试图要留住女人在自己身边时,女人可以从男人身旁气昂昂地走开,并提醒他说"我只是你的女朋友,并不是你的妻子"。所以,乐华在与沙琳同居几个月后,依然承认他的权利在他们非正式法律婚姻这一事实面前大打折扣。他们之间有过一次争吵,他们的关系几乎就此了断。后来,同一天里,乐华留了个便条给沙琳,上面写着:"周日下午六点钟之前的时间里,我决定让你好好想想,你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做任何想做的事,因为正如你所说的,我没有任何(法

---

① 在霍菲尔德的立场上,区别就是存在于要求权(关系中的义务)和特权(对另一方没有要求权)之间(Hoebel, 1954)。

律)文件加负在你身上。"①

婚姻和两愿结合之间的区别还可以从一方对另一方的称谓上展现出来。例如,丈夫和妻子这两个词汇,向来都是用以指称正式结婚的双方。因此,海猫解释说:"普丽西拉是我老婆(old lady),我妻子住在东北部。"泰利对威廉解释说:"萨拉只是布德的老婆(old lady),他们并没有结婚。"然而,若不是进行特意对比时,老公(old man)、老婆(old lady)、男人(man)、女人(woman)也可以用来标识丈夫和妻子。"我的老公(老婆)",既可能表示着"我正式婚姻的、法律认可的男人(女人)",也可能表示"我与之住在一起但没有正式法律意义上结婚的男人(女人)"。但是"我的丈夫(妻子)"则总是指"我正式的、合法婚姻的男人(女人)"。

这些称谓及它们的使用方式反映了婚姻和两愿结合之间相互叠合的关系。"老公"和"老婆"在两种关系中均可使用的事实证实了婚姻和两愿结合两种关系具有同等性;而"丈夫"和"妻子"仅供婚姻使用并拒绝两愿结合使用这一事实显示了婚姻关系的特殊性。

因此,相比两愿结合而言,婚姻关系显然是一种高位关系。婚姻比两愿结合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能赢得更大的社会尊重。不仅婚姻的权利和义务得到更多社会力量的更好规定和支持,而且只有通过婚姻,男人和女人才能表达他们作为丈夫和妻子的合法诉求。

但是,当街角男人注意到丈夫和妻子们日复一日经历的婚姻现实时,就其所知,婚姻行不通。他知道这点,是因为自己父母亲的经历,以及大多数同龄人父母的经历。他知道隆尼掐死了妻子,也几乎因此丢了性命。他看到克拉伦斯试图阻止妻子谴责与自己在一起的女人,而他们四个孩子中的两个正惊恐无声地看着。他知道,汤姆在餐馆打杂的工作根本无法养活妻子

---

① 这段插曲发生的时间(1962年10月)尤其重要。沙琳那时怀着乐华的孩子已有九个月了,但连就在眼前的亲子关系也不能把他们之间的权利和责任提升到妻子和丈夫的高度。

儿女，为了妻子儿女能符合 ADC（对贫困儿童的补助计划）资助条件而离开了家。他看见乐华和沙琳在人行道上慢慢溜达着，沙琳手持一个破可乐瓶戳向前方，乐华用夹克裹住右臂，抓向她。他看见唐克站在妻子当侍者的街角，却不敢去找份工作，因为四处传播着她要"甩掉"他的传言。他看见雪莉把脸埋在手心里战栗着，也许是因为圣诞节的风又一次掀开了钉在窗户上的毯子，但更多是由于她和理查德要作出的决定——是把孩子们送到少年村（Junior Village）①，还是带他们到联合车站（Union Station）的候车厅过夜。还有，凌晨两点时，他看见乐华和沙琳在街上，乐华抱着他们一岁的儿子，他们正焦急地四处张望是否有人，任何一个能把他们带到儿童医院的人，因为他们的孩子在睡觉时脸颊被老鼠咬到了。

这些都是他看到、听到和知道的街角人的婚姻故事：那些结过婚或已婚人们有时苦涩的觉醒；丈夫和妻子之间公开和私下的争吵，以及时常盛行在他们周边的性嫉妒；不能为妻子、孩子们提供食物、衣服和住房的丈夫们以及不愿这样去做的丈夫们；突然意识到不能保障孩子们健康和安全的丈夫和妻子们的恐惧。那儿没有（哪怕挽回这一切情形中的部分也好）一桩街角男人和女人的婚姻是他们自认为的"好"婚姻。

有人认为街角男人呈现的均是反婚姻。在街角，他听到海猫声称："我结过一次婚，一次就足够了。"并且从其他人那里听到一致赞同的声音："我同意那种说法。"在理查德个人的房间里，理查德安静并充满感情地告诉他，如果和雪莉的婚姻破裂了，"往后不再谈婚姻了②，伙计，我不想再结婚了。"

他听到了其他的疑问：海猫、理查德或别的男人一开始时是否真的想结婚？他们把婚姻归咎于许多突如其来的事件和周围的环境，这些迫使男人不得已进入婚姻状态。这种强迫假设适用于某人自己的婚姻，同时也适用于其他人的婚姻。理查

① 华盛顿哥伦比亚区为被遗弃、未独立儿童而设的家。

② later for(something)大概意思为：我不再想与这件事有关，或不想再涉及这件事，至少现在如此。

德时常声称自己和雪莉结婚仅仅是因为如果他答应结婚的话，他的祖母答应给他 50 美元。男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乐华和沙琳结婚的话[最后他确实这样做了]，那只是因为沙琳怀了他的孩子，并且因为沙琳的妈妈玛尔维娜以及她的社工“跟在他后面”[也就是说给他施加压力]。男人们还说，罗伯特和西赛瑞恩结婚只是为了对付隆尼的竞争，隆尼为了让西赛瑞恩离开罗伯特答应与她结婚。

强迫性无法解释的地方，男人们就表示一点也不理解婚姻的动机所在。当波利周末要结婚的消息传到街角的时候，唐克摇摇头，说他不明白波利已经和那个女孩同居了为什么还要结婚。其他人也都不理解波利的行为。和其他人一样，理查德认为强迫性是早婚中一个尤其重要的因素。

> 你所见到的 18 岁左右的人，除了他自己外，一无所有，他走出那里[进入这个世界]。现在你见到 18 岁左右已经结婚的人，他结婚是因为他们有了孩子或别的原因。

但是，越近距离看个案，越难检验其强迫性。罗伯特自认根本就没有压力。实际上，当罗伯特向西赛瑞恩求婚时，她已经拒绝了隆尼的求婚并打算回到罗伯特身边。至于乐华，确实存在着来自玛尔维娜、她的社工以及沙琳接受产前护理的诊所里人们的压力，但是沙琳说她可以延后婚期直到孩子出生，这样就给了乐华一些走出压力的机会，使得他能选择在外部压力之外作出他的决定。①

因此，有人认为一些男人也像乐华这样由于婚前怀孕或生育的压力走入婚姻，这对街角男人来说最多只是一半事实，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在结婚前就已经是一个或几个孩子的父亲了，而且还不是接下来要与之结婚的女人生的。确实，男人经常对女人和女人所怀的孩子产生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有时，如果女

① 实际上，他们直到 1964 年 7 月才结婚，那时他们的儿子已经一岁半了，沙琳已怀上他们第二个孩子几个月了。

人愿意的话,这种责任感将使他与这个女人结婚。但如果他不愿与这个女人结婚,不管什么原因,他都不会结婚的。比如唐克,他可能会自己带孩子,或把他交给自己的母亲抚养,支付抚养费;比如汤米,他会继续与这个女人做朋友,并且任何时候只要他有能力都会从经济上帮助她;比如威廉,他可能只是不为人所知地取消掉婚约。像韦斯利这样的,不和她结婚的话他会有罪恶感,而那也只是个他能承受得住的罪恶。

> 那个女孩儿[韦斯利孩子的母亲]……只要我开口,她随时准备和我结婚,我可以这样说……现在,这个女孩儿——只要这个女孩儿还是单身,我都不打算结婚。我不愿意和她结婚,但在她结婚以前,我也不会与其他女人结婚的。你明白的,只有当她结婚了,我才能确定自由了。你明白的,如果我要结婚,我将在自己心里暗自揣摩会儿。我现在就在想这点了。我告诉自己说:"我应该去和这个女孩结婚。"但是,我并不愿意这样做。

因此,婚姻中强迫性假设是,最起码部分是,一种公共构造(a public fiction)。在这种被迫的姿态之下,大多数男人是愿意结婚的,这种意愿(为这种姿态所遮蔽)主要是建立在这种对婚姻的认识之上:通过婚姻这种仪式可以进入男人的层次。对年轻的、没结过婚的男性而言,结婚意味着成为一个男人。

> 结婚对于我来说是件大事。我不是非得结婚不可。我们不是没有孩子,不是一无所有。但是你知道,我要成为——力图证明我是个男人或者别的什么,于是我加了把劲儿,结了婚……

理查德以一种柔和而平常的腔调对韦斯利和我说起他的

婚姻。[1] 韦斯利点着头，他知道理查德的意思，他说他也渴望结婚并安定下来。他把所有女孩都挑选了个遍，正等待与其中一位女孩结婚，这个女孩已有了他一个孩子。厄尔和波利等其他未结婚的年轻男人还不能确定女孩或者时间，但是私底下，他们确定说他们很快也会结婚的。

个人意愿和公众强迫性假设之间存在的差异，实际上指出了婚姻应当如何和实际如何之间的差别。理论上，婚姻是“一件大事”，它是获得男子气概的途径，并伴随着责任、义务和职责，当这些得到履行时，将给个人带来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尊重。实际上，婚姻却只是男子气概这一关键领域中一个失败的时刻，它使得结婚男人社会地位降低、社会尊重缺失。婚姻理论上所提供的与现实中所给予的之间的差别，好比嘴里的灰尘(a dust in one's mouth)。它在理查德的嘴里。

> 一个男人[准备结婚了]，他有他的想法。你知道的，他认为婚姻是一件大事，但是你也知道，那根本就不是一件大事儿。

男人可能渴望能“加把劲儿，结婚”，“成为一个男人或别的什么”，但是他们也知道，或深表怀疑，婚姻是一个大冒险，他们用暧昧的回答来对抗可能的失败，借着公众为之构造的强迫性假设来伪装他们个人想要结婚的意愿。这种暧昧的回答减弱了失败的冲击，它表示男人不是完全和自由地缔结婚姻契约，男人是被迫、不情愿或仅仅是“按部就班”走入婚姻的。因此，婚姻部分上变成了没有拥有的拥有。暧昧许可了一种更加被动的参与，而非公共担当负载的职责。它给了男人一些借口来对抗那些根据契约条款严格要求他的人们，而且它会略微减轻婚姻破裂所带来的负担，因为他可以说这样的话来为自己开脱：“一开始我并没想要结婚。”

---

① 这一次，他不再自夸地说到他的祖母和50美元的贿赂——一个遗漏的细节，显示出这个贿赂主要充当了一种促成机制，为他自己要结婚的意愿效力。

为什么婚姻行不通

男性缺陷论

当男人们回首他们破碎的婚姻时，他们倾向于解释说失败是因为他们个人的能力有限，或是不愿意去迎合婚姻关系的内在要求。举例来说，海猫向街角男人承认说，他婚姻破裂是因为他不能让自己的独立性屈从于共同的要求。

> 我结过一次婚，一次就足够了。我再也不能那样活了：有人总在告诉我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吃饭，"来这儿""去那儿"。伙计，我要做自己的主人，成为中心人物。①

斯杜皮把自己婚姻的失败归咎于他对威士忌没有抵抗力上，并诉说着当他喝醉、花掉或者赌掉房租时妻子是怎样的愤怒。他说她远比他意料中容忍自己的时间要长。即使现在，每周六早上来自己这儿为孩子们拿钱时，她说如果他发誓永不再喝酒的话，她愿意再试一次。但是他知道自己不能坚持这样的约定，即使他爱她和孩子们并希望他们能回到自己的身边。

当妻子以其疏忽抚养义务的名义把自己告上法庭时，斯杜皮和海猫一样没有任何怨言。斯杜皮和海猫都使各自妻子失望了，他们都是背叛婚姻契约的一员，而他们的妻子只是在做她们有权做的事。

泰利也有同样的感受。和妻子住在一起时，他酒醉乱语完全扰乱了她的生活。另外，他还离不开别的女人。但他仍然爱着妻子，如果她能再给自己一次机会的话，他将会放下所有的

---

① 同样，女人也想男人能成为"主人(master)"，但这个词，对丈夫是这个意思，对妻子而言又是另外一个意思。见原文第 85 页。

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对于男人来说是如此微不足道，但作为妻子拒绝再接受这样的丈夫也是合理的。

> ……我爱我的妻子。当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好像]她和我在一起，我的孩子们也和我在一起。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相信她会回到我身边的，我真的相信。如果她真回来的话，我将会放弃其他女人。我要改变我整个的生活。

进一步来看，这些对婚姻失败的原因所进行的自我分析令人难以接受。撇开似乎是男人们离开了他们妻子这一事实而不是妻子们离开了丈夫这样的事实不说，对自责的这些公开臆断所表达出的谦逊对他们自己毫不留情，让人难以无可置疑。在每一个案例中，男人总是很谨慎地把自己作为丈夫不称职的表现归咎于他无法抛弃男人这个或那个性格特点，比如精神的独立性、对威士忌的嗜好或对诸多女人的欲望。他们回溯他们作为丈夫的失败时，会直接与他们作为男人的弱点和男性的缺陷联系在一起。①

这种男性缺陷理论的解释简单，把婚姻失败之责揽为己有，这对街角男人有强烈的吸引力。② 但是这个理论太贴切太简单了；有人觉得它违背了充分合理原则。婚姻和婚姻毁坏的错综复杂性需要能触及这一错综性的解答。对性不贞行为（最大、最普遍的男性缺陷）更深入的观察表明，这些男性缺陷自身不太具破坏性，而是每种缺陷根植于与婚姻之构成物相联系的

---

① “……人们不只渴望优秀；他们渴望成为一个优秀的男人或女人，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文化里，在那些代表着各自性别角色的方面……即使他们所做的是传统标准认为不体面的行为，*这种不体面也是鲜明的男性和女性气质的不体面。*”（Cohen，1955：138）。

② 在一次富有想象力的争论中，克洛沃德和奥林针对在青少年偏差行为亚文化（delinquent subcultures）发展进程中对失败的调适假设道：“集体调适可能出现在失败被归因于现有制度性安排不充分所致的地方；相反，当失败被归因于个人缺陷时，单个调适更有可能发生。”（Cloward and Ohlin，1960：125）。“男性缺陷理论”当被看作是婚姻失败的一个调适时，似乎不符合这个假设，或最起码提出了另一种可能：一项参与者同意把失败归因于他们个人的集体调适。

前因后果之中。

男性缺陷之性不贞

泰利所声明的只要妻子回来他将会“放弃其他女人”的话语作为一个美好意向的宣称是可以接受的，但街角男人不会把它当作是对实际发生情况的描述。不仅男人自身，其他人也持有的最广泛和最强有力的观点认为男人生来就不属于一夫一妻制的；没有一个男人一段时间内只满足于一个女人。[①] 也就是说，撇开男人剥夺女人的欲望不表，他们追求女人是他们的本性使然。这种“本性”型塑了他的性生活，然而，这种本性并不是人类的本性，而是人类无法完全掩饰的狗性。一个男人已经有妻子或别的女人了，还继续追求另外的女人，是因为他的内心里有太多的“狗性(dog)”。

> 男人就是狗！我们不能称自己为人，我们就是狗，狗，狗！他们喊我狗，因为我就是，但每个人都是——从一个女人那儿蹿到另一女人那儿，就像一条狗。

海猫的这个宣称得到了街角男人的一致赞同。相似的一致性出现在另一个场合。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泰利、克拉伦斯、普雷斯顿、威·汤姆和我坐在一辆停着的汽车里喝酒，泰利与路过的女人们搭讪。

泰利说了句“你要去哪里，宝贝”。有个女人听到了，走近汽车并挨个儿仔细打量了我们五个人。“走路！”她说，然后就转过身去。我们看着她漫步穿过街道，臀部左右扭摆着，好像完全独立于她身体的其他部位。“漂亮极了！”泰利说道，“确实漂亮极了！”其他人发出附和的声音。

我十分惊讶于我们五个人的吊诡之处，各自都有个好女人

---

① “在下层社会层面上，认为男性基本上是滥交的，他们打算搞一些婚外性行为，不管妻子或社会是不是反对，这个观点有点痛苦地被接受。”(Kinsey, Pomeroy, and Martin, 1953:307)

在等着我们回家(虽然当时泰利是一个人住),却坐在汽车里,喝着酒,并且打算占有从街上经过的任何一个女人。答案来得迅速并且一致:我们这些男人内心有太多的狗性了。

“那和一个男人多爱他的妻子、孩子无关。”克拉伦斯说道,“他总是追逐别的女人……男人有太多的狗性了。”其他人同意克拉伦斯的说法,并且经过随后的讨论依然保持完全一致的意见。①

男人内在的狗性驱使他去寻求不断扩张的猎艳领域,这是个推拉事件。普遍认为,一个“新”女人比妻子和女友在性上更具刺激性、更令人满意。男人们也看到,自己与“新肉”或“鲜肉”在一起时,性表现比和自己熟悉的人在一起时更好。二十八九岁或更老点的男人或许会蔑视认为他们的性表现不如十八九岁或二十刚出头时好的说法,他们坚持认为在任意一场性活动里,他们的性表现较少依赖于年龄及其他个人因素,而更多依赖于他们恰好在一起的女人。多样性不仅是性生活的调味剂,还是男人的壮阳剂,其可以提高男人的性能力。这一点或许从一个标准的笑话中最能表现出来,这个笑话在谈到性能力的话题时经常被提到。它更多情况下是作为生活的事实被讲述,而不仅仅是个笑话。

> 一个老男人和他的妻子坐在他们家的台阶上,慢慢摇,看着一只公鸡与一只母鸡交配,接着与另外一只。这只公鸡这样做了数次,老妇人转向她丈夫说:“为什么你不能像那只公鸡?”
>
> “如果你看仔细点儿,”老男人说,“你会注意到那只

① 但是几分钟后,当被问到是否女人也和男人一样内在有着很多的狗性时,男人们对自己的答案不是那么确信,并且彼此之间也不统一。一种观点认为女人和男人一样内在有着同样多的狗性,但是一个好女人同样也有很多自尊,这些自尊会使她们不会像男人那样做。另外一些人认为,女人内在的狗性少于男人,因此她们在性行为上更保守。第三种看法认为,女人内在的狗性比男人还要多,但这种狗性被双重的标准遮蔽了,阻碍了女人们的行动自由。还有另外的看法认为,一些女人内在的狗性比男人少,一些女人会多于男人,这也就成了有好女人和坏女人之分的原因。

> 公鸡每次搞的不是同一只母鸡。如果它不得不与同一只交配，它不会比我好到哪儿去。”

男人们在试图同时维持与自己妻子以及与其他一个或更多女人关系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生此种关系危及彼种关系的情况。其中，尤其是婚姻关系可能会遭受性伤害。男人承认这点但不会因此而收敛。他没必要也不会吹嘘自己和某人的性事多久一次以及每次性经历中他能达到的高潮次数。在特殊情境下，他甚至会承认自己不能从事性行为，而这样做提升了他成功征服女人的男人形象。比如这里的例子，男人们说当他们与别的女人做完事回家后，就不能或不愿意再满足他们妻子或同住女人们的性要求了。

这种困境总是以一种吹嘘的方式来获得充分认可。在街角，每个男人都自称有一套对付这种困境的独特方法，这是巨大欢乐的一个来源。海猫自称经常假寐或装病；克拉伦斯坚持熬夜看深夜的电视秀节目，直到妻子主动放弃后睡了；理查德则无端生出一段口角后睡在别处，只要不与雪莉同在一张床上即可；其他人也会装出醉酒、工作疲劳，或干脆在妻子睡了后或天亮家人起床开始又一天的生活后再回家。

这样逃避的行为给婚姻带来的伤害在男人那里有一套评定方法，在女人那里则又有另一套。男人往往看待这个问题很简单：他有个缺点，这使得他奔忙于其他女人中间。他只是内心里有太多狗性存在。他确实背叛了婚姻，但只是在这一狭小的性忠诚领域内。

正如街角一桩已破裂婚姻中的妻子所言，这种伤害实际上更广更深。苦涩中夹杂着屈服，她诉说着丈夫是如何奔忙于其他女人间且逃避她的性需求。她说她能忍受这点，但不能忍受的是他对任何她所做的事都要挑出毛病来，比如她照顾孩子或打扫房间的方式。这很明显是为吵架来寻找借口的，而吵架则

是为了避免与她发生性关系。① 结果，她说，他们生活的所有领域，而不仅仅是性关系上，都无可救药了。

持有狭隘而绝对的男性缺陷论会导致对问题错误的阐述以及不恰当的解决方法。理查德即是一例。他与雪莉的婚姻已变得很糟了，几乎一无是处。而问题之所在，在他看来是最简单不过的。“我是个放浪的人。我一直就是个放浪的人。生来如此。我内心有很多狗性。”他说，作为一个放浪者，他受到驱使去寻猎其他女人。作为一个“步行者”（因为他没车），他不得不把猎艳活动限制在离家很近走路即达的范围内；进而造成多次被雪莉发现并导致了长期的家庭争吵。理查德说如果现在他有一部车，他将会到外区去泡女人，雪莉就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至少不会再把他逮个正着，那么打架和争吵也将会停止。②

其他观点

不是所有男人在解释婚姻失败的缘由时都认可男性缺陷论。有时，即使认可这一理论的人也会给出可替换的解释。通常来说，那些不把婚姻失败原因归责于自己的人则会归责于他们的妻子，而不是家庭、朋友、婚姻本身或整个社会。作为男性缺陷理论的坚定拥护者的理查德也曾改变他的立场。他与雪莉的婚姻已经恶化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他说：“我要摆脱。我无法再他妈的接受她了。我从骨子里厌恶她。”

一位年长些的男人详细回忆了他的婚姻是如何结束的：

---

① 一个人一方面没有必要成为一个内心活动过程的专家，认识到罪恶感的滚雪球效应；另一方面没有必要成为一个减轻罪恶感的自我评判行为专家。这两种行为互哺。一个人开始于“错误的”行为，因为有了罪恶感，事后试图去创造一种条件为原初行为开脱，进而会又一次觉得罪恶累累，如此往复。

② 理查德在不同时期不断重复这种观点，每次都十足地煞有其事。这是个有感染力的观点。如果汽车的解决方案确实赋予婚姻以稳定性，那么其他事情将会等值于——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婚姻将会比低收入、无财产者的婚姻有更多生存的可能性。但是，最多情况下，这是一个高度有争议的观点。当理查德几个星期后竭力获得了一辆汽车后，他与雪莉婚姻的恶化明显加剧了。

> 我和我的妻子是在 1940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五的晚上分手的。我一下班回到家,她就开始不停地向我唠叨。她说房东向她要房租了,保险人也等着收保险费。我已经很不耐烦那些唠叨了。我说我还有些钱,明天我上班后,她可以先把保险费付了。我是真的喝醉了,她用指节铜套打我。接下来我就疯狂了,刺了她……①

斯威特的解释也遵循同样的套路:

> 从现在开始,我可以进行各种交往了。这是一个男人最好的状态。我和她在一起 5 年,每天只要我踏进这个房子,我就只能听到她的唠叨。大部分是关于钱的。我已经无法忍受再听那些废话了。

诸如这样的解释似乎比强调男性缺陷的理论更能站得住脚。它们在几点理由上更牢固。首先,这样的解释认为,是丈夫离开的,事实上大多情况下确实如此。第二,在这些解释中,男人不再把婚姻失败之由揽为己有。虽然男人确实责备妻子,却并不借此夸大男人的优点;不管是私底下还是公开的,他们自身都没有得到任何实质好处。第三,与诉之于男性缺陷理论不一样,这些解释与女人看待这些事情的方式是一致的。双方都同意是男人放弃了婚姻,在婚姻关系的压力下放弃的。对男人而言,这种压力产生于妻子对自己丈夫身份的期望。但重要的一点,他回避了她"为什么"会有唠叨行为以及"如何"抱怨这两个事实。他不否认她所期望的合理性,但反对她们一再重复和死死咬住一成不变的问题不放。"我从骨子里讨厌!"的话语和唠叨行为提供了妻子在自己和孩子身上对男人的合理期

① 我认为,这段引文和其他地方提到夫妻间的暴力事件一起完全支持了这个富有洞察力的观察:"鸡毛蒜皮的事常常是婚姻解体的前奏曲,而不是制定出权力平衡的基础。"(Blood and Wolfe, 1960:12)因此,街角的丈夫和他们妻子之间普遍存在的暴力,与其说是街角夫妻关系的"风格"或"典型特征",不如说是街角男人的产品,他们从事的是一项终归要失败的事业。

望不能实现的鲜活表达。似乎他发现这点难以忍受，因为妻子未实现的期望始终提醒自己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是失败的。

前面的引文清晰地指出了钱在妻子期望中的重要性。要付房租、买食品杂货、支付其他必备的物品和服务，这些都是做一个好丈夫的必要条件。当然，还有几个可供选择的经济支持来源——妻子自己、亲戚朋友，或公共、私人机构——但它首先是一个（好）丈夫的责任，而不是其他人的。①

经济支持的首要原则来自两个在分析上独立的价值源头：支撑和维持妻子儿女生活的简单使用价值本身；与提供这种支撑相连的表意和象征价值。② 男人和女人均认为提供经济支撑的重要性不限于它的使用价值。一个男人正在和其他几个人聊天，诋毁着某个他不很喜欢的人。"但是有件事你得说，"他承认，"当他和她住在一起时，他确实（stone）照顾了她和孩子们。"

养活妻子儿女这件简单的事本身就规定了丈夫的基本义务。但养活妻子儿女负载的表意价值，提升了丈夫的男子气

---

① 提供经济支持与丈夫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经济支持一度被认为是确定性关系和亲属角色两个亟需考虑的方面之一。沙琳怀孕了，但她和乐华还没结婚。贝弗莉是个女同性恋者，其时与沙琳的母亲玛尔维娜住在一起。当乐华和贝弗莉激烈争论时，他们互相诅咒，乐华甚至还拿出了刀子。贝弗莉愤怒了，她指着乐华说他应当更加尊敬她，因为她，贝弗莉，是他的岳继父大人（stepfather-in-law）！她的理由依赖于两个不更的事实：她与玛尔维娜睡在一起并养活她。

贝弗莉应当适可而止。乐华愿意认可她的论点中的某些可取之处，但是贝弗莉声称她甚至比乐华更像一个男人，这就太过分了。第二天笑谈此事时，乐华回忆接下来发生的事："我说，'如果你比我更像一个男人，拔出你的活儿把它放在栏杆上。'我拿出我的搁在栏杆上时，这时她说'我没有那么恶俗，我不是以那样的方式来表达爱意的。'"

② 多项关于下层人口的研究表明：对男人而言，自尊心、地位、自豪感等，是与其养活一个家的能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男人的角色是经济上的，他在家庭中的地位是紧密依赖于他养家糊口的能力：他的自尊心是与他的经济独立性紧紧相连的。"（Klein，1965：164）"一个男人……若是不具备养家糊口的能力……他自己、妻子和孩子以及朋友们，对他的期望都会有个落差。"（Robb，1954：48）"黑人男子……不能提供经济支持，这是美国社会中公认的男人的基本能力。结果是，女人成了家庭的主管，男人则成了边缘的附属物，他们舍弃妻子或被妻子拒绝……"（Gans，1965：48）。

概。他作为妻子儿女生活的供养者,已作出很大努力来履行对家人的义务。酗酒、赌博、看其他女人,本身可能会有损他的表现,但不能完全否定之。不管作为丈夫还是作为父亲,他已为自己能像个男人做出了很大努力。

然而,很少有已婚男人能实际做到在很长时间内都能养活一家人。钱一直都很紧缺,也是家庭长久以来冲突的起源。对妻子而言,她自己和孩子们的经济支持始终是主要的未实现的期望。而且,这样的供养在丈夫看来已经很齐备和充足了,尽管妻子连这些都很少能得到,却渴望更多,非常多。

她渴望他能做她准则下的男人,她需求下的丈夫和父亲。他为她和孩子提供生活所需的钱,然后就离开家直到下一个发薪水的日子再来和他们在一起,仅仅这些是不够的。她渴望以他作为全职家庭成员加入她们,参与她们的事务,对她和孩子的行为以及他们自身的发展感兴趣。她渴望他以最大的忠诚表现在对她和孩子们身上,她渴望这种忠诚家喻户晓。她渴望一家人能结成联合阵线来面对外在世界。

也许最重要的是,她渴望他成为*一家之主*,不仅仅是提起兴趣或表现出关心,而是承担起责任并能作决定。她渴望他能主持大局、能"当家作主",能制定出每日生活的规则并执行它。她渴望他能照顾她们并成为她能依赖的人。唉,她以孤单的状态告终。或许更糟,她还得把他养起来。

带着由经验而生的辛酸,雪莉苦笑着说:

> 我过去总是依赖理查德。比如我生孩子时,我依赖他,但他不在那儿,我摔倒了……现在,我不再依赖他了,我假装依赖,但没有。

雪莉并不总是轻言放弃、安静地屈从。像罗蕾娜和其他女人一样,她也力图以哄骗、嘲讽、羞辱、鼓励、威胁或其他方式使她的男人成为男人。罗蕾娜说,刚结婚时,她曾常祈求上帝,"让约翰成为一位好丈夫和好父亲吧!"后来,她意识到"那不是上帝的工作,而是我的工作。"她的祷告也跟着发生了变化:

“主啊，我是罗蕾娜·帕特森，你了解我的一切，你知道我需要什么。”

于是罗蕾娜把塑造约翰成为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当作自己的工作，但是这不管用。她为婚姻的失败而自责，同时也责怪约翰。她说，约翰只是个男孩，不是男人。他做不了主。

我希望男人能挑起大梁，但是约翰让我挑。他的肩膀嫩，我的肩膀弱，但还是我在挑大梁。

罗蕾娜孤注一掷地让约翰表现为家中的男人，却以悲惨结局告终，留给她的是说不出的各种感觉：蔑视、愤慨、遗憾和挫败感。

我们结婚后，我常找茬儿，看他能容忍到什么程度。有一次，我让他吻我的屁眼儿。他撕破了我的唇，我不敢出门，直到伤口愈合。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不管我做什么，他什么也不干，于是我又试了一次。我喊他“狗娘养的”。他的家人曾说过这是最能激怒约翰的话。他们说他不能忍受任何人说关于他母亲的话。于是我喊他“狗娘养的”。你知道他做什么了吗？他坐在一把椅子上，哭了起来。他只是坐下来哭！

在回应这种测试和挑战时，男人有时会扇妻子耳光或把拳头塞进她嘴里。此种行为对妻子来说却是个不错的结果，丈夫们为此感到惊讶。他不理解，或不承认理解，女人的动机，可能将其归咎于潜伏在女人身上某种说不清的受虐冲动。比如说，乐华正打算离开街角。他说他要回家看看“嘴巴”（指沙琳）想要什么。他说，她可能想要鞭打；她似乎会求他打她。然后，她“温顺得像个婴儿，尽其所能地甜美起来”。

接着他又说，前一天，沙琳如何用扫帚把打他，激他打她耳光，但他只是走了出去，因为他知道这比鞭笞更加伤害她。毫无疑问，确实如此。对沙琳来说，像罗蕾娜一样，渴求一些有形

的证据,来证明她的丈夫很在意她,很在意他们作为一家人,证明他愿意为了建立和保护他(名义上的)一家之主的地位而奋斗。她公开表示嫉妒雪莉,因为当一切对雪莉和理查德来说还能接受之时,雪莉津津乐道地向沙琳、罗蕾娜以及其他女人炫耀说是理查德在摆布自己,坚持让她远离街角,并且制定规则,让她每天早起,给孩子们穿衣打扮,清扫房间。为了这种证据,沙琳乐意付出被扇耳光和被摆布的代价。然而,大多数情况下,乐华拒绝接受挑战,或者接受,像约翰一样,因自惭而流下羞愧、无助和挫败的眼泪。

与乐华、沙琳在一起住了几个月后,理查德和雪莉就是他们家庭争吵含泪结局经常的见证者,更多是无意中听到。理查德是瞧不起乐华的。从来没人见过理查德哭。乐华一定很"软弱"或很"无能",以至于雪莉能让他哭成那副德性。对理查德自己来说,他承认也哭过,但总是在"内心里"哭。

因此,婚姻是一个失败之地。维持婚姻意味着与失败同在,意味着天天要面对。意味着生活在一个男子气概的标准永远够不着的世界里,在那里一个人会不断地被测试和挑战,不断地被发现不够格。为了自我防卫,男人退到街角。在这里,量度的标准降低了很多,弱点不知怎么地颠倒过来,几乎神奇地转变为优点,他可以又一次成为男人中的一员了。

第5章 情人与剥夺者

男人和女人认为他们自身和他人都是些玩世不恭、自私自利的掠夺者,他们总是把对方当作利用的对象或能带来收入的对象进行不断地剥夺。① 有时,这种动机只归咎于女人们:“[与街角男人厮混在一起的]那些女孩儿们,她们要的是钱,而不是浪漫。”但在更多的情况下,男人更愿意视自己为剥夺者,女人为被剥夺者,如依照财富、赚钱能力来衡量一个女人是否合意,评价某个女人还不错是因为她有份工作。在一次聚会上,泰利满怀期盼地等着杰西的到来。“她不是很迷人,”②他说,“但有份漂亮的工作。”

在外卖店外闲逛时,乐华向站在弹球机边上的男人们吹嘘

---

① 这种剥夺在伦敦的下层人口居住区也存在,在那里,“‘爱恋关系’中也包含一种不容忽视的剥夺成分,最起码从男人这方来说是存在的……男孩们可能公然地表现出剥夺的一面,不仅体现在女孩允许的性交往上,而且在经济上,他也能从女方那儿获得一定利益。”(Klein,1965:39)。

② 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女人与白种女人越接近,就被认为越具有吸引力,在这点上,男人与女人的看法是一致的。“秀发”(good hair)(长而柔软)和浅色肤质是评价女人的主要标准。“秀发”一般来说仅指头上的毛发,但实际上,也有一些男人表示更喜欢脸颊上有绒毛或腿毛长的女人。比如讲,有个男人在解释为何一个女人对他来说有很强吸引力时谈到,不是因为别的,而仅仅是因为“她整个胸部上上下下都长满了软毛。”但同时,一个浅色肤质的女人,虽然毋庸置疑地比她深色肤质的姐妹更具有吸引力,但她却总是男人远远避开的对象,除了有个别男人找她搭个伴,但也只是几个小时或一个晚上的事。可能除了海猫外,男人一律嫌弃那些比街角放眼能望到的女人肤色要明显浅很多的女人。对此的解释是简单而明了的:“一个浅肤色女人迟早都会和你作对的。”(注文未完,见下页)

他最近遇到的那个女孩。她在一家自助餐厅工作，离他当侍者的旅店很近。他说，每逢他们约会时，花的都是女孩的钱。

“她刚刚又找了份政府部门的工作，”乐华说，“她不可能哪天不上班，她就像头骡子般勤劳。”

“天啦，谁想和骡子在一起啊？”我问道。

“伙计，能与骡子在一起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乐华说，“一旦有人为你拉起那辆马车，你才能真正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说完这话，他转向隆尼，问他是否同意这点。隆尼认可了他所说的。

和乐华一样，斯威特同样以一个剥夺者的姿态来展现自己。他夸耀地说自己除了在外卖店附近有个寓所外，在城市另一个区还有个“窝”，而这两个住处都不用他付房租。“伙计，到哪儿都不用我交房租，自有我那些女朋友们来付。”接着，在选择是否继续与一位已有两个孩子的女人生活在一起时，他大声道出了其中的利弊。“她真的不错——干两份工作。”他说到，并认为这个优点足以弥补她有两个孩子的缺陷。

男人们不仅热衷于在男人面前急切展现自己剥夺者的姿

---

② 在说到这个话题时，斯威特的情绪很激动。他谈到和他刚分手的那个女人，他说虽然他们在一起已经住了几个星期了，但他从来不把她当成自己的女人，就因为她是个“浅色肤质女孩”。他甚至因为这点都不曾喜欢过她。一天，正如他预料中的一样，她和他对着干并骂他一些“羞辱性的称呼”（就是“黑鬼”，“黑东西”和其他有关肤色的蔑称）。“我把拳头堵进她嘴里。现在，她和我的一个朋友住到了一起，他说她还可以。那是因为他不知道她是如何与我作对并骂我那么多羞辱性的称呼。他迟早会知道这点的。她们，只要发起疯来，骂的全是脏话。而且她们总是时不时地发发疯。”

其他人大体上都同意斯威特的说法，但有些人承认也存在例外情况。我和泰利、理查德刚从一个小酒馆出来，我说了句，刚才伺候我们的服务员长得还挺好看的。泰利说：“确实还可以，但她的肤色对我来说太浅了。”我就问是不是所有浅肤色女人都会和男人作对。

“呃，可能也不是全部，但十之八九会这样。你一旦和她们起了争执，她们就开始骂骂咧咧，骂你各种各样的坏话，接下来，你首先知道的就是你会在警察局出现了。弗洛拉[一个典型的深肤色女人]，弗洛拉就是我喜欢的女孩类型。”

“是的，”理查德说，“即使你和弗洛拉那样的女人闹得不愉快，她仅仅是抱住她自己的理由不放。”（那就是说，因为弗洛拉皮肤是深色的，吵架中，她不可能转向有关肤色方面的污蔑，而只是坚持她现有的理由和借口。）

态，在女人面前也同样如此。只要女人在场，一定程度上会激励男人把自己作为剥夺者的一面描述得更加淋漓尽致。下面的[录音记录]对话发生在理查德的房间里，参与人员有韦斯利、理查德以及理查德22岁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妹妹西尔玛，她刚好从纽约过来看望理查德。

韦斯利：从现在开始，如果女孩没有钱和小汽车的话，我连话都不和她说。

西尔玛：这样的话，那样的女孩，你根本找不到几个。

韦斯利：我隔壁的那个家伙，他就找到了一个。她有辆58年的水星（Mercury），我听说她还有一大笔钱。

西尔玛：她多大了？

韦斯利：我不知道她多大，但我确信她有辆水星停在门前。

理查德：哪怕她60岁呢，只要她给我那些钱，并让我开那辆新车。①

韦斯利：（十分赞同道）伙计，瞧你说的！

西尔玛：但你就不觉得难为情吗？——当别人看到你和这么大岁数的女人在一起时？

韦斯利：确实，我有段时间也觉得难以接受。有个女人，大概45岁，有套自己的房子，有一辆60年白色的卡迪拉克。除此外，她还有家餐馆。她努力接近我。她还告诉

---

① 在评定一个女人是否能成为性伴侣时，在较宽的范围内，年龄长幼并不成为关键因素。大体上来说，性伴侣多存在于同龄人中，但这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样一个男人，可能与一个正值十五六岁的女孩一见钟情，也可能对一个四十五六岁的女人情有独钟。以泰利的例子为证，他的一个孩子的母亲是个十几岁的女孩，而另一个孩子的母亲四十来岁，已做了祖母。反过来，也会见到二十来岁的男人和四十多岁的男人同时在竞争一个比如说是二十至三十岁的女人。但关于这点，个体与个体间的态度以及相应行为有很大的差异性。泰利认为“通常情况下，男人会喜欢一个老一点的家伙”（比自己年纪大的女人），并且他也确实这样做了。相反，理查德，尽管他说过“哪怕她六十岁呢”，可一旦“遇到”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他立马就把六十岁女人的汽车所带来的愉悦感抛向脑后，因为“她太老了，我还是喜欢嫩肉。”

我的房东，叫房东转告我给她打电话，我没打。可这些放到现在来说，让她回来！我将会告诉房东："只要她一出现，马上打电话给韦斯利。"我那时太蠢了，那么多的钱啊！天，够我花很久了！我可以肆无忌惮地花，那么多的钱啊，还可以开着一辆大卡迪拉克，带着别的女人四处兜风了。

西尔玛：她会牢牢盯住你的，你也甭想带着别的女人去兜风。

韦斯利：嘿，怎么可能，我比她机灵多了。她还有个女儿呢，大概 19 岁吧，我还将拥有她女儿，那样的话，我活得简直太滋润了！

男人不仅乐于展现自己对女人经济剥夺的一面，而且期望别的男人也这样去做。一旦其他男人的行为不符合这些期望时，他们则表示出无法理解这些行为。

我和泰利坐在外卖店里，我告诉泰利，海猫说他打算把过去 7 个月以来一直和他住在一起的女人赶走。泰利起初难以相信，继而对此迷惑不解。

海猫只是说说而已吧，他不会赶走她的。手中一鸟，胜似空中两百万……我不懂海猫。他有大把的女孩可挑，他对好女孩态度很糟糕，对一般的反而很好。现在他身边的那个女孩，真的不错，还每天都上班……

在街角，和三个男人闲聊时，海猫也很不满这样的事——并不是所有男人都在剥夺女人，有些男人（他停下来骂他们）也在女人身上花钱，这样做其实是"宠坏了属于我们的这些女人"。甚至，还有些女人认为去俱乐部花个 20 来块钱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样的想法让他很生气。

该死！如果那 20 块钱给我，我可以买足够的啤酒和烈性酒供她们喝，还能省下 10 来块钱。但她们，不可能知道这其中的差别。

男人视自己为女人的使用者,不仅把女人作为带来收入的对象,还作为性交往的对象。[1] 就"女阴"而言,男人应当"有所得时即享其所得"。泰利很诚恳地告诉大家他与女人交往时的箴言:"1962 年的一切都要换新的。"同样,海猫原本打算在一个周五的聚会上能结识几个新女人,但没能如愿以偿,他很恼火。错失良机的情绪直到第二天还折磨着他。"我应该成功的",他重复着,懊恼地搓着手,"我知道我应该成功的"。随着几个男人在街角的出现,海猫暗暗下定决心将公开纠正自己所犯的过失。

> 我今晚打算还去舞会看看,我不知道也不关心谁将去那儿。我要做的是,接下来的 24 小时内,至少要搞定四个女人。

就像这样,男人总是在说自己是女人的剥夺者和使用者。但光说说是不费什么代价的,实际上,在落实到与某个具体女人的真实关系时,男人们所做的与他们所说的往往背道而驰。对男女双方来说,与喜欢或其他调和性的冲动毫不相干的赤裸裸的剥夺充其量只是一时之事。这种表达最常以一种期望某人如何行事的上下颠倒的理想陈述的面目出现,用于口头的公

---

① 对女人的性剥夺并不是通常所说的性行为。总体上来说,街角男人异性性行为与所观察的是一致的:"[下层社会]的禁忌大多情况下反对……任何非基本和不正常的性交行为……非此类性行为是不允许的……"(Kinsey, Promeroy, and Martin, 1953: 305)。例如,肛交和口交被认为是属于同性恋群体特有的性交方式。日常生活中,甚至用来指称和描绘"舔阴(cunnilinguism)"的词语都很少用到,而这个词,在军人和工人阶级男性中普遍使用,通常是作为侮辱性的表达或用在无所顾忌的玩笑中。显然,那些行为都背离了异性恋的规则,这在下面一个涉及此问题的谈话中明显地表现出来。我们几个人站在走廊里喝着酒,听到从楼上传来一个男人和女人的争吵声,于是,话题就转向了男女间的暴力行为。斯坦顿给我们讲了个故事,一个一直以来受到丈夫虐待的女人的故事,这个丈夫睡觉时总在枕头下放把枪。一天晚上,丈夫喝醉了,强迫他妻子表演一段"变态"行为。当他睡着之后,妻子从厨房里拿出了一把双刃斧头,在他头上方举了起来,闭眼向他的前额砍去。她尖叫着跑了出去,把她的遭遇讲给城里人听。她从未被审判,斯坦顿说,结束了故事:"他们都没抓她到法庭上。"唐克、波利和其他人都认为这样的结局才是公正的。

共构造。单个的男人和女人被迫定期认可这种公共构造，否则他们就会遭到嘲笑或作为一个“无能者”（懦夫、笨蛋、傻瓜）被踢出队伍。

至于“有所得时即享其所得”这个说法，还有泰利的“1962年的一切都要换新的”、乐华的“能与骡子在一起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海猫所宣称的要在24小时内“搞定四个女人”[任何四个女人]，以上这些观点，公开表达了对男人是女人不可妥协的剥夺者这一公共构造和迷思的支持。

然而，在实际行动中，把女人作为经济剥夺和性剥夺对象的冲动，因为一些可以相互抵消的冲动和目的产生了偏转，尤指那些在两情相悦基础上建立私密关系的欲望。正是这些相互对立的冲动，解释了，至少是部分解释了，男人对女人言行上的不一致。

男人和女人都得去应付这些相互冲突的动机和目的。这里有个例子，卡罗尔，18岁，她以剥夺者自居，严厉地谴责了她16岁的朋友莉娜，因为莉娜把“喜欢”作为性事和收男人钱的前提。卡罗尔和莉娜都是未婚妈妈，都和孩子们住在一起。这场谈话发生在她们房前的台阶上。其时，她们刚刚被赶出来，所有财物都已打好包，搁在我们前面的人行道上。我问莉娜她有没有接受ADC（对贫困补助计划）的帮助。她说没有，也不打算接受任何这样的援助。她说，一旦接受了ADC，就无法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①]“你就不能再有任何男朋友，以及其他东西。我也是如此疼爱我的孩子们。”

“那好吧，既然你疼你的孩子们，那你最好也要学会喜欢那些钱。”卡罗尔说。

卡罗尔转向我，“你知道有天她做什么了吗？”她说，对莉娜轻蔑地扬了扬头，“有个男人要给她20美元和她玩玩，她拒绝

① 参考华盛顿的“屋内有男人”的准则，这条准则规定，只要家里有在职的成年男性，女人就不能接爱ADC援助。这项奇怪的家长式规定由特殊调查员强迫实施。这些调查员日日夜夜、时时刻刻皆有可能出现，出其不意地搜寻“屋内有男人”的证据。结果是，作假者将被剔除出援助计划。也就是说，尽管妈妈们已经过福利部门的审核，但只要她们还继续寻求爱或性的话，孩子就不配获得援助。

得很干净。”

“我只是不喜欢他！”莉娜说。

“喜欢？狗屁。”卡罗尔打断她的话，“我倒希望他找的是我，兜里也揣着20美元。”

像卡罗尔一样，男人们表示他们是强硬的剥夺者；像莉娜一样，他们并不是总能“有所得时即享其所得”。他们有时会拒绝唾手可得的女人，有时又会主动结束自己能获得经济利益的关系。乐华结束了与路易丝（那头能拉动四轮马车的骡子）的关系，又一次回到沙琳身边，大家一致认为她没有路易丝迷人，并且不仅不能供养乐华，反而完全依赖他而过活。向来以金钱来衡量女人的泰利表示不理解海猫何以会赶走一个成天工作的女人，但现在，他自己与女人的经济剥夺关系不比海猫好到哪儿去。艾玛·卢已和泰利在一起住了几个星期，并想继续和他在一起，但泰利想让她走。艾玛·卢把自己的周薪（大约45美元）全部给他，但泰利拒绝了，并强迫她很快搬出去，尽管那时他也没有其他固定的女人。①

海猫是公认的男女关系中最成功的情人和经营者，然而正是在海猫与女人们的关系中，公众所认为的男人是女人玩世不恭的使用者的看法在私人化关系面前不攻自破。萨利，21岁，住在海猫公寓的楼上；露拉，18岁左右，住在街对面，经常拜访海猫的住处。显然，这两个人对他来说都是唾手可得，但他总是扫她们的兴：萨利，她话太多，捉摸不透；露拉，他担心无法与她保持一种临时的关系，怕她会“完全支配自己”。至于身边亲近朋友的妻子及女友都不在他合理的性目标范围之内。比如，海猫曾和桃瑞丝约会了几次，但后来她与他的一个朋友（街角的一个男人）结婚了，这改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海猫承认自己仍然迷恋她，但却一直离她远远的，直到得知一年后她已与丈夫断绝了关系，才与她重新开始。同样，当女孩和他的朋友亚瑟一起出去时，只要让亚瑟知道她喜欢的人是海猫，亚瑟立马就会谨慎地和她保持一段距离。

---

① 参看本书第99页之后关于泰利和艾玛·卢的更多细节描述。

海猫自我克制的能力在他与琳达的关系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整件事如果从根本上来说是出于自私的性的驱使，那么即使功亏一篑，他也毫无怨言。四月份时，海猫遇到并喜欢上琳达，一个 25 岁的女侍者。她住在非中心区，他们认识两个星期后，她下班后（凌晨两点）来他的住处过夜。

"我们说会儿话，接着就上床睡觉。"海猫说。他说他们裸睡，很小心，从不去碰对方。他解释到：她曾与一个男人有过一段不好的经历（他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①]），她因此对男人有恐惧的心理，对他也一样。他又补充道，"但她正学着不害怕我。"

他们以这种方式度过四个晚上，有时在上班前她也顺便聊几句，海猫坚持不吻她、不碰她的身体，因为"我喜欢她，我不想破坏现状"。他能感觉到自己在慢慢赢得她的信任，"很快，她就会真正来到我身边了。"然而，两个星期后，下班后她不再过来与他同睡。他们没发生过任何性接触，海猫认为他们也不会再发生了，但他们仍是"好朋友"。

然而，这并不是说，男人是女人的剥夺者和使用者这一看法就能借此减弱。有能力赚到钱的穷人，赚到时就不再那么贫穷了。在这个以性征服来作为证明男人气概几种途径之一的世界里，男人如果没有充分利用他与女人之间关系的资本，他就不再那么像个男人了。

如果把形形色色的男女关系视为剥夺欲望和建立爱慕关系欲望这两方面的调适，那么两种基本的调适模式就突显了出来：理想模式和现实模式。在理想模式中（现实中很少实现），

---

① 谈论性行为和性行为本身都是谨慎而保守的。通常情况下，在一般的谈话中，常常用那些简短直接的话语来自由随意地指称交媾以及生殖器。但是，一旦话题谈到性，并且具体到某人自身或其性伴侣时，语言就变得不再那么直言不讳了，而使用"我昨晚确实打炮了（lay some pipe）"这样描绘性的话语来代替那些更明确、更直接的表示性交的词汇。大多数情境下，当近距离看待性行为时，大家都会一致转过头去，仿佛那是美杜莎（Medusa，希腊神话中长有蛇发令人恐怖的女妖——译者注）的头，不能直视。对于性行为，在幽默或猥亵的话中用某种标准的制度化语言去表达是少见的或见不到的。下流玩笑是少见的，色情图片显然不存在。

只有一套冲动——不管是剥夺的还是非剥夺——在任一特定关系中发挥作用。在第二种模式即现实模式中，两套冲动在任一特定关系中都发挥作用。

在理想模式中，男人把他世界里的女人分成两个独立部分："好"①和"不好"。一部分是专门用来剥夺的，另一部分则预备给予更多的关爱。海猫作了这种区分并宣称依此行动，在以下事例中可以看出。

海猫正准备换衣服外出。我蓦地坐到他的床上，等着他穿好，这时一包避孕套从床垫底下掉出来。我把它放回去，发现一打儿或更多这样的包。我问海猫他是否每次都用。他说，不，有时用，有时不用。

> 这要看这个女孩儿。如果是好女孩儿，那种我不介意付出的女孩儿，那么我就不用。但如果不是好女孩儿，我

---

① 尽管"好"也许是女人最令人想望的品质，但这种品质难以明确定义，不同的男人有不同的定义。当我们说一个女人好，在某种情境下，可以特指她的性感或其他某种特定属性，如有份好工作或其他收入。然而，在更多情况下，当男人说"她确实很好"时，他的意思是从整体上来肯定这个女人，"好"成了一种对女人人格、道德、社会和审美上的品质的综合评判。

当然，对谁好谁不好没有绝对的共识，即使同一个男人的观点，也会随着他对某个女人的了解以及与之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然而，一些宽泛的相对客观的标准是得到大多数男人认可的。女人的打扮和生活习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女人不会衣衫褴褛，不会邋里邋遢、不修边幅。她的身体，她的孩子，如果有的话，以及她居住的房间会按时清洁，保持干净。她尽职尽责地赚取工资或操持家务，或两者都做，完全不能像那样的女人：整天穿着便服闲逛，床没整理，孩子澡没洗头没梳，等着她的男人把钱带回家，或等着邮差把福利支票带来。

她在道德上是诚实而得体的。她不会当着你的面一套，背后又一套。她没有混乱的性关系，当她可能没必要再完全忠诚于她的丈夫或男朋友时，她慎重地与他断绝关系，通常这只是在被激怒后才发生，如遭到虐待或男方不断地公开做出不忠贞的事来。诚实有时也仅指钱财上的诚实。她不偷。

在一个好女人的社会关系中，她展示出她的慷慨大方的一面。她是友善、可亲近、宽容、开朗和随和的女人。重要的是，不管她的为人处世方式和风格如何，人们都很乐于和她在一起。

不会冒任何险。①

正是这样，把女人分成两种明显不同类型，其中一种仅仅被用来剥夺，另一种允许男人公开、自由地与之在喜欢和爱的基础上建立令人更加满意的互让关系。一边对剥夺（准确地说，是正在剥夺）萨利和艾琳的事直言不讳，一边还很自由地表达对玛丽的喜爱之情，但这丝毫没有损害哈利的自我形象，也没有就此被别人认为是一个恶棍和玩世不恭者。就像这样，假装浪漫的爱情在街角世界是正常的，它还被借以作为衡量男人的标准，衡量男人任何时候都能从女人那得到他想得到的意愿和能力。因此，乐华通过宣称“能与骡子在一起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宣称他们约会时一切花销由路易丝担负，等等，来表明他对剥夺迷思的公开支持。同时，他自由地享受着与沙琳的爱情，而不必担心会遭非议。

实际上，宣称浪漫爱情是大多数男女关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尤其当这种关系处于紧张状态时，比如争吵后，或在其关系早期、热情持续高涨的成长阶段。这里有一封乐华给沙琳的信，大约写于他们在外卖店初次遇见的两星期后：

> 甜心，再多的空闲时间和机遇带给我的满足，也不比拥有此刻给你写信的时光，我时刻挂念着你。也许，有人会因为你的美丽而与你在一起，而深深打动我心的却是你的智慧，以及天生的气质。这些都让我如此喜欢。与你在一起的这些日子，是如此的美妙而盛大。这就是为什么我敢说我对你的爱，是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最伟大的爱。带

---

① 从中产阶级的观点来说，男人应该去保护“好的”女孩，降低她受孕的可能性，而让“不好的”女孩靠她自己的运气。在这种态度背后，隐藏着中产阶级对“不好的”女孩（下层社会？）的轻视，即使她们怀孕了，也只是由她们自行了断。在海猫的道德准则里顺序有点不同。对任一他使之怀孕的女人，他承认做出付出的责任，与此同时，他采取避孕措施，避免与“不好的”女孩建立进一步的需付出的关系。与“好的”女孩，不用如此迫切地采用避孕措施，因为他不太反感与她把关系进行下去，他会承担受孕之责。

着这份爱，我让这封信去轻轻地打扰你一下。那么，我将永远记着甜美而迷人的沙琳，直到邮递员再次敲门。爱你的乐华·艾伦·布朗。

十天后，在一次争吵之后，他又写了封充满着悲伤和自责的信。

……虽然我们认识才几个月[实际上才几个星期，而不是几个月]，但在这几个月里，和你在一起的日子，将会留给我一份永远精彩和美妙的回忆……我想乞求你的宽恕……我知道你会爱上别人，祝福你们，愿你俩都能幸福。当你在我身边时，我没有好好待你。所以，现在，我就像一个孤独的国王，失去了一切，孤独地站在我的王位上……我将会永远记得你，沙琳。爱你的无名先生。

乐华是街角年轻人中最有文化的一个，但华丽的爱情宣言并不仅仅限于年轻的、会甜言蜜语的人中。斯坦顿，年纪比乐华大一倍，是个文盲。他爱上了伯妮斯，按照传统的矜持而典雅的示爱方式来表达他的情感，声明永远不会把她当作剥夺的对象，他以维护她的名誉和安全为荣。他公开表示对她的爱，并宣誓自己一定会“好好对她”，这其中也包括其他事宜，诸如心甘情愿地给予她一切东西，即使他们最后会结束关系。

斯坦顿说，伯妮斯正打算离开爱德华。前天，爱德华和伯妮斯打了一架，爱德华就要回了他送给伯妮斯的手表。斯坦顿说，爱德华这样做太蠢了，他连如何对待伯妮斯都不知道。

她已不打算和他继续交往了，她来我这儿并和我住在一起。作为男人，我确实很爱那个女人！我会好好对她的。如果我送她什么东西，就是她的了，我决不会再要回来。

这种把男女关系做出剥夺的和非剥夺的清晰划分的理想

模式是一种愿望，而非事实。现实中能做出这种清晰划分的只是例外，因为很难总是保持一种特定关系不越过分界线。结果是，大多数的男女关系处于第二种模式中，在这种模式中，在同一关系中（如在乐华和路易丝、沙琳的关系中，以及在斯坦顿和伯妮斯的关系中）剥夺和非剥夺（如“喜欢”）的动机都在起作用。并且在第二种模式中，男人对他们之间关系有着混杂的感情。他对女人的态度和行为往往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甚至与刚开始时截然相反，因为眼前是另一动机占据了主导位置。海猫和格洛里亚之间的关系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海猫与格洛里亚的关系早就是众所周知的事。街角的男人们，像希腊悲剧中的合唱团一样共同关注着他们关系的发展，对他们的关系进行分析和品头论足。他们看见（或者说得仿佛看见了一样）海猫和格洛里亚两个人，既是对方的使用者又被对方使用。每个街角男人都在猎寻一件好东西，找到了，到最后却又不可避免地失去它。海猫也是这群男人中的一员。他很小心地维护着自己和格洛里亚的形象。

1962 年 7 月，海猫在马里兰附近的一个休闲娱乐中心遇到了格洛里亚。格洛里亚喜欢上了海猫，于是他们开始约会。格洛里亚 25 岁，小个子，敦实实的，面色喜人。她是个寡妇，丈夫前年去世了，格洛里亚是他的人寿保险受益人。她还继承了他几家不大但盈利的商贸企业的一半股份。她有两辆汽车，在马里兰有栋海边小别墅。

他们初次遇到后的两个星期，海猫和格洛里亚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他们一起参加了几个聚会，并在她的海边小别墅里度了个周末。格洛里亚把博纳维尔（Bonneville）敞篷汽车给海猫使用。海猫表示他已“胜算了”——街角所有男人都同意这个说法，但他也不否认格洛里亚在他们之间占主导地位。他解释说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他来说“是件大事”，无论如何他都不想这种关系受到损害，于是他把所有主动权都交给了她。

夏季慢慢过去了，海猫和格洛里亚在一起更亲近了，他在街角出现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有一次，格洛里亚与海猫一

起来到外卖店，还有一次（也许两次）斯坦顿（也许另外一个男人）与他们一起去了她家（也许去了海边小别墅）。但是，大体上而言，海猫已被带入她的社交圈，和外卖店只保持着零星的联系。

年末的时候，海猫搬进了一个不太大但全新的公寓，与外卖店大概相隔五个街区。格洛里亚配备了家具并付了房租。第二年二月份，海猫最大的孩子夭折了。他妻子和孩子们已经搬到了底特律与她的父母住在一起，于是格洛里亚又给海猫钱去那里，并赞助了孩子葬礼的费用。

在街角少有的一次露面时，海猫说，一切还好。但是三四月份时，有传言说他“搞砸了”。理查德说他看见海猫和另一个女人在棋盘酒廊（Checkerboard Lounge）。斯坦顿说他听说海猫在与别的女人一起兜风时，撞坏了格洛里亚的车，并且“格洛里亚已烦透了他的借口”。街角男人们摇摇头，有人说海猫无法舍弃其他女人，也有人说他是个十足的傻瓜，让女人在“他和一件好东西间横插一脚”。五月份时，格洛里亚终止了与他的关系，她要回了车，海猫也不得不放弃了公寓和家具。当街角男人们知道这些时，他们耸了耸肩。有人说：“我知道这一切会来的。”有人说：“它迟早会发生的。”

时过不久，星期六的晚上，海猫出现在一个街角男人举行的聚会上。在饮酒和攀朋论友的笑声和喊声中，他的沉默和自我贬损很显眼。他还是开口了，嗓音低而轻：

> 我确实胜算了，但我搞砸了。我搞砸了。我确实很爱那个女人。她给了我她有的一切。我不是指钱。她过去经常说，当一个女人给一个男人身体时，她就给了那个男人女人能给的一切。我真的爱她，她也爱我。

接下来几星期，海猫都无法使自己振作起来。格洛里亚最后终于答应他死皮赖脸再见一面的请求，海猫希望见面时能和解。和解的希望随着海猫，现在这个受伤的单恋情人，扇向格洛里亚的耳光给毁掉了，海猫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在

当时不能，回想起来还是不能。现在，他们之间结束了。每个人都清楚，不管海猫一开始如何不失时机地掌控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以关系的结束告终，海猫所哀痛的损失与其说是金钱上的，不如说是情感上的。他既是一个情人，也是一个使用者，或许更多的是情人。

第6章 朋友与关系网

比起大多数社会世界，街角世界的生活方式和风格也许更受此地居民间面对面交往的构成和特征的影响。在社会的其他领域，个人的大部分精力、兴趣所向和时间都花在自我改善、职业和工作发展或家庭和社区活动、宗教和文化追求上，大而言之在公共社会和政治问题上。而在街角世界，这些资源几乎都用在建立和维护个人关系上了。

在街角，每个男人都有他自己的个人关系网，并且每个关系网都为他界定了个人社群(personal community)①的成员组成。此个人社群，并不是封闭的领域，而是以网状结构来排列男-男关系和男-女关系，在这些关系中，男人以特定的方式有选择性地归属于一定数量的独立人。以同样的方式，社群中的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个人关系网。②

处于此关系网边缘的是那些与他关系比较平淡的人们，比如那些当地居民，当他们在街角相遇时，除了点头问好外，彼此之间一无所知。这些关系仅限于简单的认识。同样处于关系网边缘的还有这样一些人：以前的朋友和熟人、他不喜欢或敬

---

① 我从祖鲁思·亨利那里借来了这个术语。不同的是，我又重新定义了这个词，限定了它的范围(比如，一个男人的个人社群中，排除了他的老板、巡逻的警察，以及一些他寻求资助的本地、州和国家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Henry,1958)。

② “关系网是一个社会构造，在其组成成分中，部分而非全部的外在单元之间相互维持着关系。外在单元无法组成一个更大的社会整体，他们四周没有公共的界限。”(Bott,1957:216-217)。

畏的人、不喜欢或敬畏他的人。这些关系中的人们时常回避对方,但彼此间还是经常碰面并产生联系。

而靠近关系网中心的那些人,都是他很了解且最喜欢的伙伴。他和这些"亲密无间(up tight)"的人在一起:他们是他"散步的伙伴"、好友或密友、女朋友,有时是真的或认的亲戚关系。这些人,他每天或多或少会与之面对面接触,在他危急或需要的时候,他会从他们那儿寻求到及时的帮助、安慰或支持。以朋友的名义,他们互给物品和帮助,表面上从不计较。通常来说,他选中他们,同时也被他们选中。他们像他的同类人那样来满足他的需要,但同时还葆有各具特色、独立的人格,反之亦然,他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朋友们的需要。人生这场戏中,他们既是他的观众,也是他的搭档。

正是与这些男男女女一起,他度过了他醒着的不工作的时间,他们一起喝酒、一起跳舞、从事性事,一起取笑那些所谓的傻瓜或聪明人,又一起在外卖店或街角打发时间,有时什么也不说,有时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从认识论到拳王卡斯·克莱,从薪水数目的意义到他"如何轻而易举地实现这点",如果每星期有 60 美元的固定工作并且不会失业的话。

在街角的日常生活中,这些关系是如此重要,如果没有它们,生活似乎都无法存在。所以,年迈的詹金斯先生才会爬下他的病床,在外卖店可口可乐柜台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不能再像个死人样呆在家里了,"他解释说,"我必须得出来,见见我的朋友们。"

友情有时与亲情紧密相连,有时甚至还可以回溯到久远的童年。在街角世界,从出生时就开始的本土化友谊,比从外来到街角长大的人之间的友谊要更亲密。这样的友谊建立在邻居或同事关系上或是建立在共同经历上,或是某事、某场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把两个人联系在一起。

一般来说,亲密的友情更能在那些已经在关系网中联结起来的人中推广,这些人包括:亲戚、住在该地区的并经常在一起的男男女女们以及同事们。结果就是与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其他人相比,街角男人往往更倾向于反复使用相同的人:将自己

的亲戚变成朋友、邻居和同事，或者把邻居变成朋友、同事和亲戚。看看这些个人关系，一方面是不分彼此的、双向的友谊，另一方面是亲戚、邻居、同事和其他关系。

唐克和珀尔结了婚，在外卖店附近租了套公寓后，珀尔的弟弟波利随后搬来和他们同住。后来，珀尔的侄子 J. R.，也从家乡北卡罗来纳来到这里，并和他们住在一起。就这样，J. R. 加入了街角唐克和珀尔的关系网中。当厄尔告诉唐克他工作的地方有新的工作开展时，唐克就带着 J. R. 一道去了。于是，这三个人，既是亲戚，同在一个屋檐下，又一起在街角出现，并且他们中的两个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同事。

普雷斯顿是克拉伦斯的叔叔。他们住在同一街区内，离外卖店有两个街区。克拉伦斯在建筑工地工作，随后，在同一个地方为普雷斯顿也争取了一份工作。此外，泰利、威·汤姆和布德也在这个建筑工地上工作。这五个人经常一起从工地步行回到街角，一路上同喝一瓶酒。星期五的下午，回到街角后，他们会在一起继续喝一个小时左右的酒。泰利把其他四个人称为自己的“酒伴儿”。

泰利是在工作中遇到了威·汤姆。通过泰利，威·汤姆加入他们步行回家的队伍，并开始在外卖店附近逗留，最后干脆搬到了附近做了邻居。布德是最后一个加入这个建筑工地的。他很早就认识了普雷斯顿和克拉伦斯，但不是很熟。他认识泰利时他们仅仅是邻居，后来泰利去拜访和他住在一起的女人（布德事实上的妻子）和女人的孩子，这样，他们成了好朋友。当泰利带着布德一起到工地上工作后，布德也成了泰利的同事和酒伴儿。因此，在泰利的关系网中，威·汤姆开始只是个同事，渐渐成了酒伴儿、邻居，最后成了亲密朋友。布德从邻居到朋友最后成为同事。重要的是，即使不考虑此间关系发展的方向，同事关系以及邻居关系（尤其是后者），与朋友关系的融合，进一步加深了朋友间的亲密关系。

这些重叠关系最显著的一面，是把亲属关系当作朋友关系的模范。在街角，大多数男女之间彼此毫无关联，只有几个在紧邻区域内有亲戚。然而，为了解释、说明朋友关系，甚至为了使朋友关系更加有效，街角人经常制造出一些亲缘关系结

(kinship ties)来。以这种方式,人们可以在友人和亲属之间互相转换。从亲属关系开始,比如说,普雷斯顿与克拉伦斯、波利与唐克之间的关系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或从友谊开始,再建立一种亲属关系。

两个男人间拟亲属(pseudo-kin)关系最普遍的形式是“认作兄弟(going for brother)”。简单来说,就是两个男人向外界表明他们以兄弟相称,并且彼此间依此对待对方。认作兄弟看起来像是友情的一种特殊形式,在这种形式中,通常所指的需求、职责、期望和朋友间的忠诚,都会公开宣示到最大化。

海猫和亚瑟认作了兄弟。不管在哪儿,只要海猫有住的地方,他的房间就是亚瑟的家。在海猫的房间里,一直放有亚瑟的几件衣服和其他物品,亚瑟甚至把自己女友的照片(传达着“爱”或“爱与亲吻”)放在海猫的梳妆台上。他们还互穿对方的衣服,并且可能或可行他俩就形影不离。即使不在一起,彼此也都很清楚对方在哪里、去过哪里以及何时回来。一般说来,他们更愿意与他们共同认识的女人交往。有段时间,大约一个月左右,他们同时与两姐妹约会。

海猫有份正规的工作,亚瑟只是偶尔有工作,或很长时间内根本没工作。亚瑟的信用度不是很高,因此有时向街角男人借钱,对借主说看在他“兄弟”面子借钱给他。当海猫在格洛里亚那儿撞到了“大运”时,也就是格洛里亚送给了海猫一辆汽车以及公寓①时,亚瑟顺理成章地与他的朋友分享这份好运气。在街角,或在海猫的房间里,他们开怀大笑并互相打闹。显而易见,他们都很喜爱对方的陪伴。当他们生气、争吵时,也会互相诅咒对方,或喊彼此的名字互相嘲弄,那份随意只有亲密朋友间才能互相包容。②

在街角,有些人知道海猫和亚瑟实际上没有任何关系;有

---

① 见本书第 81 页之后的内容。

② 一次,在海猫房间内,海猫抱怨说一瓶发胶花了他三块多,要不是与亚瑟在一起,一瓶不可能连一个星期都用不了。亚瑟仿佛没听见,只慢慢地从床上起来,拿起梳妆台上的一瓶发胶,又夸张地松了松皮带,然后从腰间把裤子脱下,从容不迫地对着自己的生殖器喷着。边喷边看着海猫,毫无自责的意思。海猫只好摇摇头:“明白我说什么了吗?”他说道,但无法抑制住自己的笑声。

些人知道他们不是兄弟，但觉得他们可能或多或少有点亲属关系；其他人至少表面上已经接受他们是亲属关系的说法了。甚至那些知道他们仅仅是“认作兄弟”的人，也接受了他们的友谊是非同寻常的这一事实。一般而言，只有那些处于个人关系网中最重要地位的人们才能辨别出真实(real)和拟借(pseudo)的亲戚关系。这也是因为，关于这两个男人是真的兄弟还是仅仅是认作兄弟这个问题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在与这两个男人交往的过程中，重要的是大家知道他们说了他们是兄弟，这就够了，至于他们到底是不是兄弟则无关紧要。

那些“认作兄弟”关系中拟亲属结(pseudo-kinship tie)的社会事实，在理查德和乐华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理查德和乐华认作兄弟三个月左右时，乐华陷入了一场青少年群殴中。乐华在打架中受了很重的内伤，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那群人中有个家伙，曾经和理查德、乐华的关系都还不错。在和乐华打架后一个星期，理查德和他也干了一架，但这次和乐华无关，是他俩之间的个人恩怨。理查德杀了这个家伙，于是马上被捕了。警察从死去男孩的朋友、亲戚和社区其他人那儿搜集信息后，判处理查德一级谋杀罪，因为他蓄谋杀死了攻击“他兄弟”的人。但是当事实澄清乐华和理查德没有任何亲缘关系时，判决降到二级谋杀罪。死去男孩的朋友及亲戚们愤怒了，同时也大惑不解。对他们而言，甚至对乐华和理查德的朋友们来说，很明显，那就是个蓄意报复、故意杀人的事件。难道乐华和理查德不是认了兄弟吗？难道乐华不是被同一个男孩打的吗，就在八天前？

拟亲属结同样也涉及男女之间的关系。在维吉利亚一个军官俱乐部的厨房内，斯杜皮第一次遇见露西尔。他们都在那里工作。接下来他们就成了朋友。后来当露西尔和她十来岁的儿子找住处时，斯杜皮为她介绍了外卖店附近的一个地方，露西尔就搬了进去。既是工作伙伴，又是邻居，斯杜皮和露西尔的友情加深了，于是他们“认作表兄妹(going for cousins)”。斯杜皮和露西尔经常在一起，他们一起结伴回家，又一起前来上班，他们相互借钱，并且自由地到对方家里拜访。露西尔周六早上去斯杜皮家拜访时认识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而斯杜皮

与露西尔儿子的关系也是如此温馨，像舅舅似的。①

他们的关系中绝没有爱情或与性有关的迹象，甚至没人这样认为过。实际上，这可能正是"认作表兄妹"的主要目的所在。有这样一个说法："这个女人（男人）和我是好朋友，但我们不是情人。"考虑到表兄妹通婚的禁忌，②认作表兄妹就是允许了不相干的男女间建立起亲密的朋友关系，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危及他们的情人或性的地位。大家都拒绝任何情人或性关系与亲密朋友关系有交叉。

当把斯杜皮和露西尔之间关系与泰利和维尔玛之间关系相比较时，认作表兄妹的社会功能彰显无遗。泰利和维尔玛是很要好的朋友，但和斯杜皮和露西尔不同，他们没认作表兄妹。③ 有几次，泰利和维尔玛作为四人组成员参加聚会时，按规定，小组内每个成员带的都是自己的伴侣。这样的场合，泰利总是大谈他和维尔玛的友谊，说他有好几次睡在她家，但是连"一只手都没碰她"。深表怀疑的或根本不感兴趣的听者被拉到维尔玛面前，维尔玛证实了泰利对他俩关系的描述。

相反，斯杜皮和露西尔却没有澄清他们之间无性关系的压力。这样的问题从未出现过，因为他们已认了表兄妹，这就足够了。

有时，拟亲属关系比较随意地运用，这显然是为了使原本

---

① 后来，当露西尔搬走后，她有时还会回来看望斯杜皮和外卖店区的其他邻居（见本书第 102、103 页的内容）。在这段时期内，她和斯杜皮继续以表兄妹相称。

② 第一代表亲间的性关系是与乱伦分不开的，这也许能解释下面的这件事。在这个特殊的案例中，即使与表亲的配偶发生性关系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威·汤姆和我在南希住处时，还有其他一些人在场，其中有一男一女我们都不认识。同样那天晚上，接下来，我们在街角又遇到了他们。男的进了一家药店，这时那个女的试图吻我，被我推开了。"你为什么还想要他？你已经有男人了。"威·汤姆指着刚走进药店的男人说到。"他？"女人很愤慨地说到，"他和我表妹结婚了，他怎么可能是我的男人？"

③ 我不知道泰利和维尔玛为什么不认作表兄妹，也许因为他们没有经常在一起（维尔玛住在河对岸的弗吉尼亚州），不用走这一步；也许是因为他们没打算为对方承担一定的责任，这份责任是认作表兄妹关系所必需承担的；也许因为他们不想排除他们关系中可能发展出浪漫路线的可能性。或者最后来说，也许他们正处在认作表兄妹的进程的开始阶段。

通常模糊的关系明确起来并有正式的结构。这就是有时我们听到的:“他只是喊她妹妹而已”或“他们只是互称兄妹而已”,甚至“他们只是认了兄妹”。这也正是斯坦顿的真实写照。他小女儿与一个已婚女人住在一起。这个女人,大多数人包括斯坦顿自己都把她当作妹妹,但就斯坦顿来说,“他只是喊她妹妹而已”。可在照顾他的孩子方面,这个女人,有时确实做了妹妹该做的事。“妹妹”这个标签所对应的任务对于已在履行一种时常与这个标签相关联的职责的人来说是容易的。一种模糊的关系也变得明朗起来,而且被简单化了,不需要对其进行过多的解释。除此之外,还可以避免大家对这种关系本质的怀疑。从这些方面来说,可能“认作表兄妹”对双方都会有好处。像在认作兄弟的例子中一样,相比他们这样“称呼”对方的事实,斯坦顿和这个女人事实上是否是兄妹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应当肯定的是,这个女人的丈夫肯定知道他们不是真的兄妹。但自从斯坦顿和这个男人的妻子以兄妹相称后,即使当他不在家时斯坦顿去看望他妻子,这个男人的既定利益和公众地位也不会受到任何危害。

就这样,大多数友谊产生于相邻关系、亲缘关系或个体日复一日面对面彼此相遇的情境中。这些友谊通过互相交换钱财、物品、帮助以及情感支持而逐渐培养起来并延续下去。借几分到两三元不等的钱并要求延迟归还是经常的事;每当玛尔维娜出去和朋友喝几杯时,乐华总是替她照看孩子;唐克和斯坦顿帮布德把刚买的旧冰箱搬进公寓;罗伯特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给理查德做家居布置;普雷斯顿借给了斯杜皮四十美分搭公车去上班;唐克和珀尔举办了一个聚会,准备了所有的食物和很多酒水;当伯妮斯离开斯坦顿时,乐华安慰他,告诉他沙琳也总是这样,但又总是回来;乐华从理查德和雪莉那儿借了瓶牛奶给自己孩子喝;萨拉给了厄尔三美元,让他从洗衣店取回他的衣服;海猫和斯杜皮看见斯威特醉倒在人行道上不省人事,就把他背回家放到床上;唐克和理查德被传到警察局支付了五美元,用作泰利的担保;克拉伦斯从他父亲葬礼上回来后,泰利和普雷斯顿始终陪着他,竭尽全力安慰他。回到南希的住

处，克拉伦斯怀着悲伤的心情，独自默默不语。泰利一遍又一遍地劝他："振作起来，宝贝，别忘了你是个男人！"但克拉伦斯痛苦地摇着头。泰利一直努力着。最后，克拉伦斯终于接过一杯威士忌，一饮而尽，他终于抛弃了悲伤，与南希跳起了舞蹈。泰利为自己的努力没白费而开心地笑起来。"现在没事了吧？"泰利问道。克拉伦斯向他转身一笑：是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从现在开始。

从这些角度来看，个人关系网中，每个人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或者帮助别人，或者接受别人的帮助。由于朋友间的互助合作大多围绕着基本的日常生活必备方面展开，所以朋友对于个人在生理上和情感上的安全感就显得格外重要。拥有或相信拥有越多的朋友，且这些友情越深，他就越感到自豪，越能从别人眼里看到更多对自己的尊重。

追求安全感和自豪感使得他总是幻化自己的朋友和友情。他愿意把熟人当作朋友，且不仅仅是朋友，而且是一个他能与之"亲密无间"的朋友、一个"散步的伙伴"、一个"最好的朋友"，甚至是兄弟。他更愿意看到钱财、物品、互助和情感支持在朋友间出于忠诚和慷慨自由地流动着，并且是各取所需的互助，而不是需要回报的相互交换。他愿意相信他的友谊能回溯到遥远的过去，并有个无限的未来；还愿意相信不仅自己知道，而且朋友也了解他们之间是可以相互信任的，且他们之间的这份忠诚是无法丈量的。他愿意把自己看作皮西厄斯，其他人则是他的达蒙。①

"威·汤姆是我最好的朋友。"泰利说这话时，距他们初次见面才两个月。他把手搭在威·汤姆的肩上。"他和我是亲密无间的，为了他我什么都不在乎。"威·汤姆也说了同样拥护他的话。

亚瑟被一个店主开枪打死后（理查德当时没阻止得了

---

① 皮西厄斯，希腊人，曾救过朋友达蒙的命，当皮西厄斯被判死罪时，达蒙站出来为他担保。达蒙，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出于对朋友的忠诚而以自己性命为抵押，保证其被判刑的朋友皮尔厄斯会回来接受死刑。两人最终都被赦免。西方谚语中常用"Damon and Pythias"来代指一对生死之交的朋友。——译者注

他），理查德说，那个店主杀死亚瑟的同时实际上也杀死了他自己，因为亚瑟是他——理查德的朋友，不仅是他，还有亚瑟的其他朋友，都会为他们同伴的死进行报复的。雪莉曾反对说，那人杀死亚瑟只是出于自卫，实际上是亚瑟的错，并提醒报复可能对理查德、她自己以及孩子们产生的后果。理查德只是耸了耸肩，走开了。"我不能因为你就停止复仇。你是永远不会明白[朋友之间是怎么回事]的。"

乐华说他自己以及其他室友都不曾付给玛尔维娜任何固定的房租，每个人只是在他们能给多少时就给多少。他们都是朋友，正如你已知道的，那是如此不拘形式。他们会根据对方能力决定获得多少，又根据对方需要决定给予多少。

但是泰利和威·汤姆都对对方做了"好得过分"的事情，他们在关于钱财①和其他一些事上起了争执，比如当友情和夫妻关系相冲突时，哪种关系该更有优先权。② 他们的友谊就这样逐渐被这些争执消磨殆尽了。

还有理查德，他连亚瑟的葬礼都没参加，③甚至别人谈起亚瑟时，也不再提起为他报仇了。

至于乐华所认定的，玛尔维娜及其他与他住在一起的人，曾经是个大家庭，共用一个壁炉、一个水壶，现在的事实是每个人或每对夫妇都只购买他们自己的食物，并谨慎锁藏在地下室厨房的四个冰箱里。每个人都有权使用二楼的厕所和厨房，但除了水槽里或滴水板上一直放着脏兮兮的瓶瓶罐罐和锅碗瓢

---

① 例如，泰利拿到一个季度的工钱时(135 美元)，不仅连五至十块的都不给威·汤姆(威·汤姆也没真的指望得到)，甚至连借给他超过五块都不愿意。

② 威·汤姆和我在泰利的房间里等泰利穿好衣服一起出去。泰利一边脱汗衫，一边严厉指责威·汤姆在他们拿到报酬后就扔下了他和其他人。威·汤姆辩驳道："你不能总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时你得做你必须做的，我必须得回家。我老婆还在家等着钱交房租呢，而且我们还有些事需要商量。但那并不是说我们就不是朋友了。我只是必须得回家，仅此而已。"泰利对这些话语嗤之以鼻。"女人必须听从男人。"他回应威·汤姆道："如果女人不听从我，去他妈的。让她见鬼去吧。"威·汤姆一听这话恼了，但他没再说什么。

③ 他后来解释说他没去是因为他没钱去理发。

盆外，他们之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公共的了。此外，内心的细小算计是一贯就有的，算计的不仅是房租，还有一些不大正式的交换，数字零头也不抹掉。以下的磁带录音记录了乐华复述导致他和玛尔维娜及其他同居者之间关系最后破裂的事件。① 沙琳曾告诉过乐华，玛尔维娜说过她需要欠她的租金以及其他花销的钱：

> 因此，我拿到工资后就去找她。我说："玛尔维娜，给你十二块九毛五……"我说："现在，我要一块五，你的理发费；两块是之前给你买酒的钱，一块七毛五是另外一天你拿的。"接着我说，"玛尔维娜，我要从你这拿我买杂货的五块钱，我还要拿你买杂货的四块钱。"
>
> [讽刺地模仿玛尔维娜]"呃，我现在没钱。"
>
> 我说："那我等到你有钱吧。当你能都付清时，我再来，我会把我的账单准备好。当我们房租有五元了，你就从欠我的钱里扣掉，你把我的钱准备好。"
>
> 所以，当她们拿到钱时，她们说："我们得付房租。"
>
> 我说，"我一点也不知道啊，我的房租已付过了。我想要的只是我的钱。如果我拿不到我的钱，你可以拿那些抵我的租金。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我不会付房租了。"
>
> 因此，我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都没付房租。我们一直在争吵，昨天晚上，玛尔维娜跳了起来……

友谊双方一切事务进展顺利之时，才是友谊最浪漫与华丽的时刻。但面对危急时刻或利益冲突时，各自的需求最强烈化且无法妥协，友谊就无法再守住昔日的美好。每个人都知道这点。朋友间信誓旦旦的帮助和安慰的言语，一方面，缔造了真诚也获得了别人的信任，但另一方面，每个人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每个朋友有几斤几两，并且明确知道他们各自的利益需求，

① "只有当关系破裂了，潜在的债务才会摆到台面上来。"(Whyte,1955:257)

所以,最终大家都只会为自己做好准备。

实际上,友谊并不比生命还重要(bigger-than-life)这个观点,有时也被那些自诩为朋友的人们用作一种批判(我不需要你,不需要任何人),有时又愤世嫉俗地用来否定那些认为友谊是作为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系统而根本存在的观点。当泰利扬言要和理查德断绝关系时,理查德根本不把这当回事。"理查德是唯一能永远对理查德好的人。"①

还有种类似的观点,认为友谊只是种"晴天积云(fair weather)"现象②。约翰被开除后,我和伯妮斯、贝蒂私底下揣测着其原因,我告诉她们我在街角所听到的。

> "我知道是谁告诉你的,但他们只会在约翰背后说这些。"伯妮斯说。
>
> 我说告诉我这些[我转述给她们的内容]的那个人,他自认为是约翰的朋友。
>
> "他不是约翰的朋友,他从来都不是。"伯妮斯反驳到,"我知道是谁告诉你的,并且我知道他不是约翰的朋友。"
>
> 贝蒂说:"他们都不是约翰的朋友。那些男孩——海猫、理查德、泰利、乐华,正是因为他们,约翰才丢了工作,他们不是他的朋友。你知道的,一人得志,鸡犬相随。但一旦你一落千丈时,你就只剩下你自己了。"

对友谊和朋友的态度就这样不停地转换着,经常模棱两可,有时根本对立。此一时,友谊几乎就是神圣的盟约;彼一时,它又成了随意剥夺之地:"朋友只是利之所在。"

这些转换及显而易见的矛盾观点,都直接起因于个体关系网的结构和特点:组成个体关系网的各种不同关系所处阶段是宽广的,在某一时刻可能处于关系的发展期,也可能处于其恶

---

① 见本书第96、97页有关这一断言的背景。

② fair-weather friend 指只可共安乐而难共患难的朋友。—译者注

化期。它们还产生于:与一个不经意间邂逅的人能迅速发展成热烈的男-男或男-女之间的关系,而且同样不经意间,毫无缘由地,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压力下也瞬时分崩离析。

若想对个体关系及其交际网的流动性和活动性的特征有个很好的了解,可以观察这样的网络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的。接下来的例子就是从泰利的个人关系网中挑选出来的,历时八个月,直到 1962 年 8 月他搬出外卖店地区。①

泰利和理查德

1962 年 3 月,泰利与理查德"紧粘"(亲密伙伴)在一起。他们一起在外卖店地区以及周边闲逛,有时又一起在理查德地下室的住处呆着。那个地方,住着理查德和妻子雪莉,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

理查德努力工作着,当楼房管理员和勤杂工,但还是总缺钱。泰利时常每周三时借个二至五块给理查德,理查德也总是有规律地周五时就还给他。三月底,泰利工作的工地上有岗位空缺,他为理查德谋到了一份和他一样的工作,但理查德决定继续做他的楼房管理员。

五月上旬,雪莉的表妹艾玛·卢事先未通知就从纽约来到了理查德家,当时泰利恰好也在理查德那儿。表妹想来华盛顿试试运气,于是就和雪莉、理查德住在了一起。第二天,泰利和艾玛·卢就成了一对恋人。泰利随时都可以来理查德家,有时还在那儿过夜,和艾玛·卢睡在客厅里。泰利和理查德在一起也变得更亲密了。泰利告诉理查德,如果理查德发生了什么意外,不要担心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因为他——泰利,会好好照顾他们的。理查德说泰利是他最好的一个朋友。

艾玛·卢来后两个星期,理查德就陷入了困境,他要么放弃他的住处和楼房管理的工作,要么就接受减掉一半的工资报

① 泰利是 1961 年 11 月份搬进了外卖店地区。1961—1962 年冬季的大多数日子,他基本上处于失业状态。2 月份后期,他在市区的一个建筑工程中谋得了一份工作。

酬。第二天晚上，理查德对面临的选择表现出明显的焦虑，对在妻子的监视下无法溜出去会女朋友感到烦燥，于是他喝了半品脱的老林头波本威酒(Old Forester)，醉了，制造了一起事端。一怒之下，他开始谴责妻子雪莉“喜欢”泰利并与他一起“出去”约会，扬言说要把她“赶出去”，说完又到街上去了。泰利也跟出去想纠正他所说的。当泰利赶上理查德时，已走了两个街区远了。理查德从腰间拔出一把餐刀，泰利立刻停下来。

“别停，妈的，别停。”理查德喊道，挥舞着手里的刀，向泰利挑战着。理查德说他不想听泰利说的任何屁话，泰利建议他放下手里的刀，来场“男人对男人”的格斗。理查德差不多和泰利一般高，但是体重要比他轻 50 磅。理查德嘲笑他的建议，他们又很快地争议起这种格斗的意义何在。

接着，理查德又开始指控泰利和雪莉一起约会，并说他一直都知道泰利想得到她，所以上周才会说出那样的话来(指的是泰利发誓如果理查德发生意外的话，他会照顾理查德全家)。

“你想让我滚得远远的，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他们了。”理查德说到，“好，我与他们断绝关系了，你得到他们了。”

泰利嫌恶地跺跺脚。“你知道我所说的意思。”他说道，“我那样说是因为你我是亲密无间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是不会与朋友妻子约会的。”

理查德说泰利是骗子，并列出一长串女人的名字为证。“那么该死的你究竟在 203 房和 417 房[理查德那栋楼的公寓房间]做什么呢？你和约翰也是亲密无间，而且和弗洛拉的老男人也亲密无间，但那并不妨碍你每晚都干弗洛拉。”泰利可以不计较他前面所说的，但最后一点他无法忽略，他争辩道：“我甚至连弗洛拉丈夫的名字都不知道，那也能叫‘亲密无间’？”

在这点上他们争执不下。最后泰利走开了，他说理查德喝醉了，和他说不出什么。理查德回到他住处的街角，妻子以及她表妹都在那儿，雪莉哭得很厉害。

理查德说：“明天我就去巴尔的摩，华盛顿没给我任何东西——没有钱，其他的也没有。只是一些笑话而已。”

“那我怎么办?”雪莉喊道,“我和孩子们怎么办?”

“泰利那么喜欢你,他会安排你的,”理查德说,“他说他会照顾你和孩子们。”

雪莉双手捂住脸又哭了起来,艾玛·卢搂着她,扶她回去了。几分钟后,泰利又来到理查德身边。泰利仔细掂量后告诉理查德他已失去了一个朋友,不管怎样,同样的事绝不会在他们身上发生了。理查德说泰利错了,他——理查德已经二十三岁了,生命中从来都没有朋友。一直以来,理查德是唯一真正关心理查德的人,过去如此,将来也会这样。泰利提醒理查德一直以来都是自己借钱给他的。理查德说他都还了,并想知道他是否还欠泰利什么。

“是的,”泰利说,“你记得吗,上周你还欠我 1 美元,那是在掷骰子游戏中,你想捞回来。”

理查德让泰利不要走开,他跑了进去,拿着 1 美元的钞票跑了出来,扔给泰利。

“现在,我们两清了,”他说,“我不欠你任何东西了,你也不欠我的了。那么,泰利,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不要再踏进我的家门了。如果你有一只脚踏进我的家门,我会杀了你,我向上帝发誓。”

“还有,杰克逊,”理查德继续说道,又一次拿出他的刀子,在泰利的面前比划着,“永远别想靠近我,我会一直带着它。从现在开始,不管什么时候你看见我,白天,晚上,任何时间,我将会一直带着家伙。”

尽管有这刀子,泰利仍在理查德一臂距离之内。“理查德,我不怕你,也不怕这刀子,但我不想让你发疯,所以我才不想和你打架。但是你也千万别让我发疯。”

“那你就发疯啊,”理查德说,“我发疯了,你也发疯啊,就让它发泄出来吧。”理查德说他不怕警察,他以前曾坐过牢又出来了,如果他再进监狱的话,他还是可以再出来的。

“也许你可以。”泰利说,“但是你还是要出来,出来后还得拼命去挣钱。”泰利两只手拍拍后口袋。“但我不用,”他说,

“我总是随身带了些，我总是有些。我不必为了钱而去拼命，我总是有。”

理查德莫名其妙地又小声咕哝了些什么，他受到伤害了。我用力拖住泰利的胳膊，他让我把他拉出街角。当我们走开时，理查德还在我们身后喊着：“你是胆小鬼，杰克逊，你是个胆小鬼。你他妈的是个黑鬼懦夫。”

在附近一个酒吧里，一杯啤酒下肚后，泰利说不管理查德是真醉还是假醉，他都得对他所说的话负责，并且自己和理查德不可能再做朋友了。

一小时后，理查德把雪莉和艾玛·卢赶了出来。理查德坐在房间内，雪莉还在胆战心惊，跑回去站在门口，看他的情绪是否好转。理查德的怒气已平息，但他没理雪莉。但这给了雪莉胆量，她走进房内。

“我能去哪呢？”她呜咽到，“你知道我是孤孤单单的，我能去哪呢？没人敢留带着三个婴儿的女人。”

“你可以去泰利·杰克逊那儿，”理查德说，“他会照顾你的。”

“泰利·杰克逊，泰利·杰克逊，你和你的泰利·杰克逊都见鬼去吧，”她喊道：“泰利·杰克逊是你的朋友，不是我的！是你，把他带到这儿的；是你，使得他把这儿当成他的家、他的厨房、他的食物；是你，让他在这儿喝酒，还让他在这儿过夜的。我从来没和泰利·杰克逊一起出去过，你是知道这点的。我对他不错，只因为他是你的朋友。我直到上周才知道他的姓。”①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泰利和理查德竭力忽略对方的存在。当两个人碰巧在外卖店或者大街上闲逛遇到时，他们假装没看到对方，但他们不至于为了避免碰到对方而不出门。大约争吵后两个星期，泰利告诉我只要理查德愿意提出和解，他很愿意与理查德见面。我把这个意思传达给理查德，但是他只淡淡地说他很满意现在的状态，他更愿意他们之间保持现状。

---

① 知道姓是衡量社会距离的一个相当普遍的尺度，见本书107页的注释。

泰利和艾玛·卢

艾玛·卢 25 岁,她和她的表姐雪莉由艾玛·卢的妈妈抚养,在南方小镇伍德斯通(Woodston)长大。理查德也是在那儿长大的。五月份,艾玛·卢从纽约来到这儿与雪莉、理查德同住时,她和丈夫已经分居很长时间了。他住在华盛顿,他们的两个孩子住在伍德斯通,一个跟着艾玛·卢的母亲,一个跟着她丈夫的母亲。艾玛·卢的第三个孩子(和另一个男人生的)也和她的母亲住在伍德斯通。

在与理查德的争吵中,艾玛·卢公然站在泰利和雪莉这一边。当理查德把她和雪莉赶出公寓时,她和理查德各站街道两边,大声诅咒对方,并威胁说要杀死对方。理查德回到住处,把她的东西统统放进她的皮箱,扔到了门外。理查德在家的时候,艾玛·卢不敢回去,晚上就在泰利那儿过夜。第二天,理查德上班后,她去拿了她的箱子,搬到了泰利在卡丽小姐公寓里的房间。

泰利以为这只是个权宜之计,但艾玛·卢却不想另外找地方住,她力求留在泰利这儿。她还在附近一家小酒馆里当上了服务员,并把自己的工资交给泰利,她觉得这样自己能永远和泰利住在一起了。但泰利拒绝了,他坚持让她另找地方住。到第三周时,艾玛·卢仍待在泰利的住处,而且不上班的时候大多呆在房间里。不过每当她回来时,泰利便出去了。艾玛·卢大多时间待在窗口边上,和街上的人打着招呼,说如果他们知道泰利在哪儿或看到泰利在街上闲逛,叫他早点回家。有时,泰利烦透了,才上楼没几分钟就迅速回到街上。更多时候,泰利不理艾玛·卢,直到她喊累了,离开了窗户。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也就是艾玛·卢来的第四周,泰利把她赶了出来,因为他说他发现她和博比·约翰睡在一起。他说他可以不介意她和其他不认识的家伙睡觉,但是博比·约翰是他的朋友,他无法忍受这件事。所以艾玛·卢搬出了泰利的房间,但留在了同一套公寓内,她睡在客厅里,而且以自己之名成

了卡丽小姐公寓的一个房客。艾玛·卢觉得她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她充满怨恨地抱怨道:和泰利住在一起时,他有好几次带女人回来,而她自己连其他男人看都不看一眼。

自从艾玛·卢从他的房间搬走后,就没再听过泰利提她的名字。在艾玛·卢搬出泰利的住处十天后,他们又一次碰到了一起。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卡丽小姐的房子里,有十至十二个男女在跳着舞,喝着酒,艾玛·卢和泰利也在其中。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尽兴,很显然,泰利和艾玛·卢总是避免与对方跳舞,甚至假装对方不在场。一星期后,艾玛·卢彻底搬出了该地区,至此距她第一次与理查德、雪莉住在一起恰好六个星期。从此,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

泰利和隆尼

隆尼二十六岁。他自幼在华盛顿由养父母抚养,在那儿读完了十年级。在来外卖店地区前,他做过一些临时工作,比如散工和存货管理员。

1960 年夏天,泰利第一次遇到隆尼。那时,隆尼刚搬进泰利住的那个社区,和他的妻子及岳母住在一起。他们第一次见面后两个星期,隆尼被岳母赶了出来。① 隆尼就搬到了泰利的住处。三个星期后,隆尼的妻子和岳母搬到城市另一处去了,他就从泰利这儿搬走了。之后,他和泰利彼此失去了联系。

1962 年二月的一天,泰利被传唤作隆尼的品德信誉见证人(character witness)。当时,隆尼因为勒死了他年轻的妻子而将接受审判。在去法院的路上,泰利谈到了他与隆尼先前的关系,现在他几乎不知道这些日子来在隆尼身上都发生过什么。“隆尼是个好人,”泰利充满同情地总结道,“他是个百分百的好人。”

---

① 泰利和其他几个了解情况的人说,问题的症结在于隆尼的岳母觉得他的肤色太黑了,配不上她的女儿。

法庭发现隆尼蓄意谋杀妻子罪名不成立，而他早先因重大盗窃罪遭到指控，在缓刑期内又触犯相关条例，于是在法庭上立即再次被捕。泰利在隆尼获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支付了 5 美元的担保费，又帮忙从隆尼家人那里筹得了 35 美元，并同意在担保费票据上也签字，这是除了担保费之外担保人一定要做的。

隆尼最终被释放，判了缓刑两年。在他释放那天，泰利、隆尼和我约好等泰利下班后在街角碰面。隆尼已在一个饭店厨房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那天晚上他就要开工。泰利兴致很高，我们大半个晚上都在街角庆祝隆尼的释放。其间，泰利一直为自己朋友的好运开怀大笑，当隆尼复述了整个事情的原委何以促成这个团圆和胜利时刻时，泰利还总时不时地拍拍隆尼的背。三月的那一天是他们友情最高涨的时刻。

隆尼不住在这个地区，而且晚上上班，所以不常来外卖店附近。但两个月后，他换成了一份白天的工作，于是晚上下班后就时常来外卖店，很快就在那儿认识了一个女孩儿和几个男人。

一天晚上，泰利向隆尼索要他之前支付的 5 美元担保费。隆尼耸耸肩，走开了。下一个隆尼发薪水的日子，泰利向他又要了一次。那时，隆尼在做服务生，一个星期大约能挣 50 美元。他一句话没说，把钱给了泰利，转身就去玩弹球机了。

几天后，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泰利和隆尼还有其他几个人一道去参加一个聚会。他们中途去了趟隆尼母亲的家，以便于他能换衣服。当着隆尼的面，隆尼的母亲告诉泰利她与隆尼住在一起的难处，撇开他缓刑的身份不说，他晚上不回家，不付食宿费，欠他弟弟的钱也不还。她说的时候，隆尼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出门后，泰利问隆尼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隆尼只是告诉他这不关他的事。泰利说他不知道隆尼到底怎么了，但他能肯定的是——“他不再是当初那个隆尼了！”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隆尼抱怨说他无法再忍受他的家人

了，尤其是他弟弟，[1]于是就搬到了外卖店附近。他与泰利分道扬镳了，但是他们也会遇到，比如某个聚会上，或者在外卖店里。他们试图很随意地相互交往，但总是很尴尬。毋庸多言，三个半月前的那天，他们亲密地互拍后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泰利和贝丝、厄尔、露西尔

贝丝23岁，魁梧健美。她和她的四个孩子与她母亲一起住在城市的另一个区。泰利是贝丝最小孩子的父亲。泰利发薪水的日子，贝丝有时会来街角等他下班回家。她会告诉泰利需要五或十美元买鞋子，或者支付他们孩子的其他费用，泰利会给她钱，他们还会走进外卖店，要份三明治或来瓶苏打水，接着泰利再把她送上一辆出租车回家。贝丝的来访越来越频繁。六月时，泰利和贝丝又成了情人，贝丝有时会在星期五的晚上带着他们1岁的儿子和其他三个孩子来泰利的住处过周末。

临近六月末，泰利开始和露西尔约会。这是个30岁的女人，以前住在外卖店附近，但现在与她12岁的儿子住在这个城市的另一个区。在与泰利约会前，大家一致公认她是厄尔的女朋友。

泰利和露西尔第一次约会后第二天，泰利和厄尔两人开始互不搭腔。到下一个周末时，两个被抛弃的情人，厄尔和贝丝，也组成了一对。七月，泰利和露西尔成为情人不到两个星期，泰利搬出了外卖店地区，去和露西尔以及她儿子同住，他的理由是他和女房东卡丽小姐吵架了。

接下来几个星期，虽然泰利已搬出了那个区，但下班后他还是会径直到外卖店来，而且周末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儿附近度过。他对他与露西尔的关系充满热情，声称不关心贝丝在做什么以及她和谁在一起，尽管如此，他还是坚信贝丝真正爱的

---

① 母亲、兄弟、姐妹等，都是隆尼对他收养家庭成员的称呼。这不是拟亲戚关系的一个例子。隆尼直到18岁时才知道他们不是自己真正的家人。他和他的弟弟不是“认的兄弟”，他们是(非正式)收养中的兄弟。

人是他，并且向他暗示过她希望他们能再在一起。

一个周五的晚上，厄尔和贝丝站在街角外卖店外的一群人当中。泰利走到街角，问贝丝能否和她单独说会儿话。于是，贝丝跟着泰利来到大约十到十二步外的一个空的停车场的边缘。泰利转过身来面对她，接着扇她耳光，把她打倒在地，又开始踢她。厄尔飞奔而来保护贝丝。泰利那晚喝多了，厄尔找刀子但没找到，只好赤手空拳搏击泰利，最后两人打成平手。两个男人停战时，身上衣服被撕破了，脸上、脖子上和胳膊上到处是擦伤、青肿的痕迹，但没受重伤。接下来几天，当泰利和厄尔恰好在外卖店碰到，或者在街上遇见时，泰利总是假装没看见厄尔。厄尔则怀有敌意地看着泰利，警惕地盯着他，很谨慎地不把背对着他，怕他从后袭击。

一星期后，贝丝又同意与泰利见面。贝丝怀里抱着泰利的儿子，手里牵着她三岁的女儿，来到南希的住处，她答应在这儿与泰利见面。泰利来到那儿与她会合，在他们说话和喝酒的时候，泰利把他的儿子放在膝盖上玩耍。有人问他儿子叫什么，泰利结巴了，接着又突然蹦出一个词"糖豆"。贝丝，半严肃地拍了下他的脸，说："难道一个男人连自己儿子的名字都不知道，还不觉得羞愧吗？"

泰利走出房间的一会儿，贝丝说到她对他的感觉。她说自己喜欢他，他们之前在一起时很开心，但是她也很讨厌和厌倦他的嫉妒心，以及每次喝醉后对她动粗。如果再发生那样的情形，她说，她就彻底与他结束。她说她同意今晚来这儿约会前告诉过泰利这点，泰利也保证不会再发生了。

泰利回来后和贝丝跳了个舞，又喝了几杯酒。之后，泰利扮了一个悔恨有加而又热情洋溢的小丑情人角色，把贝丝逗得乐不可支。十点时，贝丝和孩子们回家了。泰利依然很高兴。

"她会和厄尔结束关系的。"他宣称，并解释说贝丝告诉过他，厄尔只是个男孩儿，她想要的是泰利，因为他是她的男人，而且"你知道到了哪一步"。泰利说他也一直爱着贝丝，并打算和她结婚。

第二天晚上，泰利、厄尔和理查德还有其他男男女女在南希家里喝酒、跳舞。厄尔和理查德出去了，几分钟后泰利也出去了。

泰利出去十分钟后，一个女人跑进了南希的房间，说泰利刚刚被捕了。外面，警车和其他应急车辆正在离开，车上的红灯依旧在闪烁。几群人在街上乱转。贝丝、理查德和厄尔站在一起。

理查德说泰利这次惹上大麻烦了。贝丝说几分钟前她在街角碰巧遇到泰利，当时泰利喊她一起走，她拒绝了。于是他们开始争吵，泰利打了她，贝丝说她早就发誓不想再被他打，她从包里掏出一个啤酒开瓶器划向他的脸。这时，一个警察和一条狗出现了。警察抓住了泰利，贝丝跑开了。当警车到的时候她又转了回去。唐克这时也插进这群人中，他说泰利打了警察。贝丝耸耸肩，接着和厄尔一起沿街走了。[①]

泰利通知了他的担保人，第二天早上就被释放了。周五或周六的晚上，他还是会间或地来这儿附近，但会离外卖店远远的。八月末的时候，在街角和外卖店里，几天都听不到有人提他的名字。

虽然这些关系都是从泰利的人际关系网中挑选出来的，但需要着重说明的是，被调整的不仅仅是泰利的个人关系网。理查德是泰利关系网的一部分，同样泰利也是理查德关系网的一部分。因此，泰利与理查德之间关系的变化，不仅是泰利个人关系网的变化，而且也是理查德个人关系网中同样的次序和数量变化。这种变化是相互而对称的：当泰利失去理查德这个朋友时，理查德也失去了泰利这个朋友。

其他不对称和相对不可预知的变化也反映在相关联的关系网中。泰利与艾玛·卢的恋爱事件促使他和理查德的关系更亲密，但是他与露西尔的关系又使得他和厄尔分道扬镳了。当厄尔开始和贝丝约会时，这两个曾经是好朋友的男人，关系

---

①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贝丝。

达到了冰点。

人们彼此间的感知和行为变化也会对邻居、亲属群体、同住者、家庭及其他基于这些私人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机构产生很重要的结构性的后果。当理查德和泰利“亲密无间”时，泰利有段时间成了理查德家的一份子，晚上睡在那儿，那儿仿佛也成了“他的家，他的厨房，他的食物”。艾玛·卢是因为与理查德、雪莉的亲属关系加入这个家，她与泰利的恋情促使泰利与这个家更紧密。一场争吵改变了这个家的构成，事实上一夜之间，雪莉、理查德与艾玛·卢的亲属关系就实质性地破裂了。①艾玛·卢搬去和泰利同住，但很快泰利又改变了与她的关系，这促使艾玛·卢与卡丽小姐之间成了房客-房东的关系，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两个女人建立起了朋友关系。最后，泰利的拒绝使得她彻底搬出了该区。其间，要么因为与卡丽小姐吵了一架，要么就是因为露西尔对他的吸引力太大，或者两者都有，泰利搬去和露西尔住在一起。露西尔和她的儿子，曾经相依为命，现在与一个扮演丈夫和父亲角色的男人来共享他们的房子。

一般而言，汤姆和迪克的关系与他们各自和哈利之间的关系没什么关联。理论上，两人之间的某一特定关系发生变化，只是他们各自关系网一个简单的变化，在他们的关系网外都不会产生影响。但也有特例，有时某人关系网的一个变化会促使两个或更多关系网发生变化。事实上，如果对细节进行充分描绘的话，一个特别剧烈的改变，比如泰利和理查德之间的争执，发出的震颤能贯穿街角系统的很大一部分，并导致该系统进行一系列调整性的重新排列。

---

① 关于个人关系建构亲属结的途径，雪莉曾含泪讲述过一个生动而清晰的事例。理查德曾坐过一个星期的牢。在理查德坐牢期间，雪莉为她自己和孩子们感到绝望，于是打电话给在费城的姐姐，希望能借些钱。她姐姐与理查德吵过一场大架。姐姐问她道：“你是那个称呼自己是雪莉·霍金斯的雪莉吗？和理查德·霍金斯结婚的那个？”雪莉说是。“那么你不是我的妹妹，”她姐姐告诉她，“我妹妹不会再和理查德·霍金斯在一起的（意思是：我不再把你当作我的妹妹，除非或直到你离开理查德）。”说完她就挂了电话。

整体的图景呈现为一张相互勾连的、重叠的大网，网中的成员持续不断而又无序可循地变换着彼此间的位置。这种在邻里关系、亲属关系、家庭关系、同住关系上反映出的个人关系流动和变化的特点，实际上在街角世界整个社会结构都有所体现，因为很大程度上，街角世界就是基于私人交际网中初级群体间的面对面关系而构造起来的。①

认为经济、社会、心理的力量依次威胁到个人关系网的稳定，是在掩盖友谊本身的缺陷。不管作为原因还是结果，或者两者皆有，事实上友谊通常并不是植根于长期的交往中；交往中的人们也不必知道有关对方交往前的一切个人历史。② 男人可能会觉得（有时可能会说）他和某某人的友情可以回溯到几年前，甚至到孩童时代，但这通常情况下并不是事实。③ 他们的关系大多是以现在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个男人或许对他朋友现在的境况和关系了如指掌，但除此之外就知道得寥寥无几了。从他的朋友在街上这样的事，通过反观自己，他知道了这位朋友个人历史的大概的典型特征。他知道他的朋友主要由女人养大，并珍视这些女人；知道他被教会爱上帝、敬畏上帝；知道他没受过什么正式的教育；知道他没有什么工作技巧，辗转于各个不同的小镇和城市打工；知道在一个或多个这样的城

---

① “如果怀特现在能回到美国的街角区域，他可能找不到什么证据来证明他所说的‘高度组织和整合’的贫民区生活模式。”（Cloward and Ohlin，1960：210）垂直流动和地域性流动、居住和土地使用的变化被认为是造成某些贫民区的社会组织中不稳定的影响力，而“造成某些贫民区的社会组织中不稳定的影响力有很多……这种影响力让社区失去平衡，因为发展社会组织尝试性的努力很快就会被检验。*短暂性和不稳定性成为社会生活的最主要特征。*”（斜体部分为原文强调）怀特自己也指出对相对稳定的贫民窟社区（比如他自己的街角社会）和不稳定的贫民窟社区作出区分的重要性（Cloward and Ohlin，1960：172）。他指出玛格丽特·钱德勒在《一个出租房区的工人社会组织》里，发现了“认识了一个星期就会被认为是老朋友，这个关系结变化得是如此迅速。”（Whyte，1955：257）

② 奥斯卡·刘易斯发现：“在一些村庄里，在面对面关系中，农民即使对他们认识的人不是很了解或理解不多，仍然能过下去。”（Lewis，1957：12）

③ 例如，当乐华作为理查德谋杀案的品格见证人时，他证明说他从小就认识理查德。乐华后来声明说他有点夸张，当提醒他直到 1961 年才遇到理查德时，他感到惊讶，摇头不信。

市中，他可能是某个从未谋面的孩子的父亲；知道他第一次来这儿是因为他有个叔叔或阿姨在这里，或是遇见了某个女孩，或是听说有这份工作，或是被警察通缉了，或是曾经与他住一起的人在这里。但他不知道具体的细节，不知道是他的母亲、祖母还是姑妈抚养了他；不知道他在学校的受教育程度；不知道他曾经在哪个小镇和城市生活并工作过，以及在那儿有什么主要的经历，等等。当然，在随意交谈或四处闲逛时会不经意间主动提及一些信息，但大多都无从知晓，[①]尤其缺少对一些私密想法、个人愿望和内心恐惧的交流。

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来说，两人之间的友谊表现为一种彼此没有交心的关系。因为缺少对过去和现在的进一步认识，在涉及经济上或心理上的自我利益时，或受到外在力量的阻挠时，友谊很容易给瓦解掉。

认识到这个缺点，再加上意识到友谊作为安全源和自尊源的重要性，这些无疑是友谊幻化的根本推动力，对友谊心存幻想，使友谊更上一层，把别人认为的点头之交提升为友谊，把友谊提升为亲密的友谊。他们试图给没有过的关系赋予一个过去，从血缘关系那儿借来亲属结构（“认作兄弟”），只在需要之时用作对一种关系的结构上的支持，他们以此来提升友谊。好像友谊是凭意愿人为制造出来的，一种心所想的友谊，两个人之间的一种私下的协议，行动上表现得像好朋友，而两个人的关系不是真的如此。

---

① 甚至连他们的姓也不知道。一天晚上，理查德坐在他的房间内为他现在的处境悲叹。当被提醒他有很多朋友时（他曾经在他的公寓楼里做了五到六个月的楼房管理员），理查德哼了哼，说，如果警察来抓他并允许他打一个电话，他会不知道如何是好，因为他连一个人的姓都不知道。这并不完全属实，但它明显指出了他对自己在外卖店地区结成的友情的深度的轻蔑评价。这些友谊的品质与他以前在家乡（1960 年人口为 1 100 人）形成的友谊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在那儿，他的家人认识所有其他黑人家庭，别人也认识他们；在那儿，他的朋友都是他从婴儿时就认识的年轻男人和女人。

第7章 结 论

本调查主要关注街角黑人男性的内部世界、日常世界，以及与妻子、孩子、朋友、情人、亲戚和邻居间面对面的关系。试图站在男人自身的立场上去理解他，把他所说的和所做的进行比较，并对他的行为作出解释——是对下层黑人生活条件的直接反应，而不是对历史或文化规则的无声顺从。①

这种内部世界不是作为一个能自我限制、自我激发和自我维持的系统而存在，甚至连与周围的更大世界（the larger world）之间有明显分界标志的亚系统也算不上。它与更大社会（the larger society）有着持续而亲密的接触——实际上，是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仅在价值观、情感和信仰上受更大社会的影响，而且依赖于更大社会的福利救济金或相关工作人

① 幸运的是，在对待下层人的行为上，"文化"和"历史延续性"作为最有用的构念，越来越受到怀疑。例如，黑仑·刘易斯建议说："下层家庭在面对他们的社会位置和相对隔离感时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思考这点似乎比认为这些行动是对下层文化规则的应对更有效"（Lewis，1963：43）。理查德·克洛沃德和劳埃德·奥林认为，"下层价值观的历史延续性理论……*忽略了今天下层和青少年偏差行为文化是对我们的社会条件的可预知反应，而非持久模式。*"（Cloward and Ohlin，1960：75）托马斯·格拉德温有相似的疑虑："把多问题人口定义为亚文化仅是看待问题的多种方法之一……公式化是无用的，除非它能帮我们更进一步地解决问题。"（Gladwin，1961：75）伊丽莎白·伯特彻底挑战了文化概念作为解释工具的使用："我不相信像文化差异、亚文化差异这样的说法足以解释各种变化……如果说人们表现不同或者有不同的期望是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文化，这等价于只是说——他们表现不同或文化不同是因为他们是不同的。"（Bott，1957：218）

员，如警察、警局线人、社会工作者、房东、毒贩、塔珀家用塑料制品(Tupperware)展示员、数字赌客以及人类学家。

内部世界和周围的更大社会之间一个重要的连接点是在就业领域中。男人谋生的方式和他谋得什么样的生活，对于男人如何认识自己和怎样被别人看待有很重要的影响。并且，这些因素相应地在塑造他与家庭成员、情人、朋友以及邻居间关系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谋生在婚姻上所起的作用最为重要。年轻的下层黑人20岁出头就普遍结婚了。相应的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白人或黑人部分出于相同的原因也差不多在这个年龄就已结婚。他结婚没有特别的动机；不管结没结婚，性都不难获得，并且也可以和女人住在一起或生孩子，如果之前他们没这样做的话。他渴望公开、合法地结婚，渴望养家糊口并成为家庭的主心骨，因为这些是我们社会中的男人应该做的，不管这个男人是住在外卖店附近，还是住在市区雅致的房子内。

虽然他渴望结婚，但从一开始，他就因为畏惧心理而对自己的承诺闪烁其词。他畏惧的不是婚姻本身，而是他自己是否具有履行丈夫和父亲职责的能力。他自己的父亲没能做到，并且退出了；其他他所认识的曾经结过婚的或正处于婚姻状态的男人们也都没做到，要么正走向失败。他没有证据表明他会比他们做得好，他也没有证据证明他做不好。不管他上到几年级，他仍是无知或近乎无知；不管他曾经做过多少工作，或者多么努力地工作着，他还是没什么工作技能。[①] 用一套失败的模式来武装自己，深信自己没什么价值、没什么文化又没什么技能，他就这样进入了婚姻和工作市场，失败的气息包围着他。工作不总是有，而且几乎全都是体力活儿，有时很艰辛，并且所得报酬永远不足以养活一个家。

总体来说，体力劳动的工作处于主流工作之外，并且朝不

---

① 而且他是黑人。这些因素一起构成了致命的组合，把他降到我们社会的最底层。

保夕。黑人体力劳动者总是做着体力劳动的活儿，以至于，在他们结婚一两年乃至三年并有了许多孩子后，这个从一开始就无法养家的男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无法养活整个家了。他工作得越久，他所挣的就越难以满足生活需求。他对这样的工作没什么兴趣，并学会像雇主和全社会一样蔑视这样的工作。在他的观念中，工作是可有可无的；在雇佣者那里，他是可有可无的。于是，他经常辞工或被辞工，至于原因，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微不足道得以至于其他人无法察觉。其余时间内，他基本不工作，只是因为他找不到工作。

他把这种失败情绪带回家，在家里，他的家庭生活也正经受着同步的恶化。他与妻子心目中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成年男性模范不相符，但妻子仍然在他身上期许很多。她希望（hope）但不指望（expect）他能成为一个称职的养家糊口者，能组建一个像样的家庭，并成为整个家的主心骨，做"家里真正的男人"。但他没做到这些，他并没有因为失败是意料之中的而觉得好过些。她把她的需求与她的渴求、她的希望，而非她的预想联系在一起。她的要求既反映出社会对男人的应然要求，也折射了他实然做到的，从而使得他的失败之处在她们眼里放大了。

有时，他坐下来，为所有的耻辱而哭泣。有时，他把拳头挥向妻子和孩子们，这也许是作为家中男人的无声控诉，这是他可使用的方式，也许只是让这个女人遭受痛苦，是她见证了他作为丈夫、父亲，进而作为一个男人的失败。渐渐地，他开始转向街角，在这儿有一套公共虚造出的影子价值系统（shadow system of values），这个价值系统容得下他这样的男人，使他们

再次成为男人,如果他们不去深究彼此底细的话。①

当他在街角的关系压过他与妻子、孩子的关系时,他就完全继承了父母、老师、雇主和全社会遗留给他的遗产。这是迈向失败的一步,几乎没有人回得了头;也正是在这点上,社会上的其他人可以攥起拳头,为能确切知道街角男人之所为恰如他们所料而欢欣鼓舞。

街角成了那些无法再承受失败经验或失败预期的人的避难所之一。在街角,公共虚构支持的价值系统,与全社会的价值系统一起,促成了一个矛盾、相互冲突、似是而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失败被合理化为虚幻的成功,弱点被神奇地转变为优点。在街角,男人经常让自己忘掉已婚,因为已婚意味着承担义务、责任和男人的身份;相反,他视自己为"上了当"的男人,他结婚是因为他的女人怀孕了,或是他遭到欺骗、勾引,或被其他人劝导这样做。他用"男性缺陷理论"作为他婚姻失败的借口。他承认做一家之主和养家是衡量男人的基本准则,同时他还声称做一个男人远不止于此。他说他婚姻失败,不是因为他作为养家糊口的人和一家之主不称职,而是因为他的妻子不能容忍他的男性嗜好——威士忌和其他女人,这种嗜好在街

---

① 这种"影子系统"的价值与海曼·罗德曼的"价值延展(value stretch)"理论非常接近。他说,下层民众"与其他阶层的人一起共享普遍的社会价值观,但另外,他们延展了这些价值观,或者发展了备选价值观,这些帮助他们适应于他们贫困的环境。"(Rodman,1963:209)

我为罗德曼的理论和其他假定下层价值观备选系统的阐述再限定两点。第一点是,延展的或备选的价值系统与作为母价值系统或一般价值系统,要么在现象学上(phenomenologically),要么在操作层面上(operationally)不是同一套价值秩序:他们本质上是派生出的、次要的,单薄的和不足分量的,没有完全内化的,好似强制性或适应性行为所反映的价值形象,而不是对行为抉择有正面决定性影响的真实价值。第二个限定就是,备选价值系统并不是使用者独立施行的显著价值系统。它表现为只与母系统相关,只在分析上是独立的。这种备选系统是派生的、非实质性的、与母系统并生的,它好像是由共同价值系统在扭曲的下层社会情境中投射下来的影子。这两套系统一起说明了,对于从一套系统的角度来观察的中产阶级来说,看起来是吊诡的、不连续的,熟悉而又陌生的价值观。

角的影子价值标杆上处于很高的位置。[1]

在婚姻之外，他把自己看作是女人的无情剥夺者。但凡涉及女人，他会说，男人应该有所得时即享其所得。他声称不理解不这样做的男人。做一个女人的剥夺者，这种在言行上宣称的建立，让他能自由地与一个或多个女人开始爱恋关系，公开表达对她们的爱，且试图在互相尊重的非剥夺基础上与她们相处。

然而，实际上，他却无法总是把剥夺和非剥夺的关系分得很清。作为剥夺者，他的行为有时与他的话语相符，但他不时把供应他身体和金钱的女人赶走，或者对她们的利益表现出关注，这揭露出了他作为女人强硬剥夺者的虚妄谎言。类似地，他对一个女人不死之爱的真诚表白以及愿意受她支配并献出自己乃至一切的承诺，在他对金钱的需要、对自身消费品的渴望或通过其他征服方式来证实自己男人气概的欲望的压力下，都不会持久。因此，不管男人多么无能为力以及不愿意把自己表现为一个十足的剥夺动物，但剥夺的冲动——由男人物质和智力资源缺乏所引起，并由公众对男人是女人剥削者这一形象的构建培育起来的——依然强烈，足以让这种品质妥协和男女关系的寿命缩短。结果是，男女关系往往是相对短暂、一厢情愿的爱恋，结束来得突然且常常生硬。

利益的冲突、物质和智力资源的普遍缺乏侵蚀了个人关系的整体结构。友谊是一种珍贵的关系，对个人的身体和情感安全感都有很重要的作用。理想点来说，友谊是一个互助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钱财、物品、服务和情感支持出于真诚和慷慨而自由地流动，并各取所需，而不是在对等报答（a quid pro quo）基础上一成不变地相互交换。但是，金钱、物品和其他助人之物通常情况下是短缺的，这使得每个男人都很小心翼翼，对分发出去的和接收进来的暗自算计。此外，每个人都清楚自己和

---

① 下层社会的人的行为——无论是他们自身群体还是上层社会的成员，都认为是偏差的——可被当作获得某种有效认同感的努力，当作满足从内心生出的需求并赢得周围人把他作为一个有效的人看待的努力。（Rainwater，1965）

朋友的资源是贫弱的，尽管许诺了无条件的互助，一到他需要的不仅仅是象征性的援助或那种会在物质上用尽给予者资源的帮助时，每个人最终还是要指望自己。他也知道，所有的友谊在受到自我利益冲击时都是脆弱的，尤其在涉及钱和性时。

仿佛预料到了个人关系的脆弱性——为了在友谊还存在时尽可能多地获取能获得的一切，以及希望延长友谊——男人总是很草率地把每段关系都推向最大化，很快把随意的熟人关系上升为朋友关系，把朋友关系上升为最好的朋友乃至情人关系。这种提升个人关系并把它们迅速提高到一种强有效的联合阶段的急躁，会缩短它们的生命期限，人们要过早地承担起期望中的义务和责任，但速成关系完全不能支持这些。①

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个人关系的流动性表现为邻里和亲属群体、家庭和住户内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建立在这些个人关系上。实际上，短暂也许是这个街角世界最显著和普遍的特征。短暂不仅表现在微妙的社会关系上，还表现在更显而易见的空间关系上；不仅表现在任一时间相互勾连、重叠的个人社群网络中的关系上，也表现在进进出出这些网络上。有的男人为了逃避另一区域警察的追捕而来到这一特定区域；有的男人因为同样原因而离开这一区域。有的男人，比如泰利，因为他们已经耗尽了他们的友谊和联盟，而不得不去另一个地方开始新的交际网，所以离开了这个区域；同时，另一个泰利因为同样的原因搬出了他的老地方来到了这里。这里有一户人家被赶了出来，于是人行道成了这家人的中转站，他们分布其上，或住在一起，或有段距离。第二天，或许就在同一天，同一个房间或同一套公寓就被城市另一端同样被驱逐而来的家庭成员接管了。这里有一个男人失去了工作，搬了出去；又有另一个男人找到工作，搬了进来。这里有一个男人坐了七年牢后被释放回来，那里有个男人想在纽约试试他的运气。各路交通皆繁忙！

因此，对下层区域传统意义上的描述——紧密连接的社

---

① 从这点来说，拟亲属关系的主要功能是，早预料到个人关系的脆弱性，因此试图授予这种个体关系以亲属关系的持久性。

区,其成员共享着"我们皆同在其中"的情感——根本不适用于街角世界。把它看作一个自我维持、不断前进的社会系统,有着它自己对生活的独特设计、组织原则和价值系统,这似乎也是无益的,尤其是对那些愿意看到它变化的人来说。

下层黑人世界应当被看作是独特的亚文化,还是被看作是更大社会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也许处在更大社会的底部,但毕竟是更大社会的一部分,这和更大社会的中间或顶端是一样的),这已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还有了重要的"干预"结果。例如,下层黑人间的婚姻被描述为"接力赛式一夫一妻制"(serial monogamy),在这一模式中,育龄期的女人在她有生育能力期间会有一连串的男性配偶。"接力赛式一夫一妻制"这一标签很明显有其文化指向,它衍生自常用来命名具有文化独特性的婚姻模式的传统术语,比如一夫多妻制(polygyny)、一妻多夫制(polyandry)、一夫一妻制(monogamy),等等。继而,与美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完全的一夫一妻制婚姻模式相对立,"接力赛式一夫一妻制"指出了都市中下层黑人的文化独立性和特殊性,并作为其表现形式。

当这些相同的现象在美国人生活这一大背景中直接被研究时,不管是"接力赛式一夫一妻制",还是文化独特性往往都不见了。存在于他们的地盘上的同样是一夫一妻制婚姻模式,和我们社会中其他地方一样,只不过是失败的。女人并不只是简单地"在她有生育能力期间有一连串的男性配偶"。她有一个丈夫,他有一个妻子,他们的希望和他们的意图是——如果不是他们的预期的话——这会是段坚固、持久的婚姻。然而,更多情况下,是他们担忧的而非希望的变成了现实。婚姻失败了,他们分手了,男人变成了"一连串配偶"中的一个,被另一个被丈夫抛弃了的女人接受;而女人,也即将接受另一个或更多的男人。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次级的、后续的亲密关系是正式婚姻关系有点黯淡的反映,每个亲密关系以其为模板,又常常像婚姻本身一样因相同的原因而失败。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一连串的配偶是下层黑人婚姻的特点,但没组成一个"有自己完整性"的独特文化模式。当透过不断失败的棱镜来看它

时，确切地说，它是更大社会的某种文化式样。实际上，把这里的婚姻看作是一连串的失败而非一连串配偶可能更有用，尤其是对那些关心改变的人来说。①

概要来说，这里异议的不是都市低收入黑人婚姻模式有没有涉及“一连串配偶”，而是这一连串配偶明显证实了那些人的文化独特性的含意所在。

很多已经在前面几章提到的也能以同样的观点来看待。依此看来，街角男人不会成为传统文化独立的传承者。他的行为举止与其说是作为实现独特目标和其自身亚文化价值乃至遵从自己文化式样的途径，不如说是努力实现更大社会诸多目标和价值，没有做到而对他人和自己又竭力掩饰其失败的方式。②

如果在掩藏其失败、掩藏连试试都不敢的过程中，他通过公众虚造的手段假装没把这些事当回事，并声称一直遵循着另一套规则和评价机制，那我们接受这种表面上的说法对他或我们自身没有任何好处。

我相信，这样一个参照框架，会让我们对本区域内发生的社会变迁的实际层面有更清晰的认识。我们不必把以下的作为要关注的问题：打破难以攻克的圈套，努力改变价值观，斩断亲子间的沟通渠道，使得父辈不能依自己的形象塑造孩子。没有这些，他们的文化才会被坚定不移地无限传递下去。毫无疑问，每一代的确为下一代提供了角色模板。然而，这些变迁产生的可能性中更具重要意义的是：下层黑人父子间（或者母女间）的很多相似之处并不是“文化传递”的结果，而是因为儿子在同一区域内，像父亲一样出于同样的原因，离开了家并独立经历了相同的失败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结果。那些看起来是动态的、自我维持的文化过程是，至少部分是，一架相对简单的社

---

① “这点很重要：我们不要把基本的生活机会和实际行动与基本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偏好相混淆……努力改变的焦点应当在背景条件和突发的偏离行为上，而不是在可能不同的阶级或文化价值观上。”（Lewis，1963：43）

② “……掩饰和自尊保护是社会交往的本质所在。”（Hughes，1958：43）

会机器，它能以相当机械化的方式自主生产出看起来相似的产品。在某些状况下，他注定要失败，这导致儿子依父亲的形象而塑造。问题是如何改变这些状况。

采取这种观点并不能把问题小而化之，而是用来把它放在一个更易操作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福利的背景中。这意味着贫穷实际上是力图把下层黑人融进“美国生活主流”的恰当目标，这赞成了一系列社会科学家的观点，从富兰克林·弗雷奇尔、贡纳·缪达尔到肯尼思·克拉克、理查德·克劳沃德，他们把黑人男性无力谋生和养家糊口作为下层黑人生活的核心事实。如果要改变这种生活方式，这个核心事实必须得到改变；这些黑人男性，与其他人一道，必须获得谋生的技能和把这种技能运用到工作中的机会。

没人能假装说这是件容易的事，能一蹴而就。对很多黑人男性来说，仅有一份工作是不足够的。在他能谋生前，他应当相信他确实能做到，他的女人和孩子们也应当和他一道坚信这点。没有她们的支持，他发现很难开始；而他还没开始的话，她们则觉得很难给予他支持。那么，开始无疑是缓慢的；可一旦开始了，成功也就自哺了，正如失败一样。[①]然而，一个开始必须得造出来，而且，在生命周期各个不同点上同时造出来。孩子们和年轻人应该有好的学校和好的老师，能给他们传授技能、进行训练以赢得岗位和职业；他们应当有相信他们并帮助他们相信自己的老师。成年人应当都有份足以养家糊口的工作，这样他们就能养家糊口了，这样年轻人就能看到变化的事实，这样年轻人和老者都能感受到这点并获得他们所生活的这个世

① “互相哺养”让人想到“恶性循环(the vicious circle)”模式，该模式作为贡纳·缪达尔分析美国黑人问题的主要解释方案。在《美国的困境》第1065页以下，恶性循环模式被深化为积累的原则，得到了详细阐述。“恶性循环理论与其说是悲观主义者的借口，不如说是乐观主义者的理由。积累原则在两个方向上皆起作用。”(第1069页)

界中的既有利益。①

尽管在这些事情是如何实现这点上有很多不同观点，但真正的问题却存在于别的地方。上百个研究和示范科研项目证明，我们有实现这些变化的专项技术。在经济机会办公室（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的赞助下，为达到这些目标而设计的大量项目已付诸实施，有些已在所选群体和个体身上见到了有益的效果。

缺少的并不是专项技术和项目，而是一个明确的目的、动机和意图。我们想要做什么，我们为什么想要做它，以及我们愿意为它付出多少（并不仅仅在金钱上，还在我们社会的阶级和种族结构的基本变化上），这些方面仍存在着很多未解决的问题。

例如，有些人说我们需要做的是从我们的国民生活（national life）中消除贫困，但也正是这些人，当有人提议年薪保证制（a guaranteed annual wage）将对消除贫困大有裨益时，他们却在恐惧中举手抗议。另外一些人对生活方式的关注胜过对贫困自身的关注。他们可能通过贫困项目，为穷人中那些愿意接受中产阶级行为方式（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特有）的人提供资金、建议和“致富”计划，借此来减少犯罪、儿童照管不良（child neglect）等现象。也有一部分人把贫困项目当作“胡萝卜-大棒”装置来挑选值得帮助的和不值得帮助的穷人，向前者伸出援助之手，向后者开战。还有一种广泛的忧虑认为，我们可能走得太远了，以至于扰乱了我们社会中不同部分间的关系，这些不同部分可能正为了整体利益而一起努力。这种顾虑最常见于那些从低技能劳动力供应库（pool）中直接获益的人。他们的论点大

① 对一些成年人来说，也许对大多数而言，这太迟了，但我们直到尽了所有努力之后才会知道对哪些人是这样。对那些太迟的人来说，应当用现金或闲职来赔偿，正如德国补偿给受纳粹迫害的幸存者，或我们补偿给在战争中剥夺了选举权、财产和被拘禁的日裔美国人，以及我们社会有时给误判进监狱的人赔偿一样，以差不多相同的方式，出于差不多相同的理由。他们的合作或中立，只需付出很小的代价。在我们现有的福利计划之下，以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不必一代接一代地去赔偿了，这让我们感到欣慰。

多从老道的分析和观察那里汲取力量，比如沃尔特·米勒的论点：

> 根本问题是：我们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对低技能劳动力有需求？……从哪里我们能得到那些工作的任职者，他们要在哪里接受必要的社会化和培训？在现有环境下，女性主导的儿童养育组合是这种低技能劳动力基本供应库的主要来源。它把他们带入世界，它给他们提供价值观、志向和低技能工作要求的心理构成（例如：对周期性失业的高度容忍；对极其无趣工作的耐心；关于工作、住所、关系模式的高机动性；在工作世界之外寻找生命满足感的能力）。①

确实，这些是根本的问题，在目前的秩序上来维持下层的现状，是解答根本问题的方法之一。然而，这个解答完全违背了国家对人民提出的希望和作出的承诺；在此解答中的那些处于我们社会下层的人，当他们还在子宫里时就已注定了他们的位置。

此外，如果“对极其无趣工作的耐心……机动性”和“在工作之外的世界中寻找生命满足感的能力”被理解为是意味着我们社会下层的人们甘心命运的摆弄，甚至感到心满意足的话，那这种理解则是对历史和新近发生事件的严重误读，并导致了一种臆说——认为改变他们人生境遇的动力不是来自于下层人们自己，而是来自道德家、慈善家、政治家和外部世界的其他人。涉及贫困项目的人们甚至可能为他们人道主义的工作感到幸运，这一工作宣称要帮助那些从来不要求得到帮助的人们。举例来说，下面是一份在穷人中广泛传播的培训次职业助手宣传册的前言中的一段话。在谈到国家反贫困和社区精神健康项目时，作者说到：

---

① 悉尼·伯纳德，《无父的家庭：他们的经济和社会适应性》的前言。

> 这些项目已经实施起来了，这无疑是专家和政治领袖们的功劳，是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先见之明、倡议的结果，而不是由苦难人们自己口头上的和条理化的需求促成的。①

像这样的自欺行为完全没用。恰是穷人的不满以及他们表达这种不满成为最近为改变穷人生活条件而努力的理由。拒绝认清和坦率陈述最近为帮助社会底层（at the bottom of）民众付出努力的自助特征，损害了相关的人，阻碍了真正的进步。如果黑人们必须伺候专家和政治领袖们的善意和慷慨——这点他们现在没做到，将来也不可能会做到——他们必须得等，保守一点来说，还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毫无疑问，在白人中产阶级中有很多善意存在；这种善意总是有，但其深度和广度从未（现在也未）充分到足以拟定一个邀请函——更不用说伸出援助之手——邀请黑人们来分享我们社会中的一切美好事物。比善意重要得多的是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私心，越来越肯定如果黑人不被允许，甚至不被鼓励来分享这些事物，无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的孩子也都无法继续享受这些事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已经丧失在这个区域采取行动的权力了。道义上的主动性早已转向黑人，政治上的主动性似乎也在向那个方向移动。对我们社会中某部分人来说，这可能是令人不安的，甚至是令人恐惧的发展。然而，从长远来看，黑人越是更快、更有效地组织起来，提升他们自身的利益，正像其他族群、宗教群体和劳工阶级之前做的那样，我们就越能更快、更有效地认清建设民主社会道路上的其他问题。

既然强权由白人中产阶级掌握，那么这种权力如何使用以应对由黑人群体发起的行动、黑人领导者阐明的需求，这个重大决断必须得做出了。大多数情况下，联邦政府的强权会很好地用于对行动主义者的支持。有时，和在沃茨（Watts）暴发的骚乱一样，如果这种强权难以使用的话，管制将会是最明智的

---

① Reiff and Riessman，1964：1.

选择。

在寻找能帮助我们作出反应的指南时，把奥登对20世纪的人的忠告牢牢记在心间对我们来说是有益的：

> 我们必须彼此相爱，否则就死去。（*We must love one another or die.*）

也许这对我们和其他人都要求太多了，或许我们只要表现出我们好像在做就够了。

附录　田野经历回顾[①]

罗伯特缓慢而充满感情地读着书，间或停下来，喝一大口杜松子酒，继而又喝些啤酒。隆尼安静而专注地听着，眨巴着眼睛盯着罗伯特，罗伯特根据每个角色不同而不断变化着他的声音，并用假声模仿着白雪公主。但我的兴致却开始游离，也许因为我已读过此书并看过电影。

突然，罗伯特提高了声音，惊得我拉回自己的注意力。我望了望隆尼，他正全神贯注眨巴着眼；我又看了看罗纳德，他头上裹了块手帕，左耳朵上戴着个金耳环，看起来就像故事里的海盗。我想，我和这两个家伙在一起究竟在干什么，喝着杜松子酒和啤酒，听着《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

我回想起导致这种情境的一切事宜。从这个角度而言，一切看起来都是如此平常而合乎情理。我拿起我那听啤酒，坐回位子上，继续听接下来的故事。罗伯特读得非常好。

（田野笔记，1962 年 4 月）

背　景

1962 年 1 月 1 日，我加入儿童抚养研究项目（Child Rearing

---

① 这一章的形式略微有点不同，原是为美国国家都会地区健康福利委员会的儿童抚养研究所写。

Study Project)时,由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赞助的关于"哥伦比亚特区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抚养习惯"的研究已运作到第三个年头。我的工作是收集关于低收入成年男性的田野资料,完善已经通过家庭访谈建立起来的数据库。

从一开始,我就为能与下层黑人在一起工作备感舒适。我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出生并长大,我父母亲都是从东欧移民过来的犹太人——母亲来自拉脱维亚(Latvia),父亲来自俄国。父亲是个食品杂货商,我们住在他经营的各种各样杂货店铺的楼上或店铺后面。所有的店主要是在黑人区域。

学校和操场是白人的,但我们所有的顾客和大多数邻居都是黑人。他们以及他们的孩子中间,有我认识的熟人、玩伴和朋友。想起在学校、运动场和家里,种族分界线(color line)始终存在;但我在商店里、街上,偶尔是在他们家里与黑人男性、女人和孩子之间的交往中,这道分界线也存在;当我在山姆的住处看掷骰子游戏时;当我坐在临街教堂里的后排座椅上亲眼看到一个女人在地板上打着滚,邪恶之物(devil being)从她身上被驱除出来时;当我在黑漆漆的走廊里为了几个便士而掷骰子时;当我和本顿坐在路边,无所事事地戳着垃圾,等着有趣的事情发生时。直到17岁参军到海军陆战队(Marine Corps),我才开始进入一个完全的白人世界。

准备田野

第一个星期我让自己熟悉这个项目以及业已完成的工作。我与这个项目的负责人黑仑·刘易斯博士进行了几次非正式的讨论,逐渐对需要什么类型的材料有了感觉。重要的是,如果我自由摸索几星期并找到正合我意的方法,工作就可以很好地完成,在这样的预期上,刘易斯博士没有制定严格和周密的基本规则。他的指示就是工作始终以项目的目标为导向,也要铭记"一切都是有利的"。我现在回想到这点,他的指示与他喜欢的一句引言间有很明显的相关性:"科学方法就是最大可能

地用脑子来做事，没有什么限制。”

我部分领会了项目的资料，告诉负责人我已做好开始的准备。他说一个区域可能是“一试身手的好地方”。他的指示就是：“去那儿，像人类学家那样做！”

“去那儿”完全也不像在位于哈得孙湾（Hudson Bay）威尼斯克的印第安村庄那样，我曾经在那儿做过田野。我一点也不能肯定怎样用这种“去那儿”的方式“像人类学家那样做”。也许带着点渴望，我想，那应该是多么纯粹的一件事啊，如果人类学家还像他们在30年代早期所做的那样，还限于研究“整体”（wholes）、一个部落、一个村庄，或其他有着明显界限、小到通过直接观察就能囊括其全部的社会单元。

当我正考虑我将要做什么时，我想到理查德·斯洛博丁在1960年夏为儿童抚养研究所做的工作。[①] 为了试图找到社区以及家庭在儿童抚养上的影响，负责人指派斯洛博丁去华盛顿西北部一个孤立的街区“像人类学家那样做”。这对我来说意味着我可以以他的工作为模范，在一年时间内，做几个这样的研究，每个研究涵盖低收入男性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我想做一个社区研究，接着继续下去的话，做一个建筑工人工会研究，再接着对走私联盟进行研究。也许围绕这些，会有一系列的谱系研究和生活史问世。在让自己受制于一个明确的行动计划前，我打算给自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商业中心区游荡，寻找对事物的感觉。

在田野

听取了负责人所说的这将是“一试身手的好地方”的意见，我深入到这个地方，完全把自己投入进去，并计划做三四个独立的、有自己完整清晰分界线的研究，然后以完美收场。我第一次进入这条街道时——只是为了闲逛、感受一些事物，并

---

① Slobodin，1960.

布置我田野工作的路线——离街角我出发的地方至多一两个街区远。刚开始的几个星期甚至是几天里，我就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其中了；我田野工作的主要路线在不知不觉中也已经布置妥当。接下来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以及之后断断续续的时间里，我的活动基地都是我最初出发点对面的街角外卖店。

第一次外出时，我走出还不到一个街区，就看到街上有一场骚乱。一个男人（后来知道是韦斯利侦探）正拖着一个拳打脚踢大声尖叫的女人往报警亭走。一小群人分别聚集在四个街角看着这一幕。我靠近其中两个男人，问他们这个女人做了什么。他们俩也不是很清楚，其中年轻点的说他听过两个故事，接下来全都告诉了我，最后说他通过观察认识韦斯利侦探已经六七年了，"没人能愚弄"得了他。

我说有时像警察那样逮人似乎更像个男人。这句话引出了一场有关警察的讨论，我们每个人都把个人经验和一些道听途说之事加入话题中。讨论了十至十五分钟后，年纪大的男人说了声再见离开了，年轻的继续留在那里。我们所站之处街对面是闹区咖啡馆（Downtown Cafe）。我提议我们进去喝点咖啡，他同意了。当我们过马路时，他问我是不是警察。我告诉他不是的，并解释说我在做一项关于这个城市家庭生活的调查。这样，关于我是谁以及我为什么会在那里，就不再有什么疑义了。我们在咖啡馆坐了好几个小时，边喝咖啡边聊天。

我虽然没有完成我原计划要做的事，但这仅仅是第一天而已。而且，当我那天晚上写这次经历时，我感觉到恰好呈现了这个年轻男人的写照，并且大多数材料都切中要点。我决定明天回归我的原定计划，一切皆完好无损。

但明天一直没有来。第二天早上九点钟，我径直去了同一条街道。四个男人站在外卖店前，聚在一起。

三个是酒鬼，四十来岁，每个人脸上和脖子上都有老疤痕，穿着破旧，但还清醒着。第四个男人大概三十二三岁，看起来好像刚从一本华而不实的杂志广告里走出来似的……其中有个酒鬼外套里还包着一条一个月大的小狗，

只有狗头露在外面。

这群人靠近我，其中年长的那个说："这只小狗多漂亮啊！"我说："是，它很漂亮。"并开始拍拍狗。"是他刚买的，"有个男人说。"我还想买条母的，一起养，"抱着狗的男人说，"但那个女人，她把母的卖给她朋友了。"

小狗叫了起来。"可能饿了，"年长的那个说，"给它买个汉堡吧！""拜托，伙计，吃了那东西它会长寄生虫的。"另一个人说。我建议给它喝牛奶，于是我们走进外卖店。我向服务员要了半品脱牛奶，那个男人要了个碟子。"你们不能在这里喂它。"服务员说，"否则，健康部门会把我们这个店关闭的。"她给了我们一个纸盘子和牛奶（我付的钱）。我们把小狗带到相邻的走廊里喂它。看着小狗急切地喝着牛奶，每个人都很开心。

有个原本在外卖店的男人也到走廊里加入我们："那是只牧羊犬，是不是？我也刚好想给我小儿子买一条。"我说："我想给我小女儿买一条，但她对一切动物、灰尘和太多东西都过敏。""最好是那样，"一个酒鬼说，"她会变好的。但是伙计，如果在你完全长大前你还没有过敏过——伙计，你得小心了。""是的，确实如此，"新加入的人同意道。"我知道有个女的，长大后才过敏，她因此而得了支气管哮喘病。"

那只狗喝完了牛奶。主人把它放回大衣里，我和酒鬼们一一握手后，分三路走开了。酒鬼们沿街上行了，穿着入时的男人往下走了，新加入的男人（就是后来的泰利·杰克逊）和我走进了外卖店。

泰利和我在外卖店里逗留了四个多小时，我们聊着天、喝着咖啡、看着人们进进出出，看着其他的食客，看他们与女服务员互相逗乐取笑，或他们之间互相取闹，或跟着自动电唱机跳舞。每个人都认识泰利，有些人也时常吸引他的注意力。泰利有时也加入打闹队伍里，但我们谈话时，通常不会受到打扰。两点钟离开外卖店时，我和泰利已经直呼对方名字了（"艾略

特(Elliot)”对他来说很陌生，于是我们商定了用“埃里克斯(Ellix)”)，我还能很自然地叫出两位女服务员的名字。除此之外，我也开始识别出其他几个男人的名字或昵称，有了发展私人关系的迹象，并对泰利的过往历史有了大概了解(后来才知道部分是不真实的)。

回到街上，我在闹区咖啡馆结束一天的生活，这次，遇到了早上那条小狗的主人，他现在已经喝醉了，站在进门的地方。那条小狗是我们的纽带，我们用自己都没意识到的热情兴致勃勃地谈论它。接着，和这条小狗插曲也有关的那个穿着考究的男人进来了，坐在吧台前我的旁边。我在吧椅上继续喝着啤酒，很快又接连遇到另两个男人。第一个男人因为在餐馆有份夜班打杂工作，所以很快离开了。另一个是个三十五六岁的粗野男人，他在我旁边的吧椅上坐下，先和我搭讪，问我做什么工作，还说他前天见到我在街上观察韦斯利侦探拖着那个女人穿过街道。

我简短地告诉他我的工作所在。

“呃，只要你在这里闲逛，就会看到一切。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任何事都在这里发生。它可能很难对付，你会因此四处碰壁。不过你会没事的，只要你在这里认识一到两个合适的人。”

“说得有道理。”我对他说，猜想(并希望)他就是“合适的人”之一。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友好的，而且有点左撇子更给了我安全感。

第二天结束时，我已经遇到九个男人，知道了其中几个人名，并花了几个小时公开和几个男人近距离交往，对至少两个人熟悉有加。在我的意识里，也许最重要的是我已经部分抛弃了自己是个陌生人的感觉，并且有了些许归属感，这点归属感可以允许我采用一种轻松的方式和想法，这对建立个人关系很重要。

接下来三到四个星期，我又造访了其他几个相邻区域，并以闹区咖啡馆和外卖店为不定期据点，进一步了解了一些人并结识了一些新人。我时常在外卖店吃早、午餐，间或会投一角

硬币到自动唱片点唱机和弹球机里。特德·摩尔(Ted Moore)总是和我交替着买咖啡和油炸圈饼。他在附近一家酒水店工作,我第一次遇到他是在外卖店,当时他正在等外卖店开门。那个在闹区咖啡馆告诉我只要我认识"一到两个合适的人"就"没事"的男人,公开承认我是他的朋友。("我当然认识他,"他当着我的面这样对另一个男人说。"我们有一天聊了很长时间。他是我的朋友,他很好,伙计,他很好。开始时我还以为他是个警察,但他绝对不是。他很好。")

总而言之,我觉得自己在有条不紊地前进着。然而,对我的怀疑和不信任依然存在。至少有两个在外卖店附近闲逛的男人(其中有个是当地数字人),近距离见过我若干次,但他们依然保持着他们的距离,同时我也保持着我的分寸。偶然地,有一次我在走进店时,感觉到那个数字人的眼睛在看着我。我们互相凝视了三四秒,我向他微微点头示意,他依然盯着我。我继续干我的事,暗暗决定下次再也不会让他盯得垂下眼睛了,并且再也不会向他点头了,除非他先向我点头。没过多久,我做到了。

二月中旬的一天,我走进外卖店。

> ……泰利在喝咖啡。"喂,"他说,"这是什么地方?"泰利从信封里拿出一张纸递给我。这是一张传票,要求在合众国诉隆尼·雷金纳德·斯莫尔(Lonny Reginald Small)案中作为见证人提供辩护。一个模糊的邮戳表明,泰利被传唤于今天早上十点钟在位于西北部的第三大道和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的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地区法院出庭。我读出地址,那时已经九点四十分了。我建议泰利打车去,但泰利说他没钱,于是我答应开车带他去。他很爽快地接受了。在路上,泰利解释说隆尼是他的一个朋友,他因去年夏天杀死了妻子而被审判。"隆尼是个不错的家伙,"他说,"他是个十足的好人。"

于是我们开始了三周的冒险探索,进入了隆尼的世界。隆

尼是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无意间把妻子窒息致死，后来法庭判决的结果是“无罪”。虽然宣判无罪，但隆尼因为违背了（关于之前所犯的重大盗窃犯罪案）缓刑条例的权限而再次当庭被捕。他宣布放弃了引渡，接受了一次听证会，根据出庭保证他被释放了，又举行一次听证会后，他再次被判为缓刑。

不知不觉地，我和泰利的交往，再通过他和隆尼的交往，使得我成为隆尼生命中一个主要角色。与泰利一起度过整个审判过程，我发现首先是泰利，继而隆尼，都从我这寻求指导，比如在放弃引渡这一问题上作出决定。法庭官员，明显该从隆尼那里取得辩词，也开始把我当作他的代言人。

接下来至少两个星期内，对隆尼案件的调查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也把我带往很多地方，接触了很多人。这段时期内，我与项目负责人保持频繁接触，逐渐弄清并权衡了我不断与当地政府打交道的可能后果。这期间我去了三个不同的监狱，在法庭上耐着性子听完了一个谋杀案的一场审判和两场听证会，并为其中一场作证。我去了担保人的办公室，去了美国就业服务处（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去了真福马丁·德·色瑞斯旅馆（为无家男人准备），还去了其他几个私人住处。我约见警察、法官、律师、担保人、缓刑监督官以及隆尼以前的一位雇主。我与他的朋友以及与至少一位敌人（即他的岳母，她的女儿被隆尼杀了）谈话。我与隆尼大家庭的大多数成员都在各自家的会客厅里见过几次面，他们也都接受了我，把我当作隆尼的朋友，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泰利的关系。我还分别开车带他们去其他亲戚家筹集隆尼的担保费。

其间，再来说外卖店，泰利和我晚上会在这碰头，白天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在这里逗留，我见过的或者见过没说过话的都会围到我身边问：“隆尼出来了吗？”或“你为他加保释金了吗？”再或者简单地问句：“事情怎么样了？”巴姆杜多，那个数字人，不认识隆尼的人之一，也格外关注隆尼的安危。同时，他也开始直呼我的名字了，虽然我没有记录这点，但我想正是这一次，玩数字游戏我在场时，他放弃了要花招，并且很快接受我赌的数字。

到三月中旬时，泰利和我已成了亲密的朋友（亲密无间），“任何时候”如果我想知道或需要“任何东西”，我会让他知道的。到四月时，我已经对一批男人相当了解了，他们接受我的程度到了我在任何时刻不需要任何理由和借口就能随意地进出他们居住或闲呆的房间或公寓。像其他朋友一样，我在那里消磨时间，到处闲逛，看看四周在“发生什么”。

我调整了我的作息时间，使其与日工的闲暇时间一致：从下午四点开始直到深夜，具体根据发生的事而定。我有时独自一人，有时和一个、两个到六个人一道，去台球厅、酒吧或某人的房间或公寓。大多数的时间我们只是在外卖店附近闲逛，玩玩弹球机，或站在街角看着身边的世界。通常情况下，每天下午五点，当他们下班回来后我都会和我的五个“酒伴儿”碰头，我们走进一个走廊，好好喝上一个小时左右并轻松地聊天。

从星期五下午到星期天晚上是尤其令人激动而富有成效的。我可以去南希的“地盘”（公寓），在那儿，差不多一个小时内，人们可以喝酒、听音乐或谈话。或者我们中的七八个人买上一些啤酒和威士忌来到位于外卖店附近唐克的公寓，他和他妻子住在那里。有时，我会与一到两个男人结伴去参加聚会、看个电影或玩次双骰子赌博（这几乎在每个城镇都很流行）。星期天下午的时间尤其好，可以收集新闻或之前 48 小时内发生的事件。人们大多从昨晚的休息中恢复过来，很放松地彼此间互相播报发生的事件，其中有关于警察的、夫妻关系破裂的、食宿安排的、醉酒引发的事端、性冒险以及他们周五周六目击、听闻或参加的各种聚会。

到四月时，大多数人看起来都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属于这个区域了。至少有两个男人不相信或不喜欢我，但到那时，我已有足够的力量为确立我在那里的权利而与他们成功地对抗，甚至他们不得不选择接受我。新人不断地搬进这个地区，而我发现自己已被当作老资格的人了，有时还被邀请证实我来之前的一些事。

在这段时期内，我的田野观察都关注在个体上：他们说了什么，他们做了什么，以及他们所说所做的背景。我不断地探

索着他们，也被他们探索着。

我的田野笔记包括一份我观察泰利、理查德、海猫和其他人时亲眼所见的记录。而他们看我时又看到了什么，对此，我只有一个小想法（我自己觉得只是个猜想）。

然而，有些事则是非常清晰的。首先，他们看见了一个白人男性。我觉得关于肤色这个无情的事实，因为他们根据他们的经历来理解，我根据我的立场来理解，足以无法挽回地彻底地把我降到局外人的地位。我不能确定，但有个直觉，他们比我更加持续地意识到肤色的差异。举例来说，我们四个人围坐在厨房桌子旁时，我看见的是三个黑人，而他们每个人看见的则是两个黑人和一个白人。

有时，黑鬼（nigger，此称呼被看作是对黑人的极大侮辱——译者注）这个词被随意地或日常性地使用。有时，当和几个男人站在街角时，其中一个会和过路的白人争吵几句，并喊道“操你妈的白人”。我习惯于思索，或许我不是我所认为的那样是个完全的局外人。后来发生的某些事，以及对田野资料的阅读，使我从这种特定的轻微自负中醒悟。

不管何时，我是白人这个事实被公开提出时，它无形中就指出了我和其他人之间的距离，即使有时提出的本意我相信是为了缩短那个距离。

……我们一起离开泰利家时，泰利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到临街教堂旁说：“我有话要和你说。”没有进一步的开场白，他径直盯着我就开始说了。

“我是个撒谎者。我一直以来都在骗你，现在我要改正过来，即使我们因此不能再成为朋友。有一件事我对你撒谎了，其他我告诉你的事都是事实。但即使我只对你撒了一次谎，那已使我成了撒谎的人。我知道有的白人认为只要你被别人蒙了一次，往后你就不该相信他了。即使你也这样认为我还是得告诉你。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来这儿时，我告诉你……哦，那是个谎话……开始的时候我不以为然，但后来你和我一起四处走访，我们真正变得亲密起

来,我的良心开始鞭笞我。我一直都想找个时间告诉你,但一直都没合适的机会。今晚……我知道这是个合适的时间。我知道你迟早会发现的,但我不想你从别人那里发现这点……"

有一次我和理查德一起到他家乡,这是他五年来第一次回乡。我们半夜时分到的,天亮前必须离开,因为理查德正被当地警察局通缉。我们在他祖母的家里,除了理查德外,还有他的祖母、姑姑和两个不相干但都是理查德长期朋友的男人。

大家商讨了理查德回家呆的可能性并权衡了可能的结果。在讨论中,理查德打断了大家并向我点头说:"现在,埃里克斯在这里,你们也见到了他是个白人,但他是我最好的一个朋友。他和我是真正的朋友。你们可以当着他的面说任何想说的话。他很不错。""噢,"他的姑姑珀尔说,"我一直就说有些白人还是不错的。"

即使有很多诸如这样的说法:"我最好的朋友是……"、"是的,但是你不同",但我们之间的壁垒还是存在的;更准确点来说,那是一道锁链连接的樊篱,尽管存在这个障碍,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对方,各自沿着自己的一侧边走边谈,偶尔会有手指接触。当两个人分别在樊篱两边挨得很近地站立着,即使没有触碰它,他们仍能通过空隙看见对方并忘记他们是透过樊篱在看。

作为一个白人的缺陷部分被这样的事实抵消:作为一个局外人,我不参与竞争。因此,就肤色而言,我从不把自己放在由黑到浅(亮)肤色范围内;我完全没有在意这点,没有丝毫兴趣。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一些人能比较随意地和我谈论肤色。

你知道的,我是我们家族最黑的。我所有的姑姑、叔叔,每个人肤色都较浅,他们都瞧不起我,除了我祖母……她为我做一切事,也许是因为他看到别人都和我作对吧……只要我一来,我就一直都希望有人能有个比我还黑的小孩。

然而每当看着我时，这个区域我认识的人可能看见的不只是个"白种成年男人"。他们同时也看到或知道其他事，任何其中一件都能把我降到局外人地位上。比如那些我经常接触了解的人，知道我和他们在一起是因为和他们在一起就是我的工作；并且他们根据他们各自理解以及我沟通的能力，也知道我的工作何在。他们知道我住在这个区域外，他们知道我是个大学毕业生，或最起码他们把高等教育和我所做的工作联系在一起。此外，很明显对我而言，我不是很熟悉他们的语言。因此，我是个局外人，不仅因为种族的原因，而且因为职业、教育、居住地和语言的原因。而我是犹太人的事实只显露了两次。一次是一个在这里工作但不住在这里的男人对我说了些依地语，因为他说"我觉得你像个犹太人。"第二次是我在一个当地走私点那儿遇到一个士兵，我们谈了大概十分钟，他问我是否是意大利人时，我告诉他我是犹太人。"那太好了，"他说，"我很高兴你不是白人。"

事实上我已经结婚了，也做了父亲，并且我比普通人块头要大——6 英尺 1 英寸，185 磅，也许这没什么关系，除非他们的某个个体不经意间与我建立了个人关系。大多数和我在一起的人从二十岁到四十五六岁不等，我想我的年龄（三十七岁）不显眼。

在几个不同的原因上，我是个局外人①，但我也是个完整意义上的参与者。我所观察的人们知道我在观察他们，但他们还是允许我参加他们的活动并一定程度上进入他们的生活，这点我还在惊讶。一些人"剥夺"了我，不是因为把我当作了一个局

① 一开始时，我已经做好决定，绝不为钱掷骰子、打台球、玩牌或以任何方式赌钱（拿报刊上的某些数字来赌博除外，因为玩数字赌博是安全的不带个人色彩的行为），并且很小心地避免被任何人哪怕是一点点怀疑与某个女人有染。这些自己强加的限制一定程度上确实突出了我的边缘性。我的工作让我经受不起纷争和不好的情感的卷入，这一样的解释通常被接受，我一般就有借口不参与这些活动，而不是被他们排除在外。

外人，而是我一般拥有比他们更多的资源。当他们中的某个人拥有资源时（比如说钱或车），他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受到“剥夺”。我通常尽量把我提供的钱和其他帮助做这样的限定：我觉得每个人都会从另一个朋友那里得到，如果这位朋友拥有与我一样的资源的话。我尽可能满足要求，只要不惹人注意。但我并不总是以给予为目的，一定程度上我还学着慢慢接受食物或接受别人招待我的饮料，尽管我知道这比做一个给予者来得难。

在田野时，我尽我所能地全身心地投入，仅受我对个人的职业的适当性的感知的限制，还囿于我所认为的可接受行为的界线，这些界线被与我交往的人看到。

有时，当我打算对一段谈话、一个地区、一间公寓或一个社会事件做物理描述时，我尽量只是作为一个观察者。但实际上，我发现只以一个纯粹观察者角色去跟踪一切参与性活动是不可能的。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带着只做观察者的念头，我去了国会大厦广场（Capitol Arena）的一个舞会，那里聚集了一千多人。我是唯一的白人，这是我第一次到这样的场合，音乐对我来说是如此陌生以致跳错了节拍，甚至还有几款乐队的乐器我从未见过。我成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观察者。这里有一些从田野观察摘录的文字：

> 天气很热，周围很嘈杂，味道也不好闻，但一切却激动人心。在这样的地方做一个简单的观察者是不可能的，即使像我这样镇定自若的人。杰克·威尔森开唱后不到几分钟，我发现噪音不再那么响了，热度也不再那么高了，从一千多人的人群中散发出来的气味一点也不强烈了。像其他人一样，我需要再来点什么。

几乎从一开始，我尽我所能采用我最经常接触到的人们的穿着、言谈方式，使自己看起来不太傻或不那么不自在。我毫不费力就能与他们着装相似（在温暖的天气里，T恤或运动衫，

卡其裤或其他宽松的裤子)。我的词汇和发音也变化了,但不是很彻底。骂骂咧咧并时不时地文法不通地造句说话(他们做得更轻松),并没有使我的适应性和街角语言混淆起来。这样,我在言谈上也许还有穿着上仍然显眼,尽管如此,我还是模糊了我的某些背景特征。我可能让自己更易接近了,悬定让自己更接受自己了。我强烈认识到这最后一点是有天晚上,在去往一个专业会议的路上,我穿着正装打着领带中途停在外卖店外。我感觉十分别扭,这使我清楚地意识到在着装、语言以及一般礼仪上的变化对我来说影响是很大的,对别人来说也是很大的。

回想起来,一个人多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参与者,既关系到他自己对作为参与者的觉察,也关系到他人对他作为参与者的接受。

参考文献

Bazelon, David L. Address to the Federal Bar Association, National Press Club, Washington, D. C., April 30, 1963. (Mimeographed)

Becker, Howard S. "Problems of Inference and Proof in Participant-Observ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XXIII, No. 6 (Dec. 1958), 652-660.

Bendix, Reinhart, and Seymour M. Lipset, eds. *Class, Status and Power*.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3.

Blood, Robert O., and Donald M. Wolfe. *Husband and Wives: The Dynamics of Married Living*.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60.

Bott, Elizabeth. *Family and Social Network*.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Ltd., 1957.

Burgess, E. W., and D. J. Bogue, eds. *Contributions to Urban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

Chandler, Margaret.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Workers in a Rooming House Area."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48.

Cloward, Richard A., and Lloyd E. Ohlin. *Delinquency and Opportunity: A Theory of Delinquent Gangs*.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60.

Cohen, Albert K. *Delinquent Boys*.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5.

Cohen, Albert K., and Harold Hodges, J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wer-Blue-Collar-Class," *Social Problems*, X, No. 4 (1963), 303-334.

Davis, Allison. "The Motivation of the Underprivileged Worker." Ch. V of William F. Whyte, ed., *Industry and Society*. New York: McGraw-Hill, 1946.

Drake, St. Clair, and Horace Cayton. *Black Metropoli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5.

Frazier, E. Franklin. *The Negro Family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9.

Gans, Herbert J. *The Urban Villager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2.

——. "The Negro Family: Reflections on the Moynihan Report," *Commonweal*, LXXXIII, No. 2 (Oct. 15, 1965), 47-51.

Gladwin, Thomas. "The Anthropologist's View of Poverty", in 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Welfare, *The Social Welfare Forum*, 196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73-86.

Health and Welfare Council of the National Capital Area *1960 Index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privation of Neighborhoods in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Henry, Jules. "The Personal Community and Its Invariant Properti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LX, No. 5 (Oct. 1958), 827-831.

Hoebel, E. Adamson. *The Law of Primitive Man: A Study in Comparative Legal Dynam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Hughes, Everett C. *Men and Their Work*.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8.

Inkeles, Alex. "Industrial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LXVI, No. 1 (July, 1960), 1-31.

Kinsey, Alfred C., Wardell B. Pomeroy, and Clyde E. Martin.

"Social Level and Sexual Outlet," in Reinhart Bendix and Seymour M. Lipset, eds. *Class, Status and Power*.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3, pp. 300-308.

Klein, Josephine. *Samples from English Cultures*. 2 vol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5.

Lewis, Hylan. "Culture, Class and the Behavior of Low Income Families." Paper prepared for Conference on Views of Lower Class Culture, New York City, June 27-29, 1963. (Mimeographed)

——. "Discussion of [Marian R. Yarrow's] 'Problems of Methods in Family Stud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Welfare, New York City, May 29, 1962. (Mimeographed)

Lewis, Oscar. *The Children of Sanchez::Autobiography of a Mexican Famil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

——. "Further Observations on the Folk – Urban Continuum and Urbaniz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Mexico City." N. d. (Mimeographed)

Merton, Robert K.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Rev. ed.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7.

Miller, Herman P. *Rich Man, Poor Man*. New York: Crowell, 1964.

Miller, S. M. "The American Lower Classes: A Typological Approach," Jan. 1963. (Mimeographed)

Miller, S. M., and Frank Riessman. "The Working Class Subculture: A New View," *Social Problems*, IX, No. 1 (1961), 86-97.

Miller, Walter B. "Cultural Features of An Urban Lower Class Community." U. S. Public Health Service, 1957. (Mimeographed)

——. "Implications of Urban Lower-Class Culture for Social Work," *Social Service Review*, XXXIII, No. 3, (Sept. 1959),

pp. 219-236.

——. "Lower Class Culture as a Generating Milieu of Deliquenc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XIV, No. 3, (1958), pp. 5-19.

——. Foreword to Sydney E. Bernard, *Fatherless Families: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Adjustment*. Brandeis University Papers in Social Welfare, No. 7. 1964.

Myrdal, Gunnar, with Richard Sterner and Arnold Rose. *An American Dilemma*. New York: Harper, 1944.

Nadel, S. F. *Th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7.

Orshansky, Mollie. "Counting the Poor: Another Look at the Poverty Profile," *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Jan. 1965), pp. 3-29.

Rainwater, Lee. "Work and Identity in the Lower Class." Paper prepared for Washington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Planning for the Quality of Urban Life, April, 1965. (Mimeographed)

——. "Work and Identity in the Lower Class," in Sam Bass Warner, Jr., *Planning for a Nation of Cities*. Cambridge: Forthcoming.

Reiff, Robert, and Frank Riessman. "The Indigenous Nonprofessional: A Strategy of Change in Community Action and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Programs." National Institute of Labor Education Mental Health Program, Report Number 3, Nov. 1964. (Mimeographed)

Robb, J. H. *Working-Class Anti-Semite*. London: Tavistock, 1954.

Rodman, Hyman. "The Lower-Class Value Stretch," *Social Forces*, XLII No. 2 (Dec. 1963), 205-215.

Rohrer, John and Munro Edmonson. *The Eighth Generation: Cultures and Personalities of New Orleans Negro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0.

Rosenberg, Morris.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 Prince-

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Sherif, Muzafer and Carolyn. "Youth in Their Groups in Different Setting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on Views of Lower Class Culture, New York City, June 27-29, 1963. (Mimeographed)

Slobodin, Richard. "'Upton Square': A Field Report and Commentary." Child Rearing Study, Health and Welfare Council of the National Capital Area, 1960. (Mimeographed)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Methodology and Score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Working Paper No. 15, Washington, D. C., 1963.

U. S. Department of Labor, Office of Policy Planning and Research. *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 (The Moynihan Report). March, 1965.

Whyte, William Foote. *Street Corner Society*.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5.

——. "On Street Corner Society," in E. W. Burgess and D. J. Bogue, eds., *Contributions to Urban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p. 256-268.

——. "A Slum Sex Code," in Reinhart Bendix and Seymour Lipset, eds., *Class, Status and Power*.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3, pp. 308-316.

——, ed. *Industry and Society*. New York: McGraw-Hill, 1946.

专有名称汉英对照表

人名汉英对照表(以首汉字拼音为序)

阿尔弗雷德·金赛	Alfred C. Kinsey
埃弗里特·C.休斯	Everett C. Hughes
埃里克斯	Ellix
艾伯特·科恩	Albert K. Cohen
艾里逊·戴维斯	Allison Davis
艾琳	Irene
艾略特·列堡	Elliot Liebow
艾玛·卢	Emma Lou
爱德华	Edward
安德森	Anderson
奥德丽·丝普伦格	Audrey Sprenger
奥登	W. H Auden
奥林	Ohlin
奥马尔·海亚姆	Omar Khayyam
奥斯卡·刘易斯	Oscar Lewis
巴迪	Buddy
巴姆杜多	Bumdoodle
邦迪克斯	Bendix
贝蒂	Betty
贝弗莉	Beverly
本顿	Benton
本斯顿	Bunston
波利	Boley
波默罗依	Pomeroy
伯妮斯	Bernice
博纳维尔	Bonneville

布德	Budder
布莱克·穆兹莱姆	Black Moozlem
达蒙	Damon
大卫·L.贝兹伦	David L. Bazelon
丹尼尔	Duneier
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德里克·罗默	Derek Roemer
杜·博伊斯	W. E. B. Du Bois
E·弗兰克林·弗雷泽	E. Franklin. Frazier
厄尔	Earl
弗吉利亚	Virginia
弗兰克·利斯曼	Frank Riessman
弗朗西斯·格林菲尔德	Francis Greenfield
弗洛拉	Flora
福雷斯特	Forester
富兰克林·弗雷奇尔	E. Franklin Frazier
戈特弗里德·朗	Gottfried Lang
格洛里亚	Gloria
贡纳·缪达尔	Gunnar Myrdal
哈利·霍哲	Harry Holzer
哈罗德·戈德史密斯	Harold Goldsmith
海曼·罗德曼	Hyman Rodman
海猫	Sea Cat
贺瑞斯·卡亚顿	Horace Cayton
赫伯特·J.甘斯	Herbert J. Gans
赫伯特·甘斯	Herbert Gans
赫尔曼·P.米勒	Herman P. Miller
黑仑·刘易斯	Hylan Lewis
华康德	Wacquant
霍贝尔	E. Adamson Hoebel
霍菲尔德	Wesley Newcombe Hohfeld
霍华德·S.贝克尔	Howard S. Becker

霍奇斯	Hodges
J. H. 罗伯	J. H. Robb
贾纳・弗兰纳里・赫茨菲尔德	Regina Flannery Herzfeld
贾斯珀・英格索尔	Jasper Ingersoll
杰克・威尔森	Jackie Wilson
杰西	Jessie
金赛	Kinsey
卡尔文	Calvin
卡罗尔	Carol
卡罗尔・斯塔克	Carol Stack
卡罗琳・谢里夫	Carolyn Sherif
卡斯・克莱	Cassius Clay
科恩	Cohen
克德菲尔德	Coldfield
克拉伦斯	Clarence
克莱德・马丁	Clyde E. Martin
克利夫兰	Cleveland
克洛沃德	Cloward
肯尼思・克拉克	Kenneth Clark
拉尔夫・埃里森	Ralph Ellison
拉尔夫・艾利森	Ralph Ellison
劳埃德・奥林	Lloyd Ohlin
乐华	Lerory
雷蒙德	Raymond
莉娜	Lena
李・雷恩沃特	Lee Rainwater
以里亚・安德森	Elijah Anderson
理查德	Richard
理查德・克洛沃德	Richard Cloward
理查德・斯洛博丁	Richard Slobodin
琳达	Linda
隆尼	Lonny

隆尼·雷金纳德·斯莫尔	Lonny Reginald Small
路易丝	Louise
露拉	Louella
露西尔	Lucille
罗伯特	Robert
罗伯特·K. 默顿	Robert K. Merton
罗伯特·布拉德	Robert O. Blood
罗伯特·雷福	Robert Reiff
罗伯特·雪罗	Robert Shellow
罗彻斯特	Rochester
罗蕾娜	Lorena
罗伊克·瓦克昆特	Loic Wacquant
洛根	Logan
马丁	Martin
马文·席琳	Marvin Cline
玛尔维娜	Malvina
玛格丽特·钱德勒	Margaret Chandler
迈克尔·肯尼	Michael Kenny
孟若·爱德蒙森	Munro Edmonson
米尔顿·萧尔	Milton Shore
米切尔·丹尼尔	Mitchell Duneirer
莫里斯·罗斯伯	Morris Rosenberg
莫伊尼汉	Moynihan
默顿	Merton
默利·奥珊斯基	Molli Orshansky
穆扎费尔	Muzafer
纳森·凯菲茨	Nathan Keyfitz
南希	Nancy
帕特丽夏·克拉夫	Patricia Clough
皮西厄斯	Pythias
珀尔	Pearl
普雷斯顿	Preston

普丽西拉	Priscilla
琼·斯奈德	Joan Snyder
S. F. 纳德利	S. F. Nadel
S. M. 米勒	S. M. Miller
萨德本	Sutpen
萨拉	Sara
萨利	Sally
沙琳	Charlene
圣·克莱尔·德雷克	St. Clair Drake
斯蒂芬·T. 博格斯	Stephen T. Boggs
斯杜皮	Stoopy
斯坦顿	Stanton
斯威特	Sweets
泰利	Tally
汤米	Tommy
唐克	Tonk
唐纳德	Donald
唐纳德·博格	Donald Bogue
唐纳德·伍尔夫	Donald M. Wolfe
桃瑞丝	Doris
特德·摩尔	Ted Moore
托马斯·格拉德温	Thomas Gladwin
威·汤姆	Wee Tom
威廉	William
威廉·福克纳	William Faulkner
威廉·富特·怀特	William Foote Whyte
威廉·沃森	William Watson
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	William Julius Wilson
韦斯利	Wesley
维尔玛	Velma
沃德·波莫洛以	Wardell B. Pomeroy
沃尔特·米勒	Walter Miller

伍德斯通	Woodston
西尔玛	Thelma
西赛瑞恩	Siserene
悉尼・伯纳德	Sydney E. Bernard
小奥尔福德・扬	Alford Young Jr.
小哈罗德・霍奇斯	Harold Hodges, Jr
亚历克斯・英格尔斯	Alex Inkeles
亚瑟	Arthur
伊丽莎白・伯特	Elizabeth Bott
依伦	Earlene
英格尔斯	Inkeles
尤金・奥尼尔	Eugene O'Neill
约翰	John
约翰・劳雷尔	John Rohrer
约瑟芬・克莱因	Josephine Klein
詹金斯	Jenkins
詹姆士・乔伊斯	James Joyce
詹姆士・奥斯伯格	James Osberg
朱迪思・史黛西	Judith Stacey
祖鲁思・亨利	Jules Henry

作品名称汉英对照表(以首汉字拼音为序)

不同情境下群体中的青年

Youth in Their Groups in Different Settings

参与观察中的推理和验证问题

Problems of Inference and Proof in Participant-Observation

侧道 *Sidewalk*

城市下层文化对社会工作的意涵

Implication of Urban Lower-Class Culture for Social Work

初民的法律:法的动态比较研究

the Law of Primitive Man:a Study in Comparative Legal Dynamics

底层工人的动机 *the Motivation of the Underprivileged Worker*

第八代:新奥尔良黑人的文化与人格
the Eighth Generation:Culture and Personalities of New Orleans Negroes
都市中的村民 *the Urban Villages*
犯罪少年 *Delinquent Boys*
告诉他们我是谁 *Tell Them Who I Am*
个人社群和它的不动产
the Personal Community and Its Invariant Properties
工人阶级的反犹分子 *Working-class Anti-Semite*
工人阶级亚文化:一种新视角
the Working Class Subculture: a New View
工业人 *Industrial Man*
黑暗的黑人区 *Dark Ghetto*
黑人都市 *Black Metropolis*
黑人家庭:为国家行动而进行的案例分析
the Negro Family: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
家庭和社会关系网 *Family and Social Network*
家庭研究中的方法问题 *Problems of Methods in Family Studies*
街角社会 *Street Corner Soiety*
美国的黑人家庭 *the Negro Family in United States*
美国的困境 *an American Dilemma*
男人与工作 *Men and Their Work*
偏差行为与机会:青少年帮派理论
Delinquency and Opportunity:a Theory of Delinquent Gangs
认同的考验:黑人下层家庭
Crucible of Identity:the Negro Lower Class Family
桑切斯的孩子们 *the Children of Sanchez*
社会结构理论 *th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社会经济地位的研究方法和评定
Methodology and Score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社会与青少年自我形象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
送冰人来了 *the Iceman Cometh*

挑战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

文化、阶级和低收入家庭的行为

Culture, Class, and the Behavior of Low Income Families

我们所有的亲属 *All Our Kin*

无父的家庭:他们的经济和社会适应性

Fatherless Families: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Adjustment

下层阶级的工作和认同 Work and Identity in the Lower Class

下层蓝领阶级的特征

Characteristic of the Lower-Blue-Collar-Class

下层社会文化:青少年帮派犯罪的滋生地

Lower Class as a Generating Milieu of Gang Delinquency

向联邦大律师公会的讲话 Address to the Federal Bar Association

一个城市下层社区的文化特征

Cultural Features of an Urban Lower Class Community

一个出租房区的工人社会组织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Workers in a Rooming House Area

隐形人 *Invisible Man*

英国文化范例 *Samples from English Culture*

丈夫和妻子:婚姻生活的动力

Husbands and Wives: the Dynamics of Married Living

万卷方法总书目

万卷方法是我国第一套系统介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大型丛书，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近两百余名学者参与了丛书的写作和翻译工作。至今已出版图书近60个品种，其中绝大多数是2007年以来出版的新书。

2009 年版

1 **结构方程模型——AMOS 的操作与应用**
吴明隆 著
定价:59.8
书号:978-7-5624-4947-8

2 **量化研究与统计分析:SPSS 中文视窗版数据分析范例解析**
邱皓政著
定价:49.5
书号:978-7-5624-4821-1

3 **如何解读统计图表:研究报告阅读指南**
纳迪 著　汪顺玉 等译
定价:18
书号:978-7-5624-4906-5

4 **泰利的街角:一项街角黑人的研究(个案阅读)**
列堡 著　李文茂 等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4937-9

5 **心理学研究的要义**
埃文斯 著　苏彦捷 等译
定价:33.00
书号:978-7-5624-5098-6

6 **客厅即工厂(个案阅读)**
熊秉纯 著　杜芳琴 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4886-0

7 **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一项民族志研究(个案阅读)**
沃尔科特 著　杨海燕 译
定价:45
书号:978-7-5624-4880-8

8 **质性研究的理论视角:一种反身性的方法论**
艾尔维森 等著　陈仁仁 译
定价:39
书号:978-7-5624-4889-1

9 **解释互动论(校订新译本)**
邓金 著　周勇 译　刘良华 校
定价:25
书号:978-7-5624-4936-2

10 **社会评估:理论、过程与技术**
泰勒 等著　葛道顺 译
定价:28
书号:978-7-5624-4975-1

11 **调查研究方法(校订新译本)**
福勒著　孙振东等译　沈崇鳞校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289-0

12 **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指南**
赛德曼著　周海涛译
书号:978-7-5624-4679-8

13 **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校订新译本)**
殷著　周海涛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278-4

14 **教育研究的方法论探索**
孙振东著　定价:38
书号:978-7-5624-4649-1

15 **参与观察法**
乔金森著　张小山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4616-3

16 **分析社会情境:质性观察和分析方法**
洛夫兰德等著　林小英译　定价:37
书号:978-7-5624-4690-3

17 **建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实践指南**
卡麦兹著　边国英译　陈向明校
定价:33
书号:978-7-5624-4747-4

18 **公共管理定量分析:方法与技术(第2版)**
袁政　编著　定价:33
书号:978-7-5624-3640-9

19 **AMOS 与研究方法**
荣泰生著　定价:33
书号:978-7-5624-4806-8

20 **文化研究:民族志方法与生活文化**
格雷著　许梦云译　高丙中校　定价:33
书号:978-7-5624-4698-0

21 **质性研究方法:健康及相关专业研究指南**
普拉尼等著　郑显兰译　定价:49
书号:978-7-5624-4720-7

22 **如何做质性研究**
希尔弗曼著　卢晖临等译　定价:58
书号:978-7-5624-4697-2

2008 年版

23 **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第8版)**
赫文著　李涤非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4465-7

24 **应用 Stata 做统计分析(Version 9)**
汉密尔顿著　郭志刚译　定价:58
书号:978-7-5624-4483-1

25 **实用抽样方法**
亨利著　沈崇麟译　定价:22
书号:978-7-5624-4487-9

26 **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
邓晓芒著　定价:40

书号:978-7-5624-4446-6

27 **质性研究:反思与评论**
陈向明主编　定价:30
书号:978-7-5624-4462-6

28 **社会研究方法**
仇立平著　定价:39
书号:978-7-5624-4456-5

29 **质性资料的分析:方法与实践(第2版)**
米尔斯,休伯曼著　卢晖临译　定价:78
书号:978-7-5624-4426-8

30 **实用数据再分析法(第2版)**
利普西著　刘军译　定价:37
书号:978-7-5624-4296-7

31 **质性研究的伦理**
丁三东译　定价:32
书号:978-7-5624-4304-9

32 **叙事研究:阅读、倾听与理解**
利布里奇著　王红艳译　定价:27
书号:978-7-5624-4303-2

33 **质化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第2版)**
麦瑞尔姆著　于泽元译　定价:33
书号:978-7-5624-4349-0

34 **爱上统计学(第2版)**
萨尔金德著　史玲玲译　定价:45
书号:978-7-5624-4196-0

35 **复杂调查设计与分析的实用方法(第2版)**
雷同能著　王天夫译　定价:45
书号:978-7-5624-4290-5

36 **美国心理协会写作手册(APA格式)(第5版)**
美国心理协会著　定价:49
书号:978-7-5624-4130-4

2007年版

37 **做自然主义研究:方法指南**
欧兰德森著　李涤非译　定价:32
书号:978-7-5624-4259-2

38 **多层次模型分析导论(第2版)**
Ita kreft著　郭志刚译　定价:35
书号:978-7-5624-4060-4

39 **评估:方法与技术(第7版)**
罗希著　邱泽奇译　定价:49
书号:978-7-5624-3994-3

40 **焦点团体:应用研究实践指南(第3版)**
克鲁杰著　林小英译　定价:29
书号:978-7-5624-3990-5

41 **质的研究的设计:一种互动的取向(第2版)**
马克斯威尔著　朱光明译,陈向明校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971-4

42 **组织诊断:方法、模型和过程(第3版)**
哈里森著　张小山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055-1

43 **民族志:步步深入(第2版)**
费特曼著　龚建华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996-7

44 **分组比较的统计分析(第2版)**
廖福挺著　高勇译　沈崇麟校　定价:35
书号:978-7-5624-3942-4

45 **抽样调查设计导论(第2版)**
扎加,布莱尔著　沈崇麟译　定价:39
书号:978-7-5624-3943-1

46 **定性研究(第1卷):方法论基础(第2版)**
邓津等主编　风笑天等译　定价:58
书号:978-7-5624-3851-9

47 **定性研究(第2卷):策略与艺术(第2版)**
邓津等主编　风笑天等译　定价:48
书号:978-7-5624-3286-9

48 **定性研究(第4卷):解释、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第2版)**
邓津等主编　风笑天等译　定价:38
书号:978-7-5624-3948-6

49 **定性研究(第3卷):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第2版)**
邓津等主编　风笑天等译　定价:45
书号:978-7-5624-3944-8

50 **研究设计与写作指导:定性、定量与混合研究的路径(第2版)**
克雷斯威尔著　崔延强译　定价:29
书号:978-7-5624-3644-7

51 **社会网络分析法(第2版)**
约翰·斯科特著　刘军译　定价:28
书号:978-7-5624-2147-4

52 **公共政策内容分析方法:理论与应用**
李钢著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850-2

2007年以前版

53 **论教育科学:基于文化哲学的批判与建构**
申仁洪著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641-6

54 **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研究**
黄欣荣著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825-0

55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评论**
陈向明著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689-4

56 **电话调查方法:抽样、筛选与监控(第2版)**
拉弗拉卡斯著　沈崇麟译　定价:15
书号:7-5624-3441-7

57 **科学决策方法:从社会科学研究到政策分析**
沃恩著　沈崇麟译　定价:15
书号:7-5624-3669-X

58 **研究设计与社会测量导引(第6版)**
米勒著　风笑天译　定价:68
书号:978-7-5624-3295-1

59 **量表编制:理论与应用(第2版)**
德维利斯著　李红等译　定价:15
书号:7-5624-3280-5

60 **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第3版)**
殷著　周海涛译　定价:15
书号:978-7-5624-3266-1